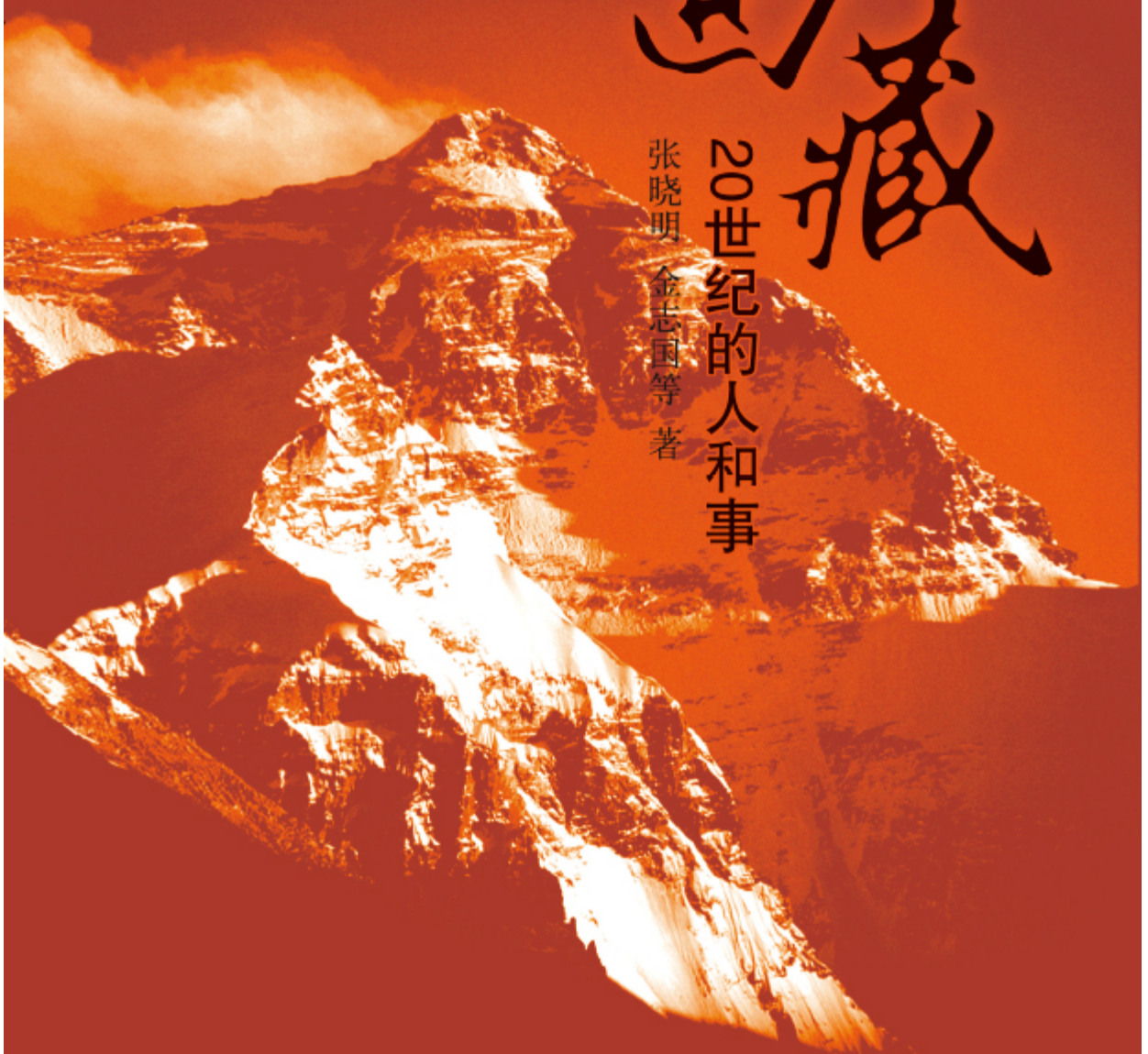
百年西藏

20世纪的人和事

张晓明 金忠国等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西藏:20世纪的人和事/张晓明等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75-3484-9

Ⅰ.①百… Ⅱ.①张… Ⅲ.①历史事件—史料—西藏—20世纪 Ⅳ.①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7531号

书　　名：百年西藏——20世纪的人和事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484-9
著　　者：张晓明　金志国　吴　祎　周爱明　卢　颖　袁星宇　高国芝　加央加
出版策划：李红强
责任编辑：李红强　张力慧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子信箱：hwcbs@263.net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6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172千
版　　次：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百年西藏话衷肠

拉巴平措

时光如七匹神马拉动的金车昼夜飞驰，我们生活着的21世纪已过去了10年，回望喜马拉雅山下的高原厚土，确实发生了先辈们做梦也无法想象的巨大变化，长期欺压我们的帝国主义被赶走了，世代禁锢我们的农奴制度被推翻了，西藏人民在祖国温暖的民族大家庭里，过上了自由、平等、富裕的生活，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

我虽不是须发白如海的世纪老人，但是在这个有风雪有阳光的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出生在年楚河畔的江孜古城，20世纪初正是在我的家乡爆发了震撼世界的江孜保卫战。我为父辈们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机枪大炮面前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而自豪，也为家乡父老惨遭杀戮、血染宗山而倍感屈辱和渗入骨髓的悲愤。

比起父辈们，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少年时期，西藏和平解放，我有机会来到祖国金色的首都北京读书深造，成为西藏第一代藏族研究生。学成之后，回到家乡西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时家乡已经实行民主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广大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当然更是自己人身的主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全国各族人民对西藏的

支援，雪域西藏每年每月每日都在发生变化，变好了，变新了，变美了，变得繁荣、富裕、文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西藏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我们的先辈们世世代代盼望的“格巴桑波”（太平盛世）时代。

回顾20世纪100年间特别是近50年的历史，我们西藏人从亲身实践中得出了比金子还宝贵的结论——西藏只有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只有进行民主改革，只有坚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才能使我们民族真正振兴并走上繁荣幸福之路。

《百年西藏——20世纪的人和事》，将西藏的百年历史，归纳成为40个专题，用明白流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读者对西藏百年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经济、民俗等，留下总体的明晰的印象，本书有人有事，有图有文，图文并茂，读者可以按图索史，读来真实可信，趣味盎然。

现在国际上有一股西藏热，许多外国朋友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也非常关注。不过，我想冒昧说一句，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对西藏的真实情形并不了解，有的人甚至还受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蒙骗。因此，编写、出版这样一部书，用客观、公正、严肃的眼光审视西藏百年的历史，让广大读者真正了解20世纪100年间在我们西藏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使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很有意义，很有必要。不仅对外国读者如此，而且对我国读者包括西藏读者也是如此。这正是我欢迎这部书的出版并为之写序的原因。

西藏——百年巨变与结论

朱晓明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读历史要先由薄变厚，再由厚变薄。所谓由薄变厚，就是由抽象到具体，使历史的规律、结论得到大量史料、事实的丰富、支撑。所谓由厚变薄，就是再由具体到抽象，对具体的、感性的材料进行理性的思考。读历史，也就是读前人的实践。“学而不思则惘”，死读书，读死书，会使人迷失在历史中，找不到方向。老师灌输给你的历史和自己悟出来的历史，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你来说它的内涵不同了。

这本《百年西藏——20世纪的人和事》，是由《中国西藏》杂志编辑部的同志们从西藏地方百年史中筛选的几十个话题组成的。从中既可以看出历史的概况和脉络，又有重点的叙述和展开，不失为普及历史知识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20世纪的百年西藏在西藏地方史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一部浩瀚繁复的西藏地方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两个高潮”两个“四百年”。

第一个高潮是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的奴隶制的吐蕃王朝，积极加强与唐朝的联盟，大胆引入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对密切藏汉民族的友好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高潮是公元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13世纪上半叶，元朝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藏族地区分裂

割据、400年混战的局面，为西藏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帕木竹巴和藏巴汗地方政权先后各统治西藏百年左右。在这两个世纪中，西藏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

在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中，既有光华四射的高潮，也有沉重黯淡的低潮。这就是两个“四百年”。

第一个“四百年”是从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西藏以前“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400年。

第二个“四百年”是16世纪中叶以后，封建农奴制社会“长期停滞”的400年。在这400年里，由于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统治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由于宗教寺院集团占据统治地位后，僧侣人数急剧地畸形增长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直接妨碍了藏族人口的增长。虽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中央王朝对西藏的治理达到日臻完善的地步，西藏高原也出现过稳定、繁荣的局面，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沦为半半殖民封建地社会，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加速走向腐朽和衰败。

西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了20世纪。

20世纪的百年西藏发生了什么？回眸西藏在20世纪百年中走过的漫漫长路，沧桑巨变，天翻地覆。西藏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到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从政教合一、“三大领主”封建农奴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人民民主政权；从经济社会停滞、衰落，到获得解放、新生，进行改革开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西藏地方有文字

记载的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上，20世纪的百年西藏，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兴起。

20世纪的百年西藏说明了什么？这个百年恰好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分为前50年、后50年。前50年，西藏的命运是停滞、衰落，跌入谷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和平解放之前。后50年，西藏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得以走向新生，走向繁荣。前后50年的两种命运，深刻地说明，西藏的命运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帝国主义培植出来的西藏上层亲帝分裂主义势力，自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搞“西藏独立”的活动。近百年来，他们曾经煽动过四次比较大的“西藏独立”的逆流。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帝国主义唆使西藏地方政府驱逐了清朝的驻藏官员和驻军，对爱国僧侣横加迫害，召开了所谓的“西姆拉会议”企图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去。第二次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亲帝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者支持下制造了“热振事件”，派代表参加“泛亚洲会议”，企图派“商务代表团”到英、美等国游说，并限期让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全部离开西藏。第三次是1959年，他们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第四次是80年代末，他们一方面在拉萨策划制造骚乱，一方面在西方的支持下，企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

从对“西藏独立”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简要回顾，至少可以得出三条历史结论：第一，每一次“西藏独立”的活动背后都有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和策划；第二，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的少数分裂

主义者，自己从来就没有独立过，他们总是依附于某种外国的敌对势力；第三，往往越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煽动“西藏独立”的浪潮越高，但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失败得更惨。辛亥革命前后的独立阴谋没有得逞，反而暴露了英帝国主义侵吞西藏的野心，激发了西藏人民的反帝情结，恢复和密切了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解放前夕的独立活动，没有阻挡住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潮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1959年的叛乱没有阻挡住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潮流，反而导致达赖集团流亡国外。80年代末的骚乱也没有阻挡住西藏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中央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导下，西藏经济加快发展，社会日趋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世纪之交的西藏正在发生着四个转变：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从政教合一走向政教分离，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一个传统的社会走向现代化。其中的每一个转变都非常复杂艰巨，而这四大变化同时发生，就更加艰巨复杂。正因为艰巨复杂，所以才光荣伟大。

20世纪下半叶，西藏的解放和发展，已经开辟了通往新世纪的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一定会把建设团结、富裕、文明新西藏的美景变为现实，书写出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绚丽篇章。



目　录

20世纪的序幕——抗英战争 1
十三世达赖喇嘛 6
张荫棠查办藏务与维新 11
破产的西姆拉会议 15
刘曼卿与《康藏轺征》 20
走向衰亡的封建庄园制度 24
九世班禅出走内地 29
十四世达赖的寻访与坐床 33
热振事件原委 38
两次“驱汉”事件 42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47
阿沛·阿旺晋美与《十七条协议》 53
十世班禅大师 59
川藏、青藏公路通车 64
拉萨小学的创办 70
1959年3月10日事件 76
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 82

贡布等三人第一次登顶珠峰 87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 93
农村互助组和人民公社 97
西藏的“文化大革命” 102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胡耀邦进藏 107

活的史诗《格萨尔》 111
43项与62项援藏工程 116
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古建筑群 121
“一江两河”综合开发 126
十一世班禅的认定与坐床 130
恰白·次旦平措与《西藏通史》 135
雪域之音——才旦卓玛 139
强巴赤列与藏医藏药 144
西藏的自然保护区 148
西藏人口 153

目　录

门孜康与现代医疗事业　158

西藏的当代绘画　163
雅鲁藏布大峡谷　168
青藏铁路的建设　174
拓然巴——藏传佛教新的学衔制度　179
拉萨3·14事件　184
奥运圣火传递珠峰　189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　195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201

20世纪的序幕——抗英战争

20世纪初的西藏，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和大变革的前夕，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抗英战争成了这不平凡的100年带预言性质的序幕。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由此加紧对我国尤其是边疆地区的侵略。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屡次派出伪装真实身份的间谍潜入西藏搜集情报，为其入侵探路。1885年他们再次派人以考察商务和矿产为名，从锡金进入岗巴宗，受到当地官员和军民阻止，双方相持数月。英国一方面威胁要派兵“讨伐”，一方面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撤退西藏边防，后来又向清朝政府发出照会，干脆宣称隆吐山是在受他们“保护”的锡金的领土之内，要求清朝政府下令西



抗英战争战场：岗巴宗城堡遗迹。（车刚摄）



1904年江孜保卫战中的两位战士。（胡岩提供）

藏限期撤卡退兵。

1888年2月，英军对设卡防守隆吐山的藏军发动突然进攻，藏军使用火绳枪、投石器等原始武器进行了英勇抵抗，经过几天鏖战，在英军的马克西姆机枪、大炮的猛烈轰击下，藏军无法坚持，撤退到纳汤，建石墙防守。同时陆续调集前后藏民军上万人增援前线。8月，英军在大量增援后又对驻守纳汤的藏军发动攻击，藏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武器装备落后，藏军再次战败，退回到则列拉山。这场战争最后以驻藏大臣升泰从拉萨到亚东前线与英印谈判议和而结束。议和的结果是，1890年2月，清朝派升泰到印度加尔各答，和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条约不但承认了锡金受英国保护，而且按照英国的要求以则列拉山为西藏和锡金分界，使中国失去了从热纳宗到岗巴宗南部的大片领土。

进入20世纪，英国殖民者在攫取西藏部分政治、经济特权后，变本加厉，肆无忌惮。英印总督寇松数次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企图撇开中国中央政府，寻求与西藏地方单独谈判。达赖喇嘛将信原封退回，表示未经中央政府同意，西藏地方不能与任何外国交往。寇松为了达到侵略西藏的目的，开始策划再次武装入侵。

1903年12月12日，英军在荣赫鹏率领下，偷越则列拉山口，很快占领春丕、帕里等地。西藏地方政府不顾驻藏大臣有泰阻挠，紧急调动藏军开赴前线，并动员全藏僧俗百姓支应兵差，保卫家园。

1904年3月，1000名藏军赶到曲米辛果旷原，与英军对峙。当

时藏军右翼在堆纳北面多庆措湖西岸的曲米辛果地方建了一道矮墙作为防御工事，左翼在多庆措湖的南岸。荣赫鹏玩弄诡计，提出谈判。同时，却命英军携重机枪、火炮包围藏军。在与藏军代本(藏兵团主管)拉丁色、朗赛林见面时，他提出藏军应将火枪点火绳熄灭，以示诚意。生性诚信、不谙阴谋的藏军照办了。英军突然开火。藏军因点火绳熄灭无法还击，数分钟内被射杀500多人，拉丁代本等4名藏军军官亦被杀害；余军冒着枪林弹雨，展开肉搏战，结果1400余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原野，这是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人民实施的一次最无耻、最野蛮的大屠杀。

曲米辛果大屠杀激怒了西藏人民，抗英情绪越加高涨。4月9日，英军一支骑兵先遣队在杂昌谷地被藏族军民以土枪、土炮、滚木、飞蝗石等重创。英军后续部队赶来，在火炮、机枪掩护下，向藏军发起猛攻，侵入江孜重镇。西藏各地民军和僧兵集结江孜，与英军展开激烈争夺战，攻克江孜宗山城堡，连荣赫鹏也险些在藏军夜袭中丧命。最后因英军切断水源，加之弹药库中弹爆炸，宗山



1904年8月3日，英军进入拉萨时的情形。(胡岩提供)



在亚东以北曲米辛果地方，英军用洋枪洋炮屠杀藏人数百人。（胡岩提供）

炮台沦陷，藏军坚持了近三个月的江孜抗英保卫战始告失败。

7月14日，麦克唐纳率英军4000人从江孜出发，向拉萨前进。十三世达赖喇嘛见英军逼近拉萨，不愿与仇人签订城下之盟，星夜出走。8月3日，英军占领拉萨。



原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吉普·平措次登的祖父、帕里总管、藏军代本吉普，在1904年抗英战争中阵亡。（胡岩提供）

9月7日，在炮口和刺刀下，西藏地方上层少数人被迫在布达拉宫与英人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主要内容是：西藏不得向任何外国出让土地、矿产等，西藏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向英国赔款；拆毁印度至江孜、拉萨沿途要塞；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为商埠；承认1890年条约，划定藏锡边界；英军在亚东驻军。这个条约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和签字，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英印政府因此竭力通过外交途径强迫清政府承认它。直到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才将其作为附件。后来英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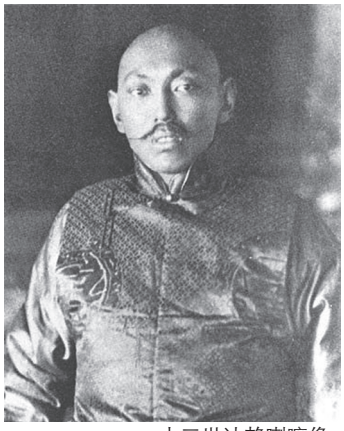


油画：江孜保卫战。

西藏享有的特权都与这两个条约有关。

正是20世纪初英国前后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使当时的清朝政府看到了西藏被列强争夺的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巩固其在西藏的统治，保住西南屏障，开始推动西藏社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变革。

十三世达赖喇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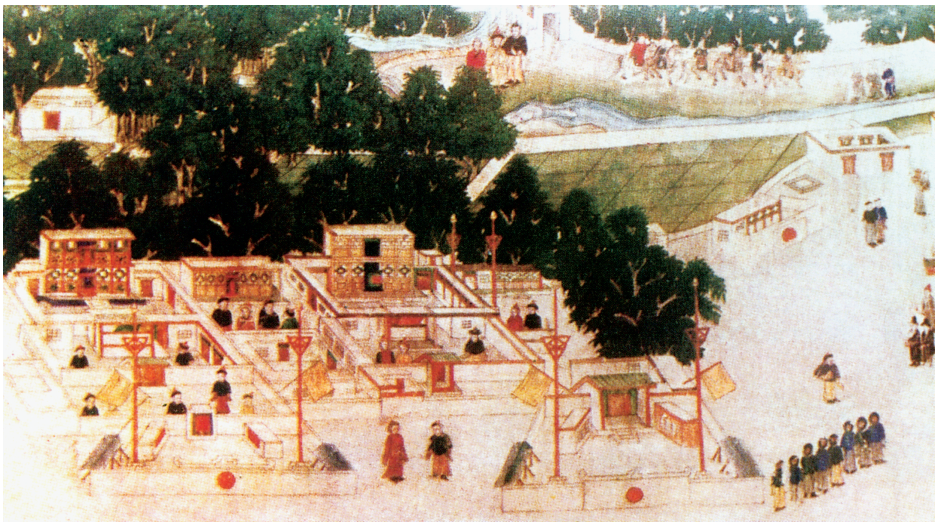

十三世达赖喇嘛像。

1904年7月30日，也就是英国侵略军快要逼近拉萨的时候，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外蒙古。

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的一生，处于西藏的动乱年代，作为一个政教首领，他艰难地盘桓在英国、俄罗斯和清朝中央王朝之间，寻求自立和发展的出路，但最终“倾心内向”，恢复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直接关系。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终于看明白了，在列强纷争的国际背景下，回归祖国是唯一的出路。

公元1876年藏历第十五饶迥火鼠年五月五日，一个婴儿降生在拉萨东南达布地区一户普通农家里。由于农舍位于形似大象的朗林拉巴山前，故称之为朗顿（大象前面之意）。

孩子出生后，因十分灵异，各方一致公认他为十二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接到拉萨居住。西藏各大呼图克图、噶伦及代本等官员、三大寺各扎仓堪布等僧俗大众集会，写成公禀，众人盖印画押，呈递驻藏大臣，向皇上奏请免予掣签认定。1877年3月，光绪帝批准免予掣签，谕旨说：“贡嘎仁钦之子罗布藏塔布开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钦此。”是年11月14，布达拉宫和噶厦分派代表将灵童迎至拉萨河南岸的公堂寺，按照旧



清代藏族画家所绘之驻藏大臣衙门图。

例，在此接受圣旨：灵童面向东方跪下，驻藏大臣立在前面，捧读光绪帝批准灵童继任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免予掣签的圣旨，灵童向东方行三跪九叩礼。

1878年正月十一，八世班禅为灵童剪发、换僧衣，并取法名阿旺洛桑土登嘉措季卓曲杰南嘉，简称土登嘉措。1879年6月13日，年仅3岁的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继任达赖法统。按惯例，达赖生父贡嘎仁钦被封为公爵，噶厦政府又拨给庄园和农奴，成为西藏大贵族之一，名为朗顿。

十三世达赖7岁受沙弥戒，10岁那年即1886年摄政济咙活佛圆寂，根据僧俗大众的推荐，清朝任命八世第穆活佛阿旺洛桑赤列饶杰为摄政。189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19岁，摄政第穆活佛遂辞去摄政职务，由达赖喇嘛亲政。此后的若干年，西藏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除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野心日益膨胀，西藏上层内部趁十三世达赖年幼之际，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1899年发生了达赖喇嘛和卸任摄政亲信之间的斗争，即“第穆妖鞋”事件，第穆活佛及其亲信被捕，第穆活佛死在监狱中，其佛邸丹吉林的

庄园、寺庙和属民都被没收，并不准寻访其转世。此后，十三世达赖的权力开始稳定，并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1904年西藏抗英战争失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外蒙古，想取得俄国的帮助继续抗英。但此时俄国刚被日本打败，无力提供实质援助，同时他又与寄居处的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发生冲突，只有寄希望于清廷。1906年，在清廷要求下，他从库仑启程返藏，途中奉旨在塔尔寺暂住。1907年11月，清朝批准达赖喇嘛进京朝觐的请求，他于1908年1月到五台山朝礼，等候进京；9月底，从五台山到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几次接见和宴请，赐给金册金印，并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但是清朝没有批准达赖喇嘛不经过驻藏大臣直接向皇帝上奏的请求，赐见时又让他下跪，这些都使他深感不满。

1908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离京返藏。1910年由钟颖率领的川军到达拉萨，与藏军发生零星冲突，这使本来就与驻藏大臣联豫关系紧张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卧不安，立即命令策墨林活佛为摄政，留守拉萨，自己带领伦钦夏扎等少数官员出走印度，受到英国官员贝尔等的“热诚接待”。



十三世达赖喇嘛（右一）与英国人的合影。（中国西藏信息网提供）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结束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言中强调“国家之本，

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月，孙中山主持制定并公布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而且还规定民国政府的参议院的议员，西藏也与各省、内外蒙古一样，选派五名代表参加，代表选派方法由地方自定。

1912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虽然惩处了支持过驻藏大臣和川军的第穆活佛及其丹吉林寺的僧人，但在与中央的关系上处于徘徊犹豫状态中，也不敢下决心去实行完全脱离中国的“西藏独立”。

尽管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西藏的混乱局势，用尽一切手段策动“西藏独立”，但历史形成的西藏和祖国的血肉联系谁也无法割断。1919年甘肃省按中央指示派专员朱绣等入藏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唯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慈禧太后接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情景。（布达拉宫壁画）



慈禧太后赐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礼物：珍珠坛城。现珍藏在布达拉宫。

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1921年他派亲信贡觉仲尼等到南京，将他的信交给国民政府，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央的联系。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进藏，并就西藏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征询达赖喇嘛的意见。1930年贡觉仲尼带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复信返回南京，达赖喇嘛加派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总代表，1931年设立了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联系的正式机构。

1933年藏历十月三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政府按照历史惯例打电报向国民政府报告，并通知九世班禅。国民政府发布了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命令，在南京举行追悼大会，并派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等入藏致祭。

张荫棠查办藏务与维新

张荫棠，广东南海人，汉族，晚清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被委任为内阁中书，次年考入海军衙门章京；1896年起任驻美国使馆三等参赞、旧金山领事馆领事，后调任驻西班牙代办；1905年随清廷外务部门官员唐绍仪赴印度与英人交涉西藏事务，从此与西藏结下缘分。次年唐绍仪因病辞职，清廷以张荫棠全权代之。张荫棠在接触西藏问题、办理西藏事务过程中，发现清政府治藏之不足，给外务部发电报，提出了《请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的建议。



晚清最后一位驻美公使张荫棠在美国。（摄于1905年5月15日）

在其整顿藏政的建议中，张荫棠分析了西藏所临困境，主要是来自英国方面的离间和威胁，西藏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必须改变清朝目前对西藏地区管理的疏散，对此他提出：一、为守住疆土、稳定大局，解眼下之燃眉，需派精兵两万进藏，驻守各边防要道隘口。以兵收权以兵守土。继而添练番兵以补充兵力，将常年驻藏兵力控制在五千左右；二、将达赖班禅优加封号，尊为藏中之教主，但是政权要收回，一切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策略均由国家制定、统管；三、对藏地官员、贵族、僧俗民众，朝廷要恩威并重，让他们坚信只有国家才是依靠，依靠国家才心里踏实；四、只有我国治理好西藏，包括英俄在内的外人才无隙可乘，自泯觊觎之心。

经过英国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朝野上下对清朝的妥协退让



1727年，清廷派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作为第一任驻藏大臣进驻西藏。图为驻藏大臣及随行人员。

方针和驻藏大臣在战争中的表现也强烈不满，纷纷提出责问，清政府也看到西藏在列强争夺下问题的严重性。张荫棠提出的治藏政策正合清廷之意，为了巩固在西藏的统治，保住西南屏障，1906年4月，清朝派遣张荫棠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入藏“查办藏事”。张荫棠成为清代上百个驻藏大臣中唯一的汉人。

1906年，张荫棠走海路经印度大吉岭入藏，10月中旬抵圣城拉萨。在那里，他们一行在受到热烈欢迎、盛情款待的同时也了解到，西藏的官员和民众不能容忍驻藏大臣有泰等清朝驻藏主要官员的贪赃枉法行为——欺压西藏民众、贪污受贿等劣迹丑行，甚至有违抗中央政府的倾向，尤其不可饶恕的是他们谄媚、讨好英国侵略军，与英军一起逼迫西藏官员签署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不支持甚至阻挠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抗击入侵的英军。为了巩固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地位、安抚广大西藏僧俗官员和民众、全面顺利地落实治藏新政策，张荫棠对以上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核实，写出奏折禀报皇帝，并要求严惩这些满汉藏官员。

对此，清政府非常支持。11月底，发布革职查办有泰等10余名满汉藏族官员的圣旨，说“……有泰庸儒昏聩，贻误时机，并有



清代晚期驻藏大臣衙门门前情景。（索文清提供）

浮冒报销情弊，著先行革职，不准回京，停候归案查办，仍著张荫棠严加彻查，据实复奏……”张荫棠遵旨照办，该撤职的撤职，该绳之以法的也绝不手软。此举令全藏极为震动，深得僧俗人心，民众无不拍手称快。僧俗民众认为他是历任驻藏大臣中最有才干的，当时的拉萨传唱这样一首街谣：“海上来了大臣，藏人得到安宁。”

首战告捷后，曾有多次驻外经验的张荫棠决心效法欧美资产阶级变法，以治理西藏图强发展。随之向清廷提出治藏建设十九条及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即所谓“新政”。主要内容除优待达赖和班禅、恢复藏王，调北洋新军驻藏外，还有引进现代管理手段和发展工商事业、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如课征盐井税，设银行，架电线，修公路，开矿山，建工厂，试种茶树，办学校，办报纸等。同时根据其治藏新政策，令西藏地方政府设立交涉、督练、巡警、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九局。他还命人把《训俗浅言》、《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译成藏文，散发各



清代驻藏大臣的令牌。

地，人们称之为“钦差训育”。其中提出“人死宜用棺木”、“儿童七八岁宜教识汉字”、“喇嘛白昼不必诵经，宜兼做农工商业以生财，不可望人布施”等。为了扩大影响，他还抱病亲自登台大昭寺宣讲爱国主义思想和富国强兵之道。但是，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西藏地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加之他的一些想法严重脱离西藏实际，引发抵触情绪，特别是受到驻藏大臣联豫的猜忌，直至招致英印政府抗议，被人连连参奏弹劾，腐朽软弱的清政府担心由此酿成大祸，遂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将他调离西藏。

对张荫棠的治藏方略，藏族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由恰白·次旦平措、诺章·乌坚、平措次仁撰写的西藏历史著作《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写道：“张荫棠是位颇受变法维新思想影响的官员。他提出的发展工商事业、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等有关发展西藏的主张及措施对各项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深受藏族人民的称赞。他带来的花种人们取名为‘张大人’，这种花(一种单瓣菊科花)现在遍及西藏的东南西北，成了纪念这位大臣业绩的象征。”

破产的西姆拉会议

1914年7月3日，印度夏都西姆拉市的一个会议室里，英帝国的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伦钦夏扎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正在一个条约上签字，对此，北洋政府的代表陈贻范当场发表中国外交部声明：该条约未得中国政府同意，英藏方面签字画押，中国万不能承认。至此，自1913年10月13日召开、历时长达8个月12天的西姆拉会议宣告破裂。

1911年我国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民国诞生。1991年年底，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西藏，清朝派驻拉萨、江孜等地的川军先后兵变，以效仿内地。此时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受英国挑唆，立刻派遣达桑占堆等回藏组织卫藏民军和藏军，攻击、包围驻藏川军，并中断川军的粮草供应。1912年夏，四川和云南两省发



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和中国汉藏代表的合影。前排左四为英国全权代表麦克马洪，左三为中国代表陈贻范，右三为西藏地方代表伦钦夏扎。（喜饶尼玛提供）

兵援救在藏川军，已经打到江达地方，英国立即出面干涉，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世凯只好命令四川、云南停止进兵。在藏的川军逐步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后来，由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出面作调解人，钟颖等人和达赖喇嘛派来的伦钦强钦巴谈判达成停火办法，川军将枪支弹药交出，由尼泊尔和英国的官员负责安全，从江孜、亚东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内地。到1912年12月底，联豫、钟颖等官员和在藏的川军等全部离开了西藏。

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大吉岭回到拉萨，一方面惩办了在战斗中支持过驻藏大臣和川军的第穆活佛的丹吉林寺的僧人，另一方面又在与中央的关系上处在徘徊犹豫状态，不愿谋求完全脱离中国的“西藏独立”。

英国自然不愿意看到它极力推动的“西藏独立”停顿下来，他们以阻挠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直接接触和不承认民国政府、不提供贷款等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策划召开“三方谈判”。在民国政府同意出席会议后，英国即在1913年夏天派其驻锡金专员柏尔先行进藏，与西藏拟派的代表伦钦夏扎会商达三个月之久，要夏扎尽量收集“材料”，准备对付中央代表的办法。

1913年10月13日，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中央政府代表为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胡汉民(后改为王海平)；英国代表为印度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并以前驻华领事罗斯为中国事务顾问，以锡金行政长官柏尔为西藏事务顾问；西藏地方代表为伦钦夏扎，助理人员有台吉赤门巴、堪穷丹巴达吉、仁细（四品官）大多瓦等人，拉萨三大寺也各派代表一人参加。

会议一开始，英国就让伦钦夏扎出面提出“西藏独立，西藏不能承认1906年的中英条约”、“西藏的范围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与四川的西部、打箭炉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华官华兵不准入藏，华商入藏须领有西藏政府

发给之护照”等无理要求。在中央代表据理驳斥并提出“订明西藏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中国可派驻藏长官驻拉萨”等条件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顾问柏尔竟然以支持和帮助西藏反对中国、取得“独立”为由，与伦钦夏扎进行私下交易，让其在麦克马洪所划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制造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一直属于中国西藏管辖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英属印度。

这笔肮脏的交易英国方面多年不敢公开，几十年后才悄悄塞进英国出版的地图中，伦钦夏扎也不敢正式报告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方面也没有批准过这一非法的领土交易。而在正式的会议上英国代表则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折中方案”，把整个藏族地区划分为内、外藏，外藏包括阿里、卫藏和大部分康区，其余藏区为内藏，中国在内藏享有若干主权，外藏实行自治，中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

在英国代表的逼迫下，1914年4月，中国代表陈贻范在说明只是草签需中国政府批准才能正式签字后，在草约上划了押；但是全国各界民众强烈反对这一草约，袁世凯政府也不敢批准这一条约，因此，中国代表没有在条约的正式文本上签字，并声明中国绝不承认这一条约。

关于3月11日《西姆拉草约》草签至7月3日会议破裂之间的情形，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委员会《关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之政策及1905—1915年资料》中，有清晰记述。

“英专员……并云：此项约稿，已经与藏员画行，如贵专员不于今日画行，则只有将约稿中之第二、第四两款删去，而与西藏直接订约，不再与贵专员商议。陈专员因被其愚弄与逼迫太甚，不得已乃特别声明，画行与签押当分为两事。画行乃专员一时权宜之举，但政府若不批准，即不能发生效力，签押则非得政府训令，万



亚东，是西藏中部喜马拉雅山脉中一条自北向南的断裂山谷。此地为清代设在亚东山谷中的老海关遗址。

不能照办。英专员当为一一允诺。于是陈专员乃一面将当日会议情形电告政府，一面不得已将约稿暂予从权画行，免致决裂。外部接陈专员电，以为英专员此种颟顸，实于中英邦交有碍，亦为国际习惯之所难容。当即电令陈专员向英专员声明，所画之约，政府绝不承认；惟英专员若能变改态度，和平协商，仍可与之接议。陈专员接电后，当即遵照，向英专员交涉。英专员云：贵专员声明各节，应请贵政府径达本国政府。至于签押一层，贵政府既不准行画行，当然无效，惟会议则于今日终止，决不接议。陈专员当即电陈外部。外部以此项约稿，我国损失过大，万难承认，乃于5月1日照会英驻京朱公使，声明此次约稿，界务一端，绝不承认，其余待商之点甚多。至陈专员之画行，并未奉有政府训令，乃属个人不正式之行为，业已电令取消，亦以贵国专员声明认为无效。惟中国政府仍愿与英国政府继续商议，和平解决。等语。一面又电令我国驻英刘公使玉麟，向英外交部交涉，将会议移至伦敦或北京续议，而

英外部亦未赞同。对于界务问题仍坚持不肯让步，并多方迫我签押，我未认可，会议遂因之中止。我政府乃复照会英使，以藏约不得中国政府同意，仅英藏签押，中国政府万不能承认。一面又由驻英刘公使向英政府声明，否认英藏单独签押。于是所谓森姆拉（西姆拉）会议，遂于此时因英人之态度强硬，无结果而决裂。”

刘曼卿与《康藏轺征》



身着藏装的刘曼卿。

1928年冬，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驻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桑前往南京，谒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当时，受邀担任翻译的青年女子刘曼卿，不仅操一口流利的藏汉语，而且其敏捷的思维和得体的举止，都深获蒋介石赞赏。不久，刘曼卿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一等书记官。从此，这个女子开始了她的“康藏轺征”。

“西姆拉会议”后，由于内地局势的混乱，也因英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日益疏远，中央派出的代表基本不能进藏。这种局面不仅中央政府着急，就连西藏上层的爱国人士也非常担忧。随着内地局势的逐步稳定和英帝侵占西藏野心的暴露，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向中央政府靠拢。1919年，达赖喇嘛同意“甘肃代表团”入藏后，又陆续派僧人到内地的藏传佛教寺庙任职，并通过他们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

刘曼卿，藏名雍金，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藏历第十五绕迥阳火马年)生人。母亲是藏族，父亲刘华轩曾为清朝驻藏大臣的秘书，后担任九世班禅的秘书。她出生并成长在拉萨，那里有她温馨的家。同样，高原古城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藏民族文化也深深地扎根在她那幼小的心灵中。1911年的那场劫难，迫使父亲带着一家人迁居印度大吉岭。她人虽离开了高原，心却留在了拉萨。

1918年，12岁的刘曼卿随家人回国，就读于北平市立第一小学。小学毕业后，她进入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道济医院当护士。无论是学师范还是当护士，刘曼卿都“旨在回归西藏，提倡改良康藏女界生活，以期渐次促进于文明”。


大贵族龙夏家派仆人为刘曼卿牵马出行。

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职后，勤奋聪明的刘曼卿一直在思考发挥自己谙熟藏民族文化、能用藏汉语沟通等特长，报效国家。当时因为两地隔膜已久，西藏不许内地汉人入藏，她向文官处古应芬文官长提出愿往康藏调查的请求。对此，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很快批准她以文官处书记官的身份，承担疏通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对话渠道的任务。

1929年7月15日，刘曼卿不顾亲友劝阻，由南京启程赴藏。8月抵四川。此后4个月，她一步一步行走在川藏间的骡马小道上，过天堑，遇土匪，几次大难不死，同行人都说她如有神术，她说全凭一腔热血。

1930年2月1日，刘曼卿一行抵达拉萨。噶厦少数人不愿让刘曼卿见达赖喇嘛，刘曼卿一方面向噶厦表明自己一定要见到达赖的决心，一方面利用在拉萨熟悉的上层人士和社会关系，很快打开局面，积极创造与达赖见面的条件。这年3月28日，刘曼卿终于在罗布林卡见到了达赖喇嘛，向他转赠了孙中山遗像，介绍了内地政局，解说“五族共和”的基本思想，转达了国民政府对西藏的关心，希望西藏与内地和好如初。达赖深有感触。当得知刘曼卿的


刘曼卿在拉萨林卡中的留影。

身世时，达赖还破例为她摸顶赐福。会谈气氛始终十分融洽、和谐、愉快。

5 月 25 日，达赖喇嘛再次邀请刘曼卿到罗布林卡见面。其间达赖谈道，过去中央政府不重视西藏，如今新政府刚刚成立就派你前来，希望继续不断，更愿互利合作。话语中还表达了不背离中央、不是要独立、政府切莫将西藏丢掉之意。为了使当时的康藏交界处化干戈为玉帛，生灵免于涂炭，达赖表示：都是中国领土，我随时可以撤回防军，“兄弟阋墙，甚为不值”。话锋一转，达赖喇嘛说：“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力。”交谈中，达赖喇嘛还说起印度人民抗英的近况，其中潜在台词不言而喻。达赖表示，将很快派人去南京。他对刘曼卿千叮咛万嘱咐，回京一定要把给委员长的信送到，回旅馆赶快把他刚才的话记在本子上千万不要忘了。“渠对于中央向甚疑惑。尤不识革命，经数次剀切详明之解释，并告以中央政策对于信教有绝对自由之规定，是以对于国府极愿服从，且逐渐有厌恶英人挑拨之倾向。”


刘曼卿在丽江与康藏同乡相逢。

临别，达赖喇嘛特意为她卜算启程吉日。

圆满完成任务后，刘曼卿取海道回程，8月7日，到达南京，向古应芬汇报了西藏之行，呈交了达赖喇嘛的信函和礼物。



在拉萨，刘曼卿与雪康夫妇及代拍照之某君夫妇、新闻记者等人的合影。

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后在南京和重庆设立达赖驻京办事处，任命贡觉仲尼为驻京办事处总代表；国民政府则设立蒙藏委员会，专门掌握和处理蒙藏事务。可以说，正是刘曼卿这次西藏之行消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国民政府的疑虑，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恢复正常关系，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对此，国民政府各部门给予了她奖赏，各界人士也给她很高赞誉，全国朝野对她此次“融冰”之行都给予极高评价，甚至说她是女菩萨。

在无尽的赞誉声中，刘曼卿“愧赧数日”，著述《康藏轺征》一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之题词“彰往察来”，行政院院长孙科等人写有序言，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及于右任等人为之题写书名。书中将进藏沿途的风土人情一一写来，十分翔实。又因观察细致且不乏幽默，常出精彩点评，向读者展示出一幅民国藏区世俗画。

在抗日战争期间，刘曼卿以其出色的组织、宣传才能活跃在大后方，受到抗日将士和社会各界的好评。这位对自己的民族和祖国深深眷恋的刘曼卿女士，没能等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41年，被病魔夺去生命，时年35岁。

本节图片选自《康藏轺征》

走向衰亡的封建庄园制度

西藏的庄园经济，始于公元13世纪前后，经过萨迦、帕竹和甘丹颇章政权将近700年的漫长岁月进入20世纪时，庄园经济一直是西藏的主要经济形式。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西藏社会显露出深刻的矛盾，庄园经济逐渐走向衰败没落。

庄园，藏语叫“谿卡”，既指农区的庄园，又指牧区的部落，是封建农奴制度下土地占有、分配、经营的基本经济组织，它既是一级政权，也是生产管理单位。庄园归属于不同的庄园主，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政府庄园，藏语称“雄奚谷”；一种是贵族庄园，称“格奚谷”；一种是寺院庄园，称“曲奚谷”。官府、寺庙和贵族一般都



帕拉庄园为帕巴家族在江孜班久伦布村的一处庄园，整个庄园建筑高大雄伟，有房屋82间、5357、5平方米，图为庄园主的起居室。

派出代理人进行管理，也有少数由庄园主亲自管理的。

历史上，西藏的庄园略似一个自然村落，中间有一2~3层的碉楼，居住着庄园主或他们的代理人；周围散落着低矮的泥土小屋，为差巴们的“差房”。“差巴”，意为支差者。差巴租种的差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差巴不能擅自离开庄园。

庄园的土地分成自营地和差役地两种，自营地由庄园直接经营，各户差民派出“乌拉”（无偿服劳役者）承担春种秋收等全部劳动；差役地则分给差民们耕种，按田地的多少支付内差和外差，内差是给庄园主支差，外差是给西藏地方政府支差。

庄园里的百姓，除差巴外还有“堆穷”和“朗生”。“堆穷”意为“小户”，他们没有差地，主要靠打短工或从事手工业维持生计，也有租种小块土地的；“朗生”是奴隶或家奴，他们承负庄园主摊派的各种劳役，没有人身自由。

根据20世纪中叶统计，西藏当时共有耕地336万克（1克指播撒14公斤青稞的面积，约1亩），官府占有38%、贵族占有24.3%，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36.8%，合计占有总耕地面积的99.1%，自耕农仅有极少量的土地，而农奴则完全没有土地。当时，仅拉萨三大寺就有农村庄园321个，土地14.7万克，牧场26个，牲畜11万头，农奴和牧奴4万余人。



拉加里地处山南曲松地方，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小政权，直到1959民主改革前，拉加里政权仍拥有拉加里（曲松）、桑日、加查、隆子四宗领地，方圆达三四百里，下辖19个庄园、9个牧场，有近万属民。图为（拉加里）背水的妇人。（蓝志贵摄）



西藏大庄园之一的朗色林庄园。（陈宗烈摄）

西藏的封建庄园制度的特殊剥削形式就是乌拉差役，即赋税、徭役、地租（包括实物地租、劳役地租、货币地租）等内容的统称。旧时西藏民间贴切地形容说，各种各样的差税“比头发还多”。领主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差。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政府一年的乌拉差役就达1800多种。

牧奴和农奴一样，也得负担多如牛毛的乌拉差役。牧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计约其约”，意为“有生有死”——牧主把牲畜租给牧民放牧，繁殖幼畜归畜主，牧民每年按所租养母畜数向牧主交纳规定数量的酥油，剥削量高达50%~60%。还有一种叫“计美其美”，意为“不生不死”——无论牲畜是否因故死亡或老弱淘汰，所租养的牲畜数不容改变，牧租额不能减少。“计美其美”形式上貌似一种租畜数固定、牧租定额的承租方式，但实际上不是牧租，完全是一种超经济剥削形式。

奴隶从一出生就属于农奴主。图为农奴抱着新生儿来农奴主家登记，并交纳人头税。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地方政府有权分封庄园，分封时把土地



差民和农奴为了躲避繁重的乌拉差役以及官吏的压迫，纷纷逃离庄园，流浪在西藏各处，成为乞丐和游民。图为桑登行乞。（蓝志贵摄）

连同农奴、奴隶一起封给各个领主。农奴完全没有土地，人身自由也不是完全的。农奴没有自由的迁徙权，未经允许不得离开领主；得到允许出外谋生，即便是流浪乞讨，也必须每年向庄园主交人役税（人头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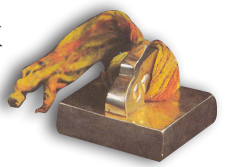
色兴庄园原来是拉萨小贵族色兴巴的庄园，后来被噶厦政府没收。1940年，青海省湟中县当采村一户农民家庭的儿童拉木登珠，被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其家一夜之间成了西藏最大的贵族。这个儿童就是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户大贵

族就是尧西拉达。照惯例，达赖家族获得了册封的大量庄园、牧场和庄园牧场上的农奴与奴隶。色兴便是其中的一个。庄园里18户（后来增加了两户）农奴一夜之间变成了达赖家族的属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达赖家族很重视色兴庄园，专门派人代表达赖家管理庄园事务。原来每户农奴平时出一个“乌拉”（无偿为庄园服劳役），春秋两季增加到两个。达赖家规定每户农奴平时出两个“乌拉”，春秋两季增加到三个，增加剥削量66.6%。全庄园20户农奴约133人，16~60岁的劳力79个，每天平均有50个“乌拉”自带口粮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条件下为庄园干活，占全部农奴劳力的62%，剩下老弱病残，在耕种自己的差地的同时，还要支付政府摊派的像牛毛一样多的乌拉差役。20户农奴一年辛苦劳作，只有康沙强、丹玛夏等4户粮食能吃到年头，康沙妥玛、差萨、比绒3户够吃半年左右，其余13户，大都是“打完场、糌粑光”。

在封建庄园里，农奴和奴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自然也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可言。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西藏一直在用二牛抬杠的方式耕地、人畜运输、手工打场，生产发展迟缓，收获的农作物只是种子的五六倍甚至三四倍，辛苦一年下来，农奴们仍然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20世纪初，随着西藏的西部门户被英国人打开后，西方洋货涌入西藏市场，西藏本地工商业、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农奴主们纷纷效法西方生活方式，在拉萨郊野营建华丽别墅，他们把大量的开销强加到农奴和奴隶身上；加上西藏地方政府大量扩充军队，赋税加重，僧人和藏兵日渐增多，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所有这些，导致庄园经济快速衰亡，部分差民和农奴为了躲避繁重的乌拉差役以及官吏的压迫，纷纷逃离庄园，流浪在西藏各处，很多人涌进拉萨，成为拉萨的乞丐和游民，直接导致庄园的衰亡。

九世班禅出走内地





清圣祖册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的金印。

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十二，是林芝塔布地方噶夏村人，乳名仓珠嘉措，母亲当琼措姆。遵照清朝政府批准，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十五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从三个候选灵童中金瓶掣签抽中。次日，由十三世达赖剪发剃度，取给法名。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初三，由驻藏大臣升泰主持，在扎什伦布寺坐床，正式继承法统。清朝政府特赐白银一万两以示祝贺。坐床后的九世班禅特派人前往北京谢恩。1902年4月15日赴拉萨拜达赖为师，受比丘戒。

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个最大的转世活佛传承之一的称号，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班”，梵文，即“班智达”(学者)的简称；禅，藏语，意为“大”；班禅，即大学者的意思。



九世班禅像。

清顺治二年(1645年)，统治卫藏的蒙古和硕特首领固始汗尊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十六任法台、宗喀巴的四传弟子罗桑曲吉坚参为“班禅博克多”(“博克多”为蒙语，是对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称)，并划分后藏部分地区归他主持的扎什伦布寺管辖。

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之例，册封班禅五世洛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从而确立了班禅额尔德尼在藏传

佛教格鲁派中的地位。洛桑益西为第五世，罗桑曲吉为第四世，前三世为后人追认。

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军事侵略西藏之时，年轻的九世班禅在抗英这个问题上，与十三世达赖态度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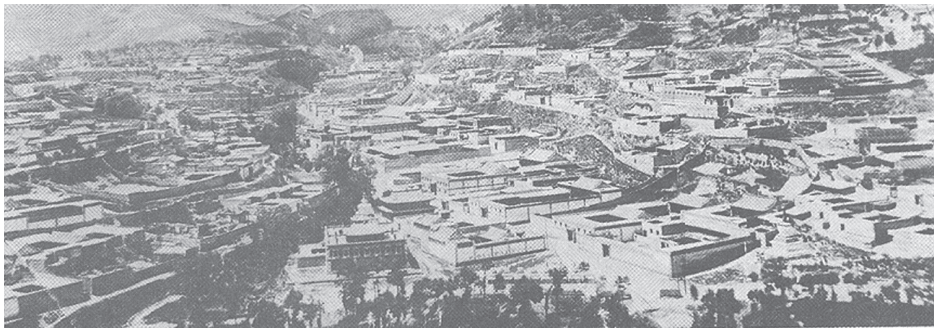


九世班禅在内蒙的行宫又叫东克尔殿，建于1930年，是乌珠穆沁右翼旗和硕车臣亲王索南拉布丹为九世班禅来此地咏《东克尔》经而建的。这座殿堂兼具蒙藏建筑艺术风格，也是两个民族相互往来的实物见证。

1904年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被迫出走，清廷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九世班禅并未接受朝廷这一旨令，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为借口推脱，但此事却埋下达赖班禅间矛盾的隐患。

1905年9月，驻江孜英军大佐鄂康诺率兵赴扎寺，“挟制”班禅去印度。班禅在印月余，坚持爱国立场，“未稍屈节”，在驻印钦差张荫棠协助下，得以返回扎寺。1909年达赖喇嘛返藏抵达那曲时，班禅亲去迎接，达赖受英帝挑拨，对班禅态度冷淡。次年达赖逃亡印度，请求英帝庇护，清廷又令班禅代理，班禅仍“坚决辞谢”未就。

1935年8月13日起，九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举行了（第八次）时轮金刚法会。图为当年塔尔寺的全景。



1912年7月，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钟颖为驻藏办事长官；10月，袁世凯恢复达赖喇嘛封号；同时册封九世班禅。12月底十三世达赖返回拉萨，前后藏矛盾加剧。1914年班禅动工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扎什伦布寺强巴佛殿。同年冬，噶厦在日喀则增设基宗(后藏总管)，强行接管扎什伦布寺所属庄园牧场。1921年又将军费的25%强迫该寺负担。1923年扎什伦布寺主要官员找噶厦交涉，一到拉萨就被逮捕入狱。班禅看到不仅他的固有地位与职权无法保持，就连生命也有危险，遂于11月15日夜离开扎什伦布寺，出走祖国内地。

班禅一行经过格尔木、安西，于1924年5月4日到达兰州，受到北京国民政府迎护专员及当地军政各界和群众的隆重欢迎，得总统“致忠阐化”封号。12月针对军阀混战，班禅在西安发表通电，拥护五族共和及国家统一，呈请各军事首领停止纷争，共保和平，致力建设。1925年2月2日，在国民政府官员和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北京，抵政府预设的中南海瀛台行辕驻锡。8月1日段祺瑞颁金册金印，增封班禅“宣诚济世”称号，同时批准成立班禅驻北京办事处。

以后又陆续成立班禅驻青海、驻四川、驻奉天(沈阳)、驻绥远(呼和浩特)以至驻印度办事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派人来北京慰问班禅并征询治藏意见，班禅又成立驻南京办事处。



1931年、1936年、1946年西藏地方政府人员三次出席国民大会，九世班禅和其他一些西藏地方的知名人士还被选举、任命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图为九世班禅与出席国民大会代表的合影。

1931年5月，班禅应邀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10月班禅发表“西



历世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

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讲话。7月1日国民政府颁玉册玉印，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九·一八”事件爆发以后，九世班禅通电全国，声讨日本的侵华罪行。1932年11月班禅赴南京，12月荣任“西陲宣化使”职务。次年3月，向国民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十六条意见及三项先决条件。1934年1月，班禅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5年3月班禅提出回藏计划。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以反对中央派员护送和班禅带卫队进藏的名义，拒绝了九世班禅返藏的要求。

1936年6月15日，班禅一行在中央政府专使护送下取道甘南拉卜楞寺，于年底到达青海玉树。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规模侵占华北，全面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好决定暂缓九世班禅返藏的行动。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情况下，班禅也发表了《告西陲同胞书》，号召藏蒙人民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并亲自主持大法会祈祷抗战胜利，捐款五万元慰问前方将士。

在此期间，班禅回藏被阻，心情压抑，更闻日寇大举侵犯，遂忧愤成疾。11月起他的左肋开始剧痛，饮食锐减。1937年12月1日不幸圆寂于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享年54岁。

国民政府派特使戴传贤致祭。九世班禅在祖国内地先后逗留了14年之久，生前也一直无法回到自己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在他圆寂的4年后，1941年九世班禅法体被迎抵扎寺灵塔祀殿，后世信众虔心供奉和纪念这位杰出的反帝爱国的宗教领袖。

十四世达赖的寻访与坐床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本名拉木登珠，青海湟中人，由格乌仓活佛等寻访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1940年经国民政府批准“免予掣签”，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图为当时的坐床典礼。

据藏文《达赖十三世传》载：1933年(藏历水鸡年)10月30日下午6时半(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跌坐圆寂”。

国民政府据蒙藏委员会12月21日报告，决定明令追赠达赖封号，并通令各省隆重祭悼。

同时，三大寺和噶厦启动了寻访达赖转世灵童程序。

现代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编述，国民政府文书也有详细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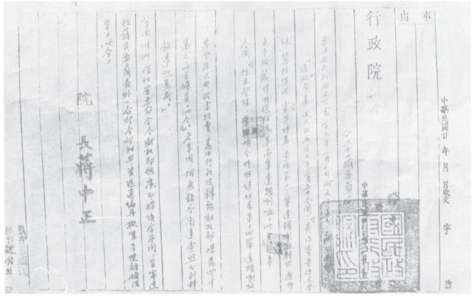
为了探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是否已经出生，转世在何方，首先向各本尊祈祷，请求各位佛教大师指明，特别是以丰盛礼品供祭位于曲科杰寺山上的神女魂湖拉姆拉措，并依照惯例于

藏历木猪年（1935年）五月，摄政热振活佛三次前往该寺东北方向的天女魂湖观湖景。回到拉萨后，他把湖中显现的景观写在一张纸上，交与当年六月五日召开的内部会议，上面写到湖中显现出藏文印刷体的“阿”、“嘎”、“玛”字，然后出现一个三层高楼，中层琉璃瓦，顶尖上有红铜镀金镶盖的寺庙，该寺东方有一条清晰小路一直延伸到小山冈跟前，侧旁有一座蓝屋顶的平房等内容。

西藏小型议事会议决定，选定合适人员分三路去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前往青海的格乌仓活佛及助手们在安多一带寻访，终于在塔尔寺附近一个叫夏麦达次（当采）的小村子里发现了木猪年五月五日生于祁家的一个小男孩，名叫拉木登珠，具有与众不同的吉兆，在该地僧俗中广为流传，特别是该男孩出生地的景致与热振活佛从观湖中看到的景象完全一致，因而格乌仓活佛等认为该男孩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向青海省政府提出迎回西藏的要求。



行政院令，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拨坐床典礼经费40万元。



国民政府明令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文件。

1938年9月22日，西藏驻京办事处代表阿旺桑丹、格登恪典、图丹桑结等电告蒙藏委员会报告寻获灵童，并希望将其送西藏掣签认定，电称：“达赖佛转世事，经民众代表寻访结果，西藏内部寻得灵异幼童两名，西宁塔尔寺方面寻得灵异幼童一名。依照

西藏宗教仪式，所寻选之幼童应聚集西藏，降驾掣签，认定真正达赖之转世，既多灵异后，复经庄严之金本巴瓶内典礼拈之。现典礼期将近，关于西宁塔尔寺地方所寻选者，请中央政府俯允该主持人员，迅将寻选幼童送至西藏，参加典礼并恳发给执照，以利行程。”

由于时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推诿拖延，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呈报给国民党中央政府，于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令马步芳护送达赖喇嘛的灵童入藏，并拨给护送费10万元。1939年7月15日，马步芳派出卫兵百余名，令马元海师长率领护送灵童，从西宁启程赴藏，10月7日抵达拉萨。

10月12日，摄政热振活佛和十三世达赖侍读达札两人分别担任转世灵童的正副经师。13日，灵童被迎请到大昭寺，在释迦牟尼佛、主尊达苏玛佛、扎西多卡玛佛、林嘎玛度母等像前由摄政热振为转世灵童剃去发辫，并为他取法名为强白阿旺罗桑益西丹增嘉措斯松旺久宗巴麦贝迪，简称丹增嘉措。

1938年12月12日，热振摄政致蒙藏委员会电报称：“达赖大师转世之化身三灵儿，已蒙转电青海省政府督促纪仓佛速将西宁所选灵儿送来拉萨，良深感慰。所有中央派员参加办法一则，业经与司伦、噶厦商议，三灵儿迎到后，举行掣签典礼之际，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母及兄弟姐妹。



1940年2月，国民政府专使吴忠信（左）在罗布林卡荷亭看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拉木登珠。

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当派员参加。”2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1939年4月23日，西藏驻京办事处奉转噶厦致蒙藏委员会代电称，现吴委员长既拟亲临拉萨，藏方极表欢迎。

国民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取道印度前往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1939年10月21日，吴忠信率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人员由重庆启程，途经香港、仰光、加尔各答，由亚东入藏，1940年1月15日抵达拉萨。

热振于1月26日向吴忠信递送了一份函呈，并请转报中央政府批准青海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免予掣签。函中提出，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确系十三世达赖化身，“因群众情投意合，不须掣签，照例剃发受戒，业已呈报中央在案。兹遵乃冲大神所示，庚辰年坐床为吉，谨诹定正月十四日举行坐床典礼，其应如何转中央之处，即请代达为荷”。吴忠信接到热振摄政函呈后，同热振商定于27日察看灵童，待当面考察之后，再将热振报告及吴本人对灵童察看情形一并转呈中央。由于双方在见面形式的问题上认识差别较大，直至1月31日，吴忠信才得以赴罗布林卡荷亭内察看灵童。

根据吴忠信的报告，行政院长于1940年1月31日具呈，向国

民政府呈请明令批准拉木登珠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并发给坐床典礼经费。

2月5日，国民政府根据行政院上述呈报，发布命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

1940年2月17日，热振摄政复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中央政府特准拉木登珠免予掣签，继任为十四辈达赖喇嘛，赏拨坐床大典经费并颁授金印勋章，表示感谢。

吴忠信委员长到达拉萨时，按惯例受到了噶厦的欢迎和款待，尽管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的主持和座位安排等方面发生了不少争执，但吴忠信按照中央政府的旨意，不仅坚持了西藏为祖国神圣领土的原则，还根据热振活佛的业绩，封他为"辅国普化禅师"。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如期于1940年2月22日（藏历一月十四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典礼极为隆重严肃。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从拉萨向中央通讯社发了电报。

热振事件原委



第五世热振活佛和国民政府特使黄慕松的合影。（德木·丹增嘉措摄）

1933年12月17日，长期掌管西藏政教事务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西藏上层各种政治势力开始了权力之争，经“西藏国民大会”讨论，决定请热振活佛出任摄政。按照历史定制，噶厦通过驻京办事处呈报国民政府中央，得国民政府行政院复电批准（1934年1月26日）。1934年2月23日，22岁的五世热振活佛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正式出任摄政。

摄政，即在达赖喇嘛灵童未寻获及灵童坐床尚未达法定年龄（18岁）之前，代行达赖喇嘛职权之人。这一定制始于18世纪中叶。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一时无人主持，



热振活佛的驻锡之地热振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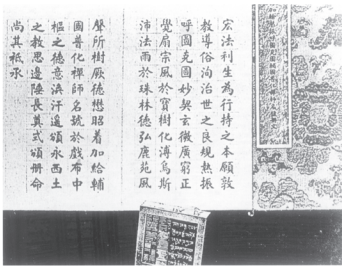
乾隆皇帝遂委任第穆呼图克图为摄政，赐给“掌管西藏事务者持黄帽教吉祥诺门罕之圣印”。从这年起，有清一代，先后有11位呼图克图（大活佛）出任摄政，五世热振就是其中之一。



摄政热振活佛（中）和他的近侍官员。

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后，西藏局势暂时稳定，他亲近中央，维护统一，力主改善与中央政府关系，曾领导拉萨三大寺念经祈祷中国抗日胜利，周到接待国民政府莅藏大员，赞同中央政府在藏设立办事处；在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热振活佛按照历史定制，多次向国民政府报告过程，请求得到中央批准和帮助。1940年，国民政府授封他“辅国普化禅师”封号；并在国民政府五届六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由于五世热振这些维护祖国统一的活动，严重打压了亲英卖国势力，因而遭到噶厦内部亲英势力的嫉恨，他们多次对热振活佛造谣毁谤，并利用宗教降神方式，散布说热振有三年厄运，需要闭关静修，才能化凶为吉等等，逼迫他下台。为了缓和对立，热振活佛再三权衡，决定暂行引退，静修三年，由其师傅达扎·阿旺松绕代理摄政。



国民政府颁授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册文及印（1940年）。

1941年1月16日，五世热振向国民政府、蒋介石电报呈报，称寻访达赖喇嘛灵童这件大事业已完成，因自己“身体精神羸弱，政

务殷繁，更兼才疏学浅，深感不胜”，故向达赖喇嘛和三大寺藏政府大会辞职，决议通过。蒙藏委员会于23日给噶厦去电，内称：“奉行政院令，据转呈西藏新任摄政达扎佛电报就职日期一案，经呈奉国府令准备案等因，特达。”

1941年2月底即藏历铁蛇年1月1日，达扎·阿旺松绕正式接任摄政，五世热振活佛回到其世代驻锡地：林周县热振寺。

达扎原为拉萨堆龙县一个小寺达扎寺的活佛，此时年届七旬，他上台后很快被亲英势力包围，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1942年，噶厦擅自设立“外交局”，1943年达扎任命亲英分子扎萨索康·旺钦次登（噶伦索康·旺钦格勒的父亲，是著名的亲英派分裂分子）为总管。随后，他在西藏地方内政外交上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的政策改弦更张，企图使西藏脱离祖国。他利用自己的权威，有计划地铲除五世热振在噶厦中的支持者，让亲英分子索康·旺钦格勒取代朗穷娃的噶伦职务，让自己的心腹降央·吉钦绕丹取代拥护五世热振活佛的色拉寺杰扎仓大喇嘛阿旺丹增的基巧堪布（总僧官）职务，让仇视五世热振活佛的夏格巴·旺秋德丹（卸任噶伦赤门·鲁布旺秋的侄子）取代哲玉娃任孜本。这些人事变更，使得五世热振活佛与达扎之间的矛盾日渐白热化，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代理摄政3年期满后，达扎却丝毫没有交权的意思。

达扎的这种背信弃义激怒了五世热振活佛和他的盟友，他们寄希望于国民政府的支持，五世热振活佛表示，“只要中央支持我重新当政，一定为增进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作贡献”，并委托他的两位好友四川省甘孜藏区的国大代表直霍尔·普顿朗和拉嘎尔·普土多在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期间向中央输诚。

达扎下手了，他召集噶伦会议，决定秘密擒获五世热振。1947年4月14日，索康·旺钦格勒、拉鲁·次旺多吉两位噶伦及藏军

总司令格桑楚臣率领扎齐代本团的200名藏军，星夜出发，直奔林周县的热振寺，将五世热振活佛逮捕带回拉萨。18日，达扎以“谋叛”罪将五世热振囚禁，期间国民政府曾设法营救，色拉寺杰扎仓的僧人也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劫狱，结果都失败了。5月7日，五世热振活佛暴毙于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

热振活佛遇害的消息传到热振寺后，热振寺的僧侣悲愤莫名，500多僧侣武装起来，将驻扎在热振寺内的20多名士兵杀死。达扎命噶厦调集地方士兵1000多人，包围热振寺。双方激战七昼夜，热振寺僧侣以兵力悬殊，终为达扎派遣的藏军武力镇压。紧接着，达扎·阿旺松绕等操纵的“民众大会”决定，革除热振活佛的呼图克图封号，只保留第二等措钦活佛名号，不许为五世热振活佛寻访转世灵童，没收热振寺大部分田庄和产业，对五世热振活佛的追随者处以终身监禁和流放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热振事件”，其本质还是西藏爱国势力和分裂势力的政治较量。

“热振事件”后，西藏地方的政策朝着外向的方向迅速发展，使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日益疏远。

两次“驱汉”事件

在西藏近代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驱汉”事件，其背后隐藏着的是同样的潜流：在中国内地政局混乱、中央政权更替的时候，境外分裂势力就插手西藏事务，企图通过驱除中央驻藏的官员、军队以及从内地去的商人和民众等，以此来推动所谓的“西藏独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政府而独立，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迅速制定了一套控制与分裂中国西藏的新政策。英印殖民政府在一份名为《关于印度东北边境毗邻国家形势的备忘录》的文件中，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改为“宗主权”，提出“西藏名义上保留其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但实际上则应置于绝对依赖印度政府的地位，并必须建立一个一方面排斥中国人，另一方面排斥俄国人的有效机构。”①

新政策出台后，印度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特赴大吉岭，与因1910年清政府派遣新军进入拉萨时逃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会晤。长时间密谈后，达赖于1912年1月派遣达桑占东返藏，到各地和寺院串联，组织民军和藏军，包围与攻打拉萨、日喀则等地



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拉萨。

① Memorandum resecting the Situation in the Countries Bordering on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of India，India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见Enclosure in No.177，FO.535，Vol.15，141页，145页，转引自《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481页。

的清朝驻藏军队。

1912年3月，噶厦以达赖名义发布文告，通告全藏之营官、喇嘛攻击各地汉军。“驱汉”文告发布后，达桑占东很快组织起大约一万人的“西藏民军”，使用英国供给的军火，首先向驻防江孜的清军发动进攻，江孜驻军奋力抵抗，双方展开激战。4月初，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赶到江孜，见“藏军缺乏战斗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又缺少好的指挥将领”，就联合尼泊尔驻拉萨官员拉尔·巴哈都尔(Bahadur)出面“调停”。双方谈判后议定：藏方出9250卢比，换取江孜驻军的144支来复枪和剩下的全部弹药；藏方免费供给驻军口粮，而驻军则缴出全部枪械，由藏军护送出境，从印度回国。

之后，达桑占东指挥民军包围日喀则驻藏清军，并以同样的手段，由麦克唐纳出面，以“调停”为名，强迫清军交出武器弹药，由西藏方面发给路费，取道印度返回中国内地。

江孜、日喀则的驻藏清军被逐出境后，达桑占东即向拉萨的代理驻藏大臣钟颖及驻军开战。双方打了四个多月，各有胜负。驻藏清军被长时间断粮后，拉尔·巴哈都尔又出面了，双方谈判后商定：各方停战，除驻藏大臣私人卫队外，所有汉族士兵经印度离开西藏。到1913年4月，驻藏满汉官员、汉商和汉族民众有的



1947年，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电台、小学、测候所官员及眷属、汉商及眷属合影。



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官员们:(右起)沈宗濂之警卫陈长生、李有义、沈宗濂、李国霖及警卫等。

惨遭杀害,有的被困饿而死,有的被驱逐出境,几乎无一遗留。这是发生在清朝覆亡后的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驱汉"事件。

1949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完成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被迫"引退"的消息传到西藏,引起上层不安。他们感到国民政府垮台在即,人民解放军迟早会进攻西藏,遂于2月与印度驻拉萨使团团长黎吉生会商,请求印度政府尽快向噶厦运交曾答应提供的武器弹药,并派遣军事教官帮助训练藏军。

第二次"驱汉"事件的具体起因,据当时任羌基(噶厦主管那曲地区事务的官员)、后任藏军司令部仲译的土丹旦达回忆:在噶厦制造"驱汉事件"前,印度驻拉萨使团团长黎吉生曾把当时任噶厦"外交局"局长的札萨柳霞·土登塔巴和札萨索康·旺钦次登叫去,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并直接"说出了不少人的名字和地址"。两个札萨立即报告噶厦和摄政。摄政达扎迅即召集全体噶伦和其他重要官员共15人举行秘密会议,研究商定必须尽快驱逐目前在藏的所有满汉人员。

为此,噶厦调整兵力部署,将藏军第六团从日喀则调到拉萨;又组织大批僧俗人员举行以诅咒汉人、共产党为目的的"扣锅"、"驱鬼"等宗教仪式。所有活动黎吉生一直参与。

据时任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回忆:"1949年7月8日,噶厦派员请我去有要事面谈。……由首席噶伦冉巴发言,大意是:……西藏民众大会决议:西藏政府对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

关系，而宗教关系还是存在的。请你并转告其他机关准备于两星期之内启程赴印……”陈锡章表示需要请示蒙藏委员会，得复电后再答复。冉巴却说：“国民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您不必再行去电，现在所有电报邮件均已封锁，您也无法通信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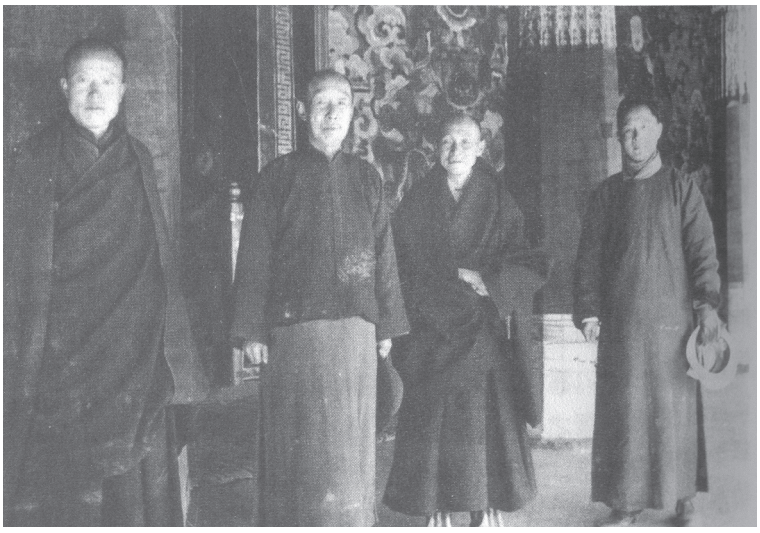

沈宗濂与西藏“外交局”局长索康。

陈锡章从噶厦返回，发现藏军已经包围、看管了驻藏办事处，封闭了电台。随后，办事处下属的小学、测候所等单位也被看管起来。

7月9日，噶厦向已从南京撤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去电报，并于7月11、17、20日派藏军分三批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和国民政府其他机构驻藏人员及其家属，以及部分汉族商人、手工业者共130余人押解至印度边界，迫使他们返回内地；同时密电昌都总管署，“今年要驱逐在拉萨的所有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在你们昌都除汉族商人外，也要驱逐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并详细开列了被逐人员的具体名单。

“驱汉事件”名义上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实质则为借国民党在战场上失败为理由，驱赶中央驻藏机构，企图行“独立”之实。噶

① 陈锡章《西藏从政记》，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1947年，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左二）与他的英文秘书柳陞祺（右一）及在拉萨寺庙修习的汉僧合影。

厦这样做显然有人指点和帮忙。美国政府档案证明，“驱汉事件”刚刚发生，印度驻拉萨使团团长黎吉生立即致电印度政府，请求作好接收被从西藏驱逐出来的300名中国国民的准备工作。他们是：（1）共产党人；（2）与共产党人有联系的官员；（3）其他中国官员；（4）其他中国公民。新德里回电同意接受最后两类人，这才使被逐人员能迅速从印度过境回国。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喜讯传到甘、青、川、滇广大藏族地区，各界藏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在塔尔寺坐床不久的第十世班禅大师，在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并致电负责解放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进军西藏途中。（蓝志贵摄）



1951年8月28日，西北西藏工委改名为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出发，踏上进军西藏的征途。

司令员彭德怀，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给班禅大师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主要由第二野战军担负，同时要求第一野战军予以配合。1月中旬，二野十八军接到了进藏的命令。其他将从新、青、滇入藏的部队，也陆续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部署进军的同时，也拟定了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遵照上述原则，青海省委、西南局分别拟定了几项谈判条件，5月27日，经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亲自修订为十项条件，经中央批准，被称为“十大政策”或“约法十章”，为后来签订的



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向张国华将军敬献哈达。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当时坚持“西藏独立”立场的达扎和噶厦派出夏格巴·汪秋德丹等人，于1950年2月2日到达印度新德里，并在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后，于3月15日致函中国驻香港办事机构，公然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同中央政府谈判。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就西藏代表要求在香港与中央谈判问题答复记者提问时，指出“西藏独立”是错误的，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北京谈祖国统一问题，并且也因此才能受到中央的欢迎。

与此同时，中央先后派出三批劝和团前往西藏，表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汉族高僧志清法师一行被阻于金沙江以东的甘孜大金寺；塔尔寺当采活佛一行，到达聂荣宗被阻，其中当采活佛面见达赖后，很快出国，开始了他鼓吹“西藏独立”的一生；白利寺格达活佛从甘孜启程，7月24日抵达昌都，但噶厦不允许他前往拉萨，8月22日，格达活佛遇害身亡，成为为和平解放西藏而献身的第一位藏族爱国高僧。



进军西藏的战士在途中与当地群众交谈。



1951 年，人民解放军向太昭进军途中翻越泥巴山。太昭位于今林芝境内，原名江达，即今日的工布江达县，曾是“工布四宗”之一，清政府在此设立太昭宗，是进藏的必经之处。（蓝志贵摄）

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一方面拒不接受中央政府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诚意，一方面用印度政府提供的武器武装藏军，并把他们派驻到与青海、四川交界处，另一方面广泛征集民军，加强对西藏地区的防守，这样，到1950年9月10日，噶厦陆续加强了昌都外围类乌齐、邓柯、江达、芒康等地驻军的防御兵力，并组织起边坝、硕般多、洛隆三地以及贡觉、察雅的地方武装开赴上述各地，总共部署了7000多名藏兵，负责防守从芒康、岗托南部到邓柯北部沿金沙江西岸的长达300多公里的边境。英国人福特、贝卡，印度人沙诺多吉、沙诺朋措等人也混入藏军，为藏军出谋划策或帮助架设电台，掌握电讯联络工作。噶厦部分官员的心愿，是凭借西藏险要的地理和已经用印度武器武装起来的藏军，将人民解放军抵挡在金沙江以东。另外，部分官员也寄希望于英国、印度，特别是反共的美国，会援助西藏以现代武器或军队、飞机等来“抵抗共产党”。达扎等人的心思和种种作为，使得一场中央政府竭力避免的战斗变得无法避免。

8月23日，毛泽东主席致电西南局，提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为实现这个“以打促和”的方针，西南军区于26日下达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要求十八军主力一部在青海骑兵部队的配合下迂回昌都以西，切断藏军退路；其余各部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向昌都攻击前进；以云南十四军一部，歼灭盐井的藏军，策应十八军行动。



1951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十七条协议》到达古城拉萨。图为入城式。

10月6日，西南军区下达战斗命令，昌都战役正式打响。十八军各部于邓柯、德格、巴塘横渡金沙江，其中的青海骑兵支队与52师154团8日在玉树会合，经囊谦迅速南下，越过荒无人烟的草原，跨过雪山冰河，又经36小时急行军后，进抵昌都西北部要地类乌齐，随后，与52师骑兵侦察连继续飞驰南下，19日拂晓袭占恩达，完全切断了藏军西撤退路；53师157团渡江后占领有利地形，对藏军第九代本形成夹击之势，并歼灭其一个连。11日，当部队进抵

宁静(今芒康)附近时，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

云南方向的十四军126团一营、二营及125团一营，由德钦、贡山地区出发，穿越横断山，分三路向第九代本一部所控制的盐井、碧土、门工地区前进，10月6日攻占门工，8日占领碧土，12日占领盐井，并向科麦及左贡方向进行佯攻，以配合兄弟部队作战。

随着解放军各部向昌都周围步步逼近，慌乱中的昌都总管署以及大部藏军人马于18日向西撤退。得知解放军已控制恩达切断其退路后，20日，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总管署和藏军第三、第八、第十以及其他藏军和民兵2700余人放下武器。昌都战役自10月6日开始，24日结束，历时18天。昌都战役的胜利，推进了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

在解放西藏的整个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进军后藏和阿里地区的任务。昌都战役开始前，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就派出一个先遣连135人，于1950年8月1日，由团保卫股股长李狄三率领，从南疆于田县出发，翻越山势险峻、高寒缺氧的昆仑山，经近3个月的艰难行程，10月底进入阿里改则县的扎麻芒保，并通过模范执行“十大政策”，使阿里地区总管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向毛主席致电，表示将“报请达赖活佛，让藏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新疆军区派出部队，进驻阿里地区边防。

阿沛·阿旺晋美与《十七条协议》

1911年，在拉萨以东100多公里的墨竹工卡县甲玛沟谷，传说中吐蕃一代英主松赞干布的诞生地、一个名为甲玛赤康的庄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霍康家新添的男丁，取名霍康·阿旺晋美，据说，霍康是成吉思汗后裔与当地藏族结合繁衍的贵族世家。

阿旺晋美从小聪慧过人。受母亲影响，他从小拜蔡公塘的宁玛派达仓活佛为师，学经修行。8岁到拉萨上私塾，14岁转到雪印经院私塾，拜当时在拉萨校勘大藏经《甘珠尔》的青海著名学者格西·喜饶嘉措为师，学习诗词韵律和藏文文法。

阿旺晋美青少年时代，正值西藏政治风云多变，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每次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霍康家族，也对他震动极大。19岁时，他接替母亲管理甲玛赤康庄园。

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组建仲扎玛尕藏军兵营，征召贵族和差巴大户的子弟当兵。阿旺晋美作为霍康家后裔应征入伍，先后被任命为班长、代理排长、右营营长兼领左营，由此打开了他的仕途之门。



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右一为阿沛·阿旺晋美，右二为朵噶·彭措饶杰。

1935年，24岁的他入赘到阿沛家，与其女主人才旦卓嘎成亲。阿沛家是西藏古老的贵族世家，工布地方的显赫家族。按照西藏



195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团抵京。手捧鲜花者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

旧制，他从此成为阿沛家的合法继承人，被称为“阿沛·阿旺晋美”。当年，经噶厦批准，阿旺晋美作为阿沛家族封爵继承人，官列四品，随后被任命为新任昌都总管的颇本(粮官)。1940年任满回到拉萨，由摄政五世热振活佛任命为协尔邦，即西藏地方政府的检察审判官，负责检察审理全藏发生的人命案件。由于阿沛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公正，博得了很好的声誉。1945年11月，被噶厦委任为孜康孜本(审计官)。

1950年4月，阿沛被任命为增额噶伦兼昌都总管。10月昌都战役结束后，阿沛与在昌都的40余名西藏地方军政官员共同商议后，联名写信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目前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建议迅速派高级官员去北京谈判，“如果在那里派代表有所不便，亦可从此处官员中委派”。这封信由阿沛的亲信官员金中·坚赞平措和桑林日夜兼程送往拉萨。半月后，阿沛再次发出第二封类似信件，忠告拉萨：“如汉藏和平谈判不能很快进行，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是肯定无疑。”

从10月20日起，噶厦在罗布林卡召开了好几次有噶伦、基巧堪布、仲译钦波、孜本以及三大寺堪布等僧俗官员参加的“西藏全区大会”，是“战”是“和”意见很难统一，最后会议只好采用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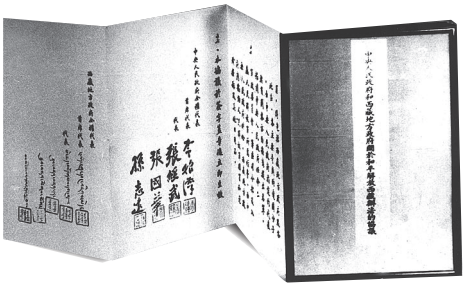


《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

神问卜的办法，10月26日在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寝宫里，乃穷和噶东护法神都匍匐于达赖喇嘛座前，转达护法神的谕旨说只有达赖佛亲自掌权才能消除灾难，维持政教昌隆。这样，达扎被迫“辞职”，噶厦以“神意”于11月17日为当时仅16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举行了亲政仪式。

达赖喇嘛等人于1951年1月2日抵达亚东，组成“亚东噶厦”，在向国外谋求支援被拒绝的情况下，1月18日，达赖致信中央，报告了他亲政经过，表示了谋求和平的愿望。随后，他任命阿沛·阿旺晋美等为西藏地方谈判代表，赴北京与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1951年春，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门(堪穷，四品官)、桑颇·丹增顿珠(第二代本，四品官)、凯墨·索朗旺堆(藏军总司令)、土丹旦达(噶厦译仓仲译钦波，即秘书长)先后到达北京，在北京站，分别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国家领导人和首都数千民众的热烈欢迎，随后下榻当时最好的北京饭店。



《十七条协议》的汉文文本。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和谈代表是，首席代表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张经武（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国

华（西藏工委书记、第十八军军长）、孙志远（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4月29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经过长达25天、7轮谈判，双方在西藏的主权归属、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改编藏军、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军政委员会和班禅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5月23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中南海勤政殿庄严举行。签字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陈云副总理主持。双方代表签字完毕后，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和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先后致辞。

西藏地方政府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致辞说：

“这一次，我们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响应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来到北京参加光荣的有历史性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在北京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者是我们祖国的更是我们藏族人民的最大敌人。也使我们认识到，藏族内部必须消除过去帝国主义和历代反动政府制造的分裂。由于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感召，藏族内部自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之间以来的长期的不和睦，也得到公平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很光荣地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藏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回到我们自己平等、友好、互助、团结的祖国大家庭里来！”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主席举行盛大宴会，祝贺《十七条协议》成功签订。宴会上毛主席与西藏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亲切交谈。

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这次谈判中，发

挥了主导和中坚作用，许多问题，如其中的班禅问题，中央代表都是先与他沟通、协商后，他再解释、说服其他西藏代表，达成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坚持下，与《十七条协议》一起，5月23日还签订了两个协议附件，其中附件二对达赖喇嘛进行了特别关照，即“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一年内，如因某种需要，得自行选择住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

9月12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带着《十七条协议》正本回到拉萨。拜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汇报了和谈经过。随后又在西藏官员会议上，与其他谈判代表一起，分别向官员代表介绍了昌都解放和签订协议的情况，“情况介绍以后，官员代表说了很多赞扬之词，同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后来报告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就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表示完全同意十七条协议，表示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保卫边防。这个致敬电，至今还存放在西藏历史档案馆里。”(《阿沛·阿旺晋美回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和平解放西藏》, 219页)。

达赖喇嘛致毛主席的致敬电电文全文为：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1951年10月24日

藏历铁兔年八月二十四日

1955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担任筹备处处长，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他当选为第一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后改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之后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担负起领导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任。1987年，他创建了“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1989年，他与十世班禅创建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2004年，他又创建了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

2009年12月23日，阿沛·阿旺晋美走完了他辉煌的百年人生。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西藏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给了西藏各族人民美好的今天。他的工作和辉煌业绩赢得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广泛信任和爱戴。中国人民将会永远怀念这位优秀的藏族爱国者和杰出的民族工作者！

十世班禅大师

1952年6月23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及其堪布厅荣归日喀则，结束了自1923年九世班禅流亡内地、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其世代驻锡地扎什伦布寺。

十世班禅确吉坚赞(1938—1989)，俗名宫保慈丹，公元1938年2月3日(藏历第十六绕迥之土虎年正月初三)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一个藏族农民家庭，父名贡布才理，母名索南卓玛。第九世班禅圆寂后，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派出僧俗官员组成的转世灵童寻访团寻找第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选定当时3岁的宫保慈丹为转世灵童候选人，在塔尔寺供养，并以堪布会议厅扎萨喇嘛罗桑坚赞的名义，报告当时的中央政府，请求批准。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确认宫保慈丹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准其免予金瓶掣签，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十世班禅既经国民政府批准，获得继承九世班禅职权的合法地位，并按宗教惯例，举行了剃度、受戒等仪式，取法名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同年8月，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作为专使，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为副专使，在塔尔寺主持了坐床典礼，并颁发汉、藏合璧的“西藏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印鉴”。关吉玉代表代总统李宗仁给十世班禅送了390两重的黄金一块，表示祝贺。坐床后，由嘉雅活佛任经师，传授佛经。



1941年，青海循化县儿童宫保慈丹(1938~1989)被选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即后来坐床的十世班禅确吉坚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代表全藏人民“致崇高无尚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慰问，勉励班禅“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1951年4月，十世班禅又亲自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官员到北京，表示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心，并积极推动和支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谈判。

在《十七条协议》中，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五条“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第六条“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这些条文是对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世系历史形成关系的客观评述，体现出中央尊重西藏历史、尊重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特殊地位及职权，为离藏39年的班禅活佛及其堪布会议厅人员返回西藏，维护固有地位及职权，为消除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之间的历史积怨，促进双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团结，处理好西藏内部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原则基础。实际上，《十七条协议》为十世班禅返回西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最好的保证。



1949年8月，国民政府派专使关吉玉到青海塔尔寺为第十世班禅确吉坚赞（中）主持坐床典礼。

1951年5月24日上午，十世班禅大师率堪布厅主要官员向毛主席致

敬，献吉祥哈达、藏汉两文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锦旗、“毛主席万岁”金盾及曼扎、佛像等。当晚，毛泽东主席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和平协议签订，班禅大师、阿沛噶伦等出席。28日，班禅大师及堪布厅发表声明拥护和平协议。30日，班禅大师致电达赖喇嘛祝贺和平协议的签订，表示愿“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执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7月1日，十四世达赖复电班禅，欢迎他即速启程回藏。



西藏和平解放后，十世班禅自青海启程返藏。图为1952年6月9日，十世班禅返回日喀则途中，渡过雅鲁藏布江的情形。当时班禅坐在三个皮筏子连在一起的船上。（李九龄摄）

1951年12月19日(藏历十月十七)，青海省领导和各族各界隆重举行欢送大会，十世班禅大师一行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助理代表牙含章(代表范明，已经进藏)的护送下乘车离开西宁，历时4个月，于1952年4月28日到达拉萨，受到噶厦、三大寺、拉萨市民和中央代表张经武及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等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十世班禅在布达拉宫与十四世达赖会面，从而实现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西藏内部大团结。

8月25日，十世班禅在给毛主席的《返藏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我和行辕全体人员得以光荣返藏，并根据和平协议的规定，后藏所属百姓的差役已恢复到了清朝乾隆癸丑(公元1794年——编者注)年的规定，负担大大减轻，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后藏僧俗官员民众，莫不感激万分。”

1954年9月，十世班禅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班禅任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在此后的40多年里，十世班禅历经平叛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虽然历经坎坷，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祖国、对家乡和他的信众的热爱，他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事业心，奋力工作，积极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他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拥护中央政府为西藏工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多次去各地和藏区视察，足迹遍及整个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作为无量光佛的化身，他所到之处，总是把吉祥、欢乐带到那里，为藏族地区平安幸福殚精竭虑。

1989年1月21日，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在扎什伦布寺主持第五至第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

1952年6月23日，十世班禅一行抵达日喀则，日喀则郊区集聚了6万多人欢迎。有许多僧侣、百姓在此等候了一个多月，看见班禅时不少人更痛哭流涕，场面感人。（李九龄摄）





1956年，十世班禅高坐在扎什伦布寺法台上讲经。扎什伦布寺为历辈班禅的驻锡之地，位于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陈宗烈摄）

后，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终年51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在悼词中评价十世班禅大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



十世班禅大师主持时轮金刚法会的画像。（安多强巴绘于1987年）

川藏、青藏公路通车

195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在拉萨隆重举行，从此，西藏高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的建设开始起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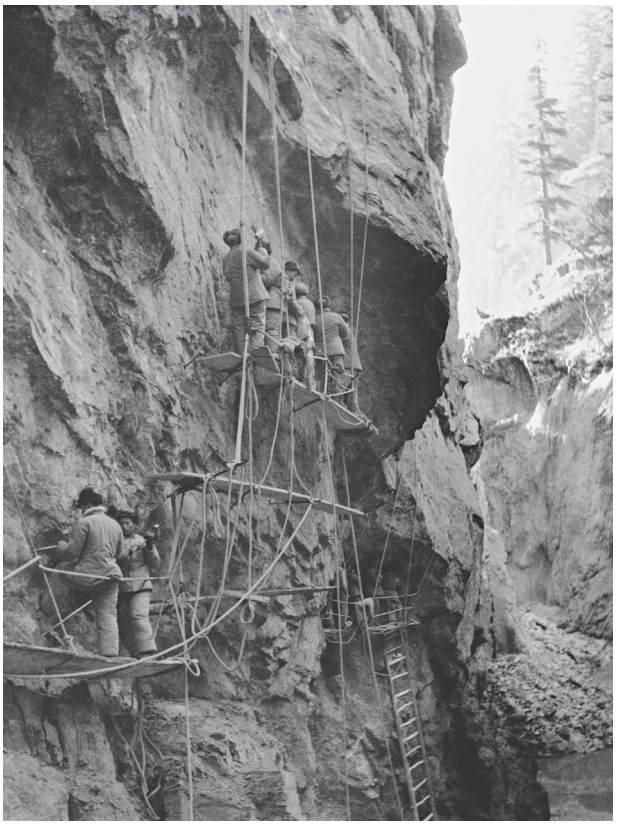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西藏根本谈不上有公路，更不用说正规的公路。

史料记载：和平解放前，由于受历史原因、地区经济能力和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西藏的道路多是长年人畜往来走出的，山里有羊肠小道，间或可见简陋的栈道、云梯，偶尔的天堑可见铁索桥，十分险峻，状况极差。我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白眉初（1876~1940）在他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记载了西藏的交通情况："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可见要想在那里（主要指康藏公路段）修路是多么艰难、多么危



1954年 年底，汽车第一次开进拉萨时的情景。（蓝志贵摄于1954年）

险。日光城拉萨算是西藏高原像样的城市了，人们的交通工具多是牲畜骡、马、驴、牦牛和木轮的马车、驴车，这还是贵族、官员、大商人才有权享用或享用得起的。



康藏公路修建过程中，筑路部队悬空打炮眼。（蓝志贵摄于1952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从印度买过一辆小汽车，运回西藏却费了不少周折，因为没有路——先是将车大卸八块地拆成可搬运的零件，再由驮队小心翼翼地运到拉萨，请外国技术人员前来组装。装好的汽车仍然无路可走，达赖喇嘛也只能在罗布林卡院里开上几圈过瘾，最终这车成了一堆废钢铁。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从川西进藏，毛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1年3月，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成立，第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任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穰明德为政治委员；5月6日，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动工修建。昌都战役结束后，抽调大部分兵力投入甘孜—昌都段公路的修筑任务。这段公路长达445公里，海拔3500~5300米，越过6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山。部队先后投入3万多人，另有康藏公路工程处技工9000余人。

1953年2月17日，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动工修建。部队及



第十八军后方筑路部队打通怒江天险。（蓝志贵摄于1952年）

康藏公路技术人员16000余人由昌都向拉萨方向施工；4月20日拉萨至太昭一段，也组调进藏部队、技术人员以及1.6万名藏族民工由拉萨向昌都方向施工。西段工程由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联合成立的筑路委员会领导，谭冠三为主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青格来为副主任。在修路过程中，筑路指挥部给藏族民工发工资发实物，解放军帮助藏族民工学技术，关心他们的生活，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

1952年8月5日西北局在兰州成立西藏运输总队，总队长王宝珊、慕生忠任政委。慕生忠带领驮队从格尔木向拉萨抢运粮食时，也留心这里修路的条件。他们看到这里一路上远望是山近看是川，道路平坦山高坡缓，河多水不深，修路工程量不大，粗通公路预计需人力1000，时间半年，便决心修筑青藏公路。周恩来总理询问了情况说："青藏公路要修，它如人的手背，平坦易为，而且斩不断，炸不烂，非常保险。要急修，先粗通，然后再改善。……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并修。"

经国家批准于1953年夏季成立了修筑青藏公路指挥部，慕生忠任总指挥。经实地勘察决定边勘测边施工。1954年5月11日，西北军区配属运输总队一个工兵连、10辆汽车，青藏公路在格尔木动工修建。7月30日，修通了300余公里，到达五道梁，完成了第一期工程。9月中旬至10月20日，打通唐古拉山30公里段，11月11日修抵那曲，12月中旬粗通拉萨。修筑青藏公路用了7个月零4天，几千人施工，创造了高原上快速筑路的奇迹。格尔木至拉萨



修筑康藏公路的战士们在搭建简易住所。（蓝志贵摄于1952年）



1952年，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通车。（蓝志贵摄）

段公路跨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平均海拔4000米，全长1300公里。

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全线通车。康藏公路从雅安到拉萨全长2255公里，后改延长川藏公路（成都—拉萨），全长2416公里，青藏公路从西宁到拉萨全长2100公里（后经改建长1948公里）。两路共投入人力11万人，其中康藏公路达10万人。在4年多的筑路过程中，有3000多人捐躯在这条路上。通车典礼在拉萨举行，毛主席为公路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由于两路的通车，我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的补给供应问题得到了解决，对建设西藏、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青、川两路修成通车，对于西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把西藏和内地的距离缩短了，被西藏人民称作“金桥”。这两条路修通之后，又相继修了那曲至昌都、拉萨至日喀则、拉萨至亚东等区



1954 年 12 月25日，康藏和青藏两路同时通车。图为通车典礼一幕。这是从青藏公路开到拉萨的汽车队，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景。

内公路。到2004年，全区公路里程已达到41302公里，每百平方公里有3.2平方公里的公路。初步形成了以5条国道、14条省道、三纵两横6个通道为主的公路网络，基本上能满足西藏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西藏高原现在的交通状况，世人有目共睹。公路：青藏、川藏、新藏、滇藏四条公路畅通日光城拉萨，还有中尼公路通往友邻尼泊尔；民用航线：北京(京—拉)、成都(川—拉)、上海(沪—拉)、重庆(渝—拉)、广州(粤—拉)、成都到昌都、成都到林芝、拉萨到昌都等多条航线陆续开通，阿里的机场已经建成；区内更是县县通油路，乡村有公路，四通八达，交通极为方便。2006年，青藏铁路结束试运行正式通车，标志着高原交通网建设的全方位、多形式，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拉萨小学的创办

1952年8月15日，拉萨小学开学典礼隆重举行。主席台上就座的17位校董全是当时西藏政教界的名流，董事长张国华(进藏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副董事长赤江·罗桑益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绕噶厦·彭措绕杰(噶厦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噶厦噶伦、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擦绒·达桑占东(噶厦扎萨)、平措旺杰(西藏工委委员)和林亮；董事桑颇·才旺仁增札萨(后任噶伦兼藏军司令、西藏军区副司令)、凯墨札萨·索南旺堆(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之一，后任藏军总司令)、堪仲土丹旦达(噶厦译仓四大秘书长之一、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江乐金·索南加布(颇罗鼐郡王后裔、著名学者，受十四世达赖授台吉衔)、擦瓦赤珠活佛(曾任十三世达赖喇嘛侍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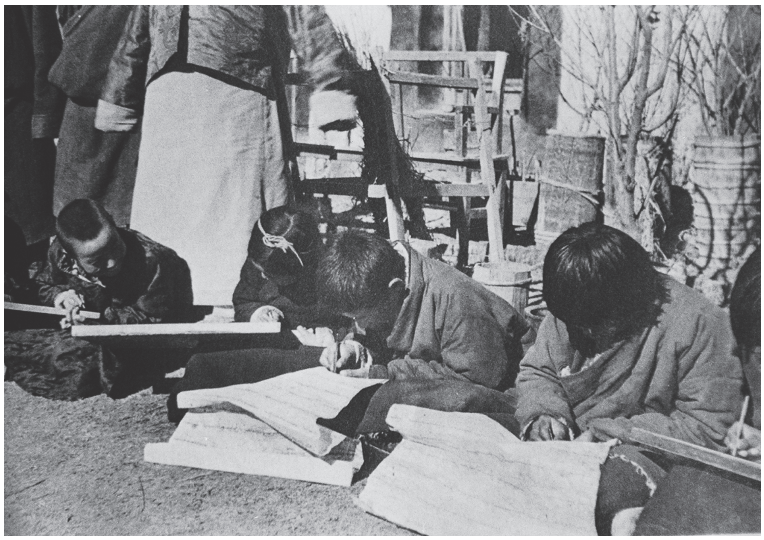
1952年8月15日，按照西藏传统礼仪，拉萨小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学校董事会17名董事大多由西藏上层名流担任。图为拉萨小学。(蓝志贵摄)

名学者)、邦苏(藏政府四品官，贵族，大商号邦达家的亲属)、唐麦·东珠才仁(留学印度的电机工程技术人员，藏政府四品官)、李安宅(汉族，教授，20世纪30年代留学美国，曾任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陆一涵(汉族，工委宣传处处长)、多杰才旦(中央民委藏民组组长、国务院西藏科学工作队社会科学组副组长，借调筹办拉萨小学事宜，后长期留藏，曾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等。这所西藏历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小学校的学生，则是300多个来自拉萨、山南、那曲各阶层的幼童。

拉萨小学的最高领导机构为董事会，下设校长3人，第一校长赤江·罗桑益希，第二校长绕噶厦·彭措绕杰，第三校长土丹旦达；第一副校长江乐金·索南加布，第二副校长李安宅，第三副校长陆一涵(后由多吉才旦接替)。教师由三方面人员组成：噶厦委派的著名学者、僧官教师近10名，俗官教师六七名；社会上聘请的教师10余人；进藏职工中选调的教师及工作人员近20名，总计藏



1930年拉萨私塾的学生合影，前排左二是霍康·索朗边巴。(索穷提供)



一所私塾的露天考试，有在纸上书写的高年级学生，也有在“降薪”（写字板）上写字的低年级学生。（索穷提供）

汉族教职工40多人。学生生活一律靠人民助学金制度，每人每月40块银元，每年每人发一套夏装、一套冬装。那些无依靠的困难学生，学习生活费用全部由学校承担。

西藏人认为，文殊菩萨是智慧之神。拉萨小学尊重传统习俗，经校董事会讨论决定，每天早晨上课前念20分钟的“文殊颂”，以利开启智慧。经赤江活佛、土丹旦达校长提议，学校还请拉萨三大寺各派一名格西来校任教，主持每天早晨的经文诵读和每周六下午为全体学生讲解宗教基础知识。这些活动完全由格西和信教教师主持，不受校领导和其他教职工的干预。

拉萨小学所设课程有：藏文、数学、自然常识和政治课，全部用藏语文进行教学。西藏传统教育十分讲究书法，学校尊重传统学习程序，又增开藏文书法、正字法等课程。在开设藏文课的同时，安排数学演算等实用性很强的课程。这些细节记录了西藏现代教育起步时的特殊印记。

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西藏的教育都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普及面非常小，当时的教育形式主要有三种：寺庙教



20世纪末西藏二小的孩子们在练习藏文书法。（中国西藏杂志社图片库）

育、官办教育和私塾教育。其中最主要是寺庙教育，教师是寺庙高僧，教学内容是宗教经典，培养出来的学生主要是僧人。官办教育是指当时噶厦所办的两所学校，一所是僧官学校（则拉扎），另一所是俗官学校（孜康拉扎），还有一所藏医学校（门孜康拉扎）。这些可以说是定向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或成为噶厦僧官或俗官，或是藏医院的藏医。私塾教育主要办在城里，如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农牧区几乎没有。私塾教育一般就是一间房子，年龄不同、程度不同的孩子在一起学习，主要解决藏文的读和写，学生主要是贵族和商人子弟。那个时候，绝大多数农奴和奴隶是没有机会读书写字的。

这种教育落后的状况，西藏地方统治者也有所意识，19世纪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曾派出4名留学生去英国学习现代技术。其中一个学习电气的强俄巴学成后在拉萨建起了第一座水电站。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各地陆续办起了一些学校，如昌都

小学、拉萨小学、日喀则小学，1956年创办了拉萨中学等，有些农奴的孩子走进了校门。到1958年年底，西藏有公办学校13所，在校生2000多人。民主改革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农奴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有了文化上翻身的迫切要求，而1959年前建的学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为了送子女上学，西藏广大翻身农奴自力更生办起了民办小学和夜校，一时间民办小学和夜校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各地，到1959年年底，西藏已有民办小学450所，夜校数千所，在校生1.3万多人。1961年，民办小学达到1400多所，在校生5.2万多人。

1963年12月，西藏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对创办和整顿民办小学，发展和提高公办中、小学提出了意见，决定今后一个时期，主要提高现有学校的质量，办好公办学校，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民族师资。会后开始设立教材编译机构，出版发行藏文课本。



西藏大学花园式学府的一角。（西藏大学宣传部提供）



2001年，西藏培养出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觉果摄）

1965年，西藏民族学院成立，第一批翻身农奴走进大学校门。那个时期，为了帮助西藏培养师资和人才，内地的一些学校如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也招收和培养了一批西藏学生，使他们陆续成为西藏第一代教师、医生、演员、音乐家……

到21世纪初，一个涵盖幼儿、小学、中学、高等教育及职业技术、成人、特殊教育等众多层次的民族教育体系已经在西藏形成。西藏现有各级各类学校1021所。其中小学890所（另有教学点1568个），在校生32.8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9%；初级中学93所，在校生12.1万人；普通高中25所（含完全中学11所），在校生3.3万人；中等职业学校7所，在校生7000人；高等院校6所（含专科学校3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9万人。西藏自治区74个县（市、区）中，已有68个县（市、区）完成普及六年义务教育，40个县（市、区）完成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5%。

1959年3月10日事件

1959年3月17日深夜，从罗布林卡中悄悄潜出一队人马，这些人在暗夜中渡过拉萨河后，继续向山南疾行，直到中印边境，他们那匆匆的脚步才放慢下来。

这队人马的首领，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随着达赖喇嘛的出走，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走到了尽头。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的社会改造力度加大，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的藏族地区按照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先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并成立了10个民族区域自治州和一些自治县，西藏也于1956年成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些做法让西藏上层的分裂势力十分不安，于是一系列反对社会改革的阴谋活动在雪域阳光下偷偷施展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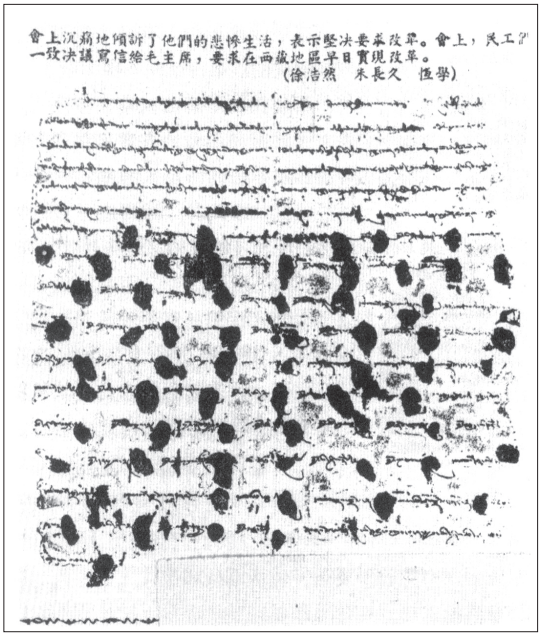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站立者）与委员们一起办公。

1957年7月，以“给达赖喇嘛献金宝座”为名的宗教活动在布达拉宫举行。这实际上是西藏分裂势力对政教合一政权的效忠仪式。此后不久，从四川藏区过来的“四水六岗”组织在山南成立了“卫教军”，武装反对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1959年3月10日上午8点多，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喊声对于笃信宗教的藏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声炸雷。于是，人们怀着震惊、惶惑的心情，涌向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情，后来有许多种版本的说法。最令人信服的，莫过于阿沛·阿旺晋美的回忆：

“按照藏历传统习俗，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破九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舞大会’。西藏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日’西藏地方政府都要邀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领导去看跳神。1959年‘破九跳神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邓少东和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机巧堪布洛桑三旦说西藏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随时可以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


會上沉痛地傾訴了他們的悲慘生活，表示堅決要革改革。會上，民工們一致決議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在西藏地區早日實現改革。
（徐浩然　朱長久　恆學）

1956年，拉萨北部地区有65个农民联合写信给十四世达赖喇嘛迫切要求改革，信上说：“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比任何人都迫切希望改革。”图为65个农民摁下手印的联名信。



长期在印度从事分裂活动的夏格巴·旺秋格丹（左一）、吉普仁西（左三）和美国特务汤姆斯（左四）的合影。

舞台和灯光等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邓少东副司令员从达赖喇嘛卧室出来，回到噶厦专为他们看‘跳神舞’设置的座位处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的全体噶伦，他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后来，因为达赖喇嘛要在传昭大法会上考‘格西’，去军区看文艺演出的时间就拖了下来。

“1959年3月9日下午3点左右，西藏工委统战部李佐民同志到我家告诉我，达赖喇嘛决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并转告达赖喇嘛的意思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等他。’当时我想，怎么这样安排呢？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当天下午六七点，我接到代理噶伦柳



1959 年3月9日，叛乱分子从拉萨郊区向罗布林卡集结。

霞·土登塔巴的电话说，3月10日上午10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演出，要全体噶伦9时到罗布林卡集合，研究好达赖喇嘛去的办法后随同达赖一起去。因为首席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家没有电话，要我转告索康·旺钦格列。3月10日上午正值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政治学习时间，我要主持学习会没有直接去罗布林卡，而是带着官服先去筹委会主持政治学习，同时等待罗布林卡的电话，也想观察一下动静，看有什么情况。不到10点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径直坐车去罗布林卡，在距罗布林卡不远处被石头打伤，立即被送到吉德林卡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医务室进行了包扎。10点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在罗布林卡门口，他的尸体被拴在马鞍上，由叛匪跑马拖尸游行。很明显，达赖喇嘛不可能到军区看演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罗布林卡了，我就从筹委会到了军区。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过程，可是当时不了解内幕真相的人，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僧俗官员，全都听

信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谣言。至今在国外藏胞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可见这个谣言误人之深流传之广。”



1959年3月10日，叛乱分子包围了中共西藏工委大楼。

从阿沛·阿旺晋美的回忆中，可以看出“3·10”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西藏分裂势力精心策划的，是他们撕毁“十七条协议”，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一个序幕。让人们一直比较疑惑的是，此后几天里，十四世达赖连续给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十八军军长谭冠三的三封回信中，请求中央给予时间，他将想办法化解目前的困难，让人无不相信达赖当时所处的无奈境地。那么达赖到底是被迫走上“西藏独立”之路的，还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思想状态呢？

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那是达赖一贯的两面手法的最早期



1959年3月17日晚10时，十四世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经山南出逃。图为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



1959年3月21日，盘踞在三大寺内的叛乱武装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至此拉萨叛乱全部平息。

的表现，它让许多人都迷失在事实真相之外。许多年以后回想那个时候的事情，有的当事者依然认为达赖喇嘛是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但是一些清醒的政治家则认为，作为政教合一政权的最后决策者，十四世达赖喇嘛会不择手段维护他们的政权的存在。

3月26日，十四世达赖在山南隆子县宣布“西藏独立国临时政府”成立，4月10日到达印度后，他又发表了宣称“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声明》，声言要恢复1951年以前西藏的“独立”地位。

事实上，也就是从1959年3月10日开始，十四世达赖喇嘛公开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且至今越走越远。与此同时，“3·10事件”也成了西藏持续了600多年的政教合一制政权完结的催化剂，加速了喇嘛王国的最后覆灭。

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

1959~1961年，西藏高原经历了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民主改革运动。

在1951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规定了西藏社会改革的原则："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内地已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邻省藏区一些地方开始进行民主改革，西藏的一些群众和干部也想早一些进行民主改革，以尽快改变西藏的落后状况。但西藏地方政府和一些上层贵族对此十分害怕。因此，在陈毅副总理率团进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时，回应西藏上层的要求，代表中央明确表示：西藏不会在近期进行社会改革。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宣布，西藏6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



山南的孩子们欢迎解放军前去平息叛乱。(1959年蓝志贵摄于山南拉加里)

然而，中央的这些郑重承诺并未能阻止西藏分裂势力的分裂行径。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爆发，在西藏引发了全局性的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在3月10日以后的三天时间里，武装围攻机关学校，破坏公路、桥梁、水闸，

砍断电线和电线杆；纵火烧毁中央驻西藏的机关驻地，并且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各机关单位发动大规模全面进攻。

驻藏人民解放军在遭到猛烈枪炮射击、一再广播喊话警告仍然无效的情况下，被迫于3月20日上午10时开始反击。当时，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能够投入机动作战的兵力仅千余人，但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只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就一举歼灭了纠集在拉萨的叛乱武装5360多人。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随着平叛斗争的胜利开展，西藏分裂集团及叛乱势力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这时的西藏人民坚决要求进行民主改革，西藏爱国进步上层人士也积极赞成改革，西藏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党中央、国务院根据西藏地区形势的变化和广大僧俗人民与上层爱国人士的强烈要求，适时地为西藏地区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

1959年6月28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和《西藏地区减租减息的办法》，决定对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宣布解放农奴主的家奴朗生，废除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实行地租二八分成。减息的办法是，废除农奴主在1958年以前贷给农奴的一切



解放军平息叛乱后，大量被裹胁的叛乱人员被释放，图为向释放的叛乱人员发放生活用品。（金持元摄于1959年）



在民主改革中，农奴上台控诉农奴主的罪行。（金持元摄）

债务，对1959年所贷债务，一律实行减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西藏51个县共废除高利贷850万克（1克相当于14公斤），减息折粮2.6万克，谁种谁收农奴得粮200多万克，约2万朗生安了家，得安家粮18万克。

群众发动起来了，封建枷锁被打碎了，农奴们用民歌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
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
贵族的太阳下山了，
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1959年9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定》、《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办法》以及牧区民主改革的规定。至此西藏的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彻底



农奴桑登分到了土地。他举着写有“桑登田”的木牌。（1959年蓝志贵摄于拉加里）



分到土地的农奴还收到了政府颁发的土地证。(1959年蓝志贵摄于拉加里)

摧毁了西藏千百年来形成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成了国家的主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自己人身的主人。

1960年的秋天，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约有80万人口的农区胜利完成，20万农户欢天喜地地得到了土地证，得到了房屋、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世世代代想得到土地的梦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熊熊的烈火烧掉地契、债约时，农奴们围着火堆夜以继日地歌舞狂欢，欢乐的泪水流湿了他们的毯毯衣衫，这是西藏历史上最感人的一幕。

接着牧区和寺庙进行了改革。牧区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奴役，废除牧主霸占草场、牧场的封建特

权，草场、牧场按原来的放牧习惯，归牧民放牧使用；废除牧区名目繁多的乌拉差役，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借给劳动牧民的高利贷，一律废除。1959年12月又制定颁布了《关于牧工牧主两利的实施办法》，变封建的主奴关系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减轻牧主对牧工的剥削，适当提高牧工生活待遇，保障牧工的政治权利。既要使牧主安心经营牧业，有发展生产的信心，又使牧工有放牧的积极性，从而兼顾牧主和牧工双方的利益。

西藏的民主改革历时两年完成，从此，西藏社会面貌焕然一新。通过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彻底摧毁了三大领主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代表性广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过去受压迫、受奴役的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政治上翻了身；废除了僧侣贵族及寺院的封建特权，摧毁了封建农奴社会的经济基础，废除了三大领主对农牧民的人身奴役，广大农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确立了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大大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丈量分得的土地。（1959年蓝志贵摄于拉加里）



贡布等三人第一次登顶珠峰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三个身影相继到达珠穆朗玛峰顶峰，接着，队长王富洲拿出铅笔和笔记本，写下："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于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贡布撕下这页登顶纪念书，从背包中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毛泽东主席的半身塑像，屈银华从背包中取出一个空铁皮罐头盒装进登顶纪念书后，把它和毛主席像、国旗一起埋在了顶峰西北角下方的碎石堆里。贡布又在顶峰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后，3人相扶着，开始下山。

这就是中国登山队员首次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情景。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登山队在一无氧气、二无食品的情况下，登上地球最高点。3位英雄从左至右是：屈银华25岁，四川林业工人；贡布26岁，时为人民解放军战士；王富洲25岁，登顶队队长。（西藏登山队提供）



1960 年 5 月 24日至25日夜间，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月光明亮，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等就是借助月光夜行军，登上珠峰顶峰的。

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2005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再次对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并重测的结果），自1953年5月29日人类首次攀登珠峰成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登山者都在珠峰顶上留下了脚印。

中国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还有一些特殊的政治背景。1958年，近百位苏联登山功勋运动健将分别上书毛泽东主席和赫鲁晓夫，要求组成中苏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这一要求获得中苏两国政府的支持，中国政府代表、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与苏联政府体委主任罗曼诺夫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商定1959年5月联合登山队作侦查性攀登，争取在1960年正式攀登。就在1959年3月21日苏联队员抵达北京前，达赖集团于18日夜间发动武装叛乱。为了安全，中苏联合登珠峰活动暂缓进行。

1959年12月5日，苏联以“苏联队员至今还未很好地集训”为由，取消了联合攀登珠峰。1960年3月，中国登山队出发了，19日，270多位登山运动员和运输队员进入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的登山基地，4月6日，从基地出发穿越最危险的绒布冰川冰裂缝地区，6天后登上7007米的北坳，5月2日，队员刘连满等人相继越过7600米和7800米高度，当晚8时前后，藏族队员拉巴才仁和许竟等人到达8100米处。5月3日，队员们到达8500米附近时，发现了早年英国队的高山营地和“黄色地带”（8200~8400米地带的黄褐色的岩石层）。这时，天气变坏，队员们冻伤严重，队长下令下撤。

正当队员们回到基地、收拾行李准备返回拉萨时，电波里传来周总理的指示："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总指挥韩复东选择许竟、王富洲、贡布、刘连满、屈银华5人为一线登顶队员，指定许竟为突击队长，王富洲为副队长；邬宗岳、多加、索南多吉、米玛、云登、次仁、米玛扎西、却贝坚赞、却加9位藏族队员为二线支援队员组成第四次登顶突击队。5月17日，队员从基地出发，23日下午2点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许竟到达8500米建立突击营地。

24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继续前进，中午，到达8670米附近著名的"第二台阶"下方，这个六七米的陡峭岩壁下，没有任何人类踪迹。消防队员出身的刘连满试着攀登，未能成功，贡布、屈银华也先后失败。两个多小时过去，刘连满想起抢险中的人梯战术，毅然蹲下身子，让屈银华踩着他的肩膀，在2米多高的岩壁石缝中打入一条钢锥，创造出一个支点，借助这个钢锥支点和上面的一个岩石支点，屈银华第一个爬上"第二台阶"！随后，刘连满将王富洲、贡布也顶上去，3人放下绳子再合力把刘连满拉上去。这时，5个多小时过去，已是晚上9点了。大家疲乏至极，特别是刘连满体力严重透支，每走几步摔一跤，基地传来消息：天



1960年5月30日，珠峰基地营举行盛大仪式，庆贺中国健儿登上世界最高峰，队员们在海拔5000多米的珠峰脚下，将贡布（左）、王富洲抬在肩上游走。前排右穿中山装者为总指挥韩复东。



1964年5月2日，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集体登上世界第十四高峰、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的10名队员。（周正摄）

气很快就要变坏。大家决定让刘连满留在原处，其余3人继续前进，赶在暴风雪前登上顶峰。当时，他们已经24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了，在一无食品、二无氧气的情况下，3人出发，在夜间微弱的星光下，向顶峰冲击。走着走着，他们发现月亮开始爬上来了，缺氧的反应，饥饿干渴的折磨，使得他们步履艰难。一小时才前进10米左右，从8700米的“第二台阶”上方到珠峰，垂直高度148米，3人突击组共费时7个多小时，终于，在5月25日凌晨到达顶峰，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贡布（1933~），西藏聂拉木县锁作乡人，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由于家境贫困，10岁起开始为农奴主放羊。1956年参军。1958年参加登山集训，1960年5月25日与王富洲、屈银华一道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是第一个从北侧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藏族队员，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一枚，获破全国纪录奖章一

枚，被授予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称号。1965年5月至1967年3月担任中国登山集训队副队长。1972年任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曾先后担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西藏登山协会常务副主席等职，1996年退休，2008年奥运火炬拉萨传递中，担任西藏自治区第一棒火炬手。

登山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运动，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则是人类对生命极限的挑战。自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被誉为“喜马拉雅雪虎”之后，在世界登山界，人们把那些勇敢、顽强而又机智的高山探险家称为“雪虎”。而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则活跃着一支雪虎团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登山队在1960年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探险队员中，藏族队员贡布、米玛、索南多吉、拉巴才仁、多吉普、米玛扎西、云登、多加等都来自喜马拉雅山区，从小就与高山打交道，天生耐高原缺氧和高寒的体质。

1975年，国家登山队第二次成功登上珠峰时，又涌现一批藏族青年高山探险家，桑珠、索南罗布、洛桑德庆、次仁多吉、嘎久、罗则、阿布钦、洛桑坚赞、昌措和两位女登山家潘多、桂桑。他们的登山本领比前辈提高许多，所参加过的每一起登山探险活动，都十分成功。



2005年5月22日11点20分，拉吉和她的丈夫大齐米登上珠峰山顶合影。

1992年2月，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简称西

藏探险队)诞生。这支英雄的登山探险队到2007年用14年的时间完成了世界上全部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攀登，创造了2人登上14座、2人登上13座、1人登上10座、1人登上9座、1人登上8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中国登山界的最高纪录。一支登山队集体登上这么多座高峰，在世界登山史上极为罕见。同时，在对中国境内登山遇险遇难的外国登山家的救助行动中，是他们的勇敢、顽强，多次使外国同行们转危为安。



中国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女队员是潘多。图为第二位登顶珠峰的女队员桂桑(右)。

1960~2008年，西藏登山队员先后有45人次登上珠穆朗玛峰，228人次登上8000米以上高度。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积雪皑皑的世界之巅，代表了世界登山运动的最高水平。



2007年，西藏登山队登顶珠峰后的合影。(边巴扎西摄)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

1965年9月9日，日光城拉萨阳光明媚，西藏各族各界3万多人聚集在拉萨市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和群众游行，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最后一个省级自治政权——西藏自治区诞生了。

早在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民族地方的权利。鉴于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都先后筹备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尽管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分子不停地制造事端，或散发传单，或递交意见书，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自治区筹委会，甚至反对建公路，反对办学校。但是在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下，以阿沛·阿旺晋美为组长的筹备工作小组积极工作，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1956年4月，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并看望各界群众。图为代表团向僧众发放布施。（李仲魁摄）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及有关事宜。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陈毅夫人张茜（后排右三）在拉萨和藏族妇女儿童在一起。（李仲魁摄）

是负责在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有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据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以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在西藏地区进行区域自治”。并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除按照第一条规定接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进行工作外，其他有关国家行政事宜，仍受国务院直接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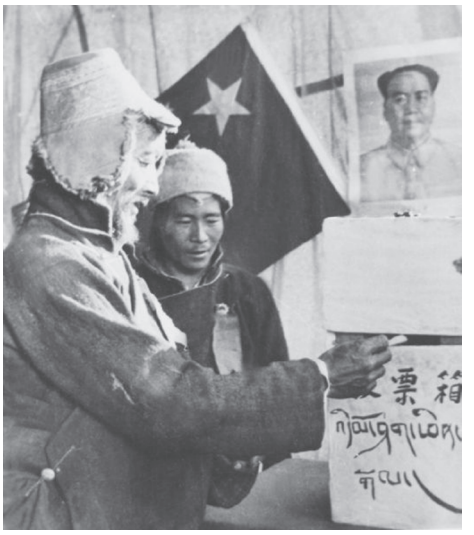
为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中央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进藏。代表团由各兄弟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50多人组成，连同文艺工作者和工作人员共800人到西藏进行祝贺和慰问。代表团于1956年3月15日出发，历时1个月，4月17日到达拉萨，受到了拉萨僧俗人士3万余人的热烈欢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到离城5公里的坚参鲁丁设帐篷欢迎。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发来了贺电。

1956年4月22日至5月1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在拉萨隆重举行。达赖喇嘛任筹委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筹委会委员共51人，其中西藏地方政府15人，班禅堪布厅10人，昌都解放委员会10人，中央在西藏地区工作的干部5人，社会各界1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西藏各地



1965年9月，参加自治区成立大会的各界群众。（金持元摄）

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教派和各群众团体代表260人欢聚一堂，民主协商，共议大事，这在西藏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大会开幕式上，达赖喇嘛致开幕辞，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



难忘的1965年9月8日，翻身农奴在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庄重地投下自己的一票。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这是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一步，这一带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的成立，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祝贺，5月2日，拉萨市各界人士举行了盛大集会，群众穿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古城拉萨呈现出一派从未有过的欢乐景象。

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之后的9年里，西藏历经了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成长了一批农奴和奴隶出身的藏族干部，基层的民主政权建设也逐步建立健全。1960年4月昌都、江孜、日喀则、塔工(林芝)、黑河(那曲)、山南、阿里7个专署和拉萨市及72个县的人民政府全部建立，还建立了20个区、300个乡的人民政府。1961年经选举建立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西藏已



1965年9月8日，在西藏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西藏自治区首任主席。



1965年9月，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并看望各界群众。图为中央代表团参观拉萨地毯厂，前排女士为厂长。（李秉铨提供）

具备了正式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机构的最基本条件。

1965年7月24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8月23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58次会议，讨论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于1965年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相应的议案。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议案，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决议。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宣布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本来要到拉萨参加庆祝大会，到了成都后因故未能成行。由中央代表团团长谢富治在大会上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张国华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作报告，总结了西藏15年的工作。阿沛·阿旺晋美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9月8日，大会选举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等当选副主席，37人当选为委员。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农村互助组和人民公社

1959年的一天，一位身材瘦削的女人从田头站起，“过去我们穷，是因为有领主压榨我们，现在我们翻了身，别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只要腿是自己的，我们就能从地狱走向天堂！”这个誓言，激励起其他11户朗生，就这样，西藏第一个“朗生互助组”诞生了。

中国农村互助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农村广泛出现的一种互助生产组织形式。

民主改革后的第二年（1960年）8月，西藏农村已建立起8400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入组农户达10多万户；城镇95%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到互助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



西藏的第一个朗生互助组。（陈宗烈摄）



西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隆子县列麦人民公社丰收的田野。（1974年刘丽嘉摄）

互助组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改变了旧西藏农村的面貌。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是西藏山南结巴乡的“朗生（奴隶）互助组”。当年互助组的成员还记得，1959年，结巴乡实行民主改革，当时进行土地改革的负责人是一名汉族同志，大家不知道他姓什么，都称他“解放书记”。

结巴乡的朗生互助组是在一种不得已的状况下产生的。当时，全乡200多户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都很快找到了互助对象，成立起规模不等的互助组，只剩下11户除了政府分的土地和少量生产资料外一无所有的“朗生”成了被人嫌弃的负担，被排斥在互助组之外。已80多岁高龄的次仁多吉老人对当时的事情记忆犹新。他说，那时，他家里没有房子，全家世代过着游荡的日子，有时住在领主的牛棚马圈里，有时露宿在村里的墙脚下。全家人整天为农奴主、堆穷（佃户）干农活放牧，干杂务。他说自己是在饥饿中长大的，又在饥饿中操持家里艰难的日子。民主改革，分到了土地，他激动得睡不着觉，又不知如何侍弄。

面对这种情况，家庭世代都是朗生的次仁拉姆站出来，把11户朗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朗生互助组”。“朗生互助组”成立之初，有93亩土地，但只有10个劳力，3头耕牛、两个旧犁铧和3个旧木犁架。这些过去的农奴们在次仁拉姆的带动下，满怀对新生活

的渴望，齐心协力，硬是把互助组办得红红火火。一年下来，朗生互助组不仅粮食自给，还有了余粮。他们卖掉余粮，买了更多的牲畜和铁锹等生产资料发展生产。次仁拉姆作为翻身农奴的杰出代表，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3年退休前，她还担任了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解放军为列麦公社训练民兵。(1973年 刘丽嘉摄)

也就是这一年，西藏受内地合作化的影响，提出试办农业合作社，在几个月内就办起了七八十个农业合作社，这种急于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农牧民个人所有制的做法，在农牧区造成了混乱，于是就有传言说，“刚刚才分给你们的土地，共产党又要收回去了，你们这些三大领主的农奴马上又要变成共产党的农奴了。”了解到西藏这种情况后，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都讲了话，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修点房子，基础放在农民富上，一些政策包括贸易在内，一定要照顾习惯。手工业方面要兴办一些，总之，一切建立在农富上，农富要放在一家一家的上，不要放在一团一团的上，群众真正得益。合作社五年不搞，包括牧区一样，要一家一家算，叫农民富起来”。毛泽东与班禅谈话时说，“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变成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周恩来也说，“西藏地域辽阔，不要主观，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几个月以后，中央就下达了《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西藏几年之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西藏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但到“文化

大革命”，这种慎重稳进的方针受到干扰。1965年7月18日，西藏工委工作组在堆龙德庆县通嘎乡试办了第一个人民公社，7月20日，达孜县委在邦堆乡试办了一个人民公社。同时，西藏各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对这种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西藏自治区还是有所节制的。1965年1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批转山南地委《关于当前试办人民公社问题》时指出：不经批准，一律不准办社；不准轻易合并互助组，搞公共积累；牧区从1966年起，3年不办人民公社。

但到1966年年初，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西藏已有34%的乡建立了人民公社，已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当年6月，全区办起了600多个人民公社，实现了县县有人民公社，其中



1973—1974年修建的林周虎头山水库，一直灌溉着周围2.5万亩土地，21世纪后，它又成为各种鸟类的天堂。图为水库920米长的拦洪大坝的一部分。（1974年于永甫摄）



列麦公社民办小学的孩子们。(1973年 刘丽嘉摄)

13个县实现公社化。

西藏大规模的公社化，实际上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而且，在公社化运动中，推行的“牧区划出牧主、富牧、中牧、贫牧几个主要阶级成分，农区把富农从富裕农奴中划出来”，“彻底打倒富农牧阶级”的错误政策，并将打击面从民主改革时不到总户数百分之五扩大到了“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八”。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藏的互助组、人民公社，对于解放生产力，帮助人们走出穷困、促进西藏社会的发展，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时至21世纪，仍有人民公社生存在西藏大地。

西藏的“文化大革命”

西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跟全国一样，经历了发动、展开、失控、混乱、军队介入、结束几个阶段。

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这次会议成为“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发动的标志。



拉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正在集会游行。（1966年蓝志贵摄于拉萨）

1966年5月底，西藏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随后，各地、各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也陆续成立。6月，自治区各单位开始贴出大量大字报。6月15日到7月5日，区党委全委扩大会议在林芝举行，会议认为西藏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卫生科技战线均为农奴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控制，宗教迷信对群众的影响还很深，在党、政、军特别是文化领域各界里，确有一批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农奴主阶级代表人物，等等。对此，会议提出了在西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10条意见。

之后，西藏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愈演愈烈，一大批老干部被作为资产阶级、农奴主阶级的代理人受到批判。到了1966年年底，内地大量传单寄到西藏，区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的《全国各地寄来我区的传单及处理情况》称：传至西藏的传单已达1400余种，约11万份。同时，北京几所大学和西藏民院的红卫兵到西藏串联，贴出了《彻底批判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手持红缨枪的西藏红卫兵。（1966年蓝志贵摄于拉萨大昭寺）


拉萨街头的藏式忠字舞。(1968年蓝志贵摄)

的大字报，煽动夺权，西藏各机关单位的职工群众很快分成两派，“文革”也开始向西藏各地蔓延，一些地方出现了拆毁寺院、游斗僧尼的情况。1967年，西藏自治区各委、厅、局相继被造反派夺权，两派群众从大辩论演变成武斗，正常的工作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由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升级，《西藏日报》一度被迫于8月23日停刊，直到9月18日才重新复刊。

1968年9月5日，拉萨召开5万多人的大会，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拉萨市革委会。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武装敌对的状态得到化解。

早在1966年10月，针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和西藏的特殊性，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边境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提出在边境地区一般不进行“文革”运动。11月，又下发了中央关于县以下“文革”规定的补充通知，明确西藏县以下农村、牧区一律不搞“文革”运动，也不号召破四旧、立四新。这一决策，阻止了“文革”之火向农牧区蔓延。

国内的乱局，使得境外敌对势力认为有机可乘，仅1967年，印军就多次入侵我国领空、领土，向我边防哨所发动武装进攻。西藏境内也随即发生多起反革命武装暴乱。1967年春、夏，一些图谋分裂祖国的敌对分子趁乱组建“卫教军”，制定反动纲领，破坏基础设施，抢夺集体牛羊，抢劫轻重武器和弹药，大量残杀解放军和基层干部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丁青、边坝、尼木及南木林、谢

通门、拉孜、昂仁等县暴乱事件。

流亡境外的达赖集团也趁机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步骤，1970年3月9日，达赖在印度新德里发表“声明”，继续进行“西藏独立”活动。达赖派驻美国的“代表”通过举行招待会于当月12日散发了这篇“声明”。3月24日，印度政府公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所谓“西藏问题”，干涉我国内政。



西藏也开始了上山下乡。图为城区老人送子下 乡。(1968年 罗伟摄于拉萨)

但是，“文革”10年间，西藏的建设事业也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

1967年11月，林芝毛纺厂建成投产。这个厂的设备是从上海迁来的，上海市派出500名职工、技术人员来藏帮助生产。1967年7月拉萨贡嘎机场建成，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通航。这是西藏高原上继当雄机场后的第二个机场。

据1968年1月17日新华社的报道，1966~196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一支综合科学考察队，在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大规模多学科考察。这支考察队包括全国23个科研、教学、生产等单位，近30个学科，100多名科技工作者，考察地区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东起亚东，西至吉隆，方圆5万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达7000多米，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1975年9月24日，西藏最大的一座水库——林周农场虎头山水库竣工。林周农场虎头山水库由拦河大坝、输水隧洞、溢洪道、截水墙和配套工程主干渠5个部分组成，蓄水量为1200多万立方米。这个水库至今还在发挥效应。这个时期，西藏还在努力推广冬

小麦，一度扩大到56个县，总面积达到60多万亩，大部分单产超过了400斤。高产的冬小麦，解决了西藏粮食的部分自给问题。

1976年7月6日，滇藏公路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南起云南下关，北至西藏芒康县，全长716公里。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西藏也开始逐渐走向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路。



“文革”期间的拉萨街头。（蓝志贵摄）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胡耀邦进藏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四年，1980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因为1978年，中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清算了“文革”问题，全面推动了改革开放，但当时西藏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但在许多方面还很滞后。许多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些领导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阶段，保守僵化，严重影响了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会议召开两个月后，胡耀邦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又亲自率队进藏，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调查研究，推动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西藏地方的特殊性，认为西藏拥有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人口不到200万，只相当于全国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现在还很穷。新中国成立29年来，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了西藏很大帮助，总投资达到45个亿，而国家从西藏人民中征收的税收、公粮总值不过5900万元。20多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干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没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很大，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

胡耀邦将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的精神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六个

字“免征、放开、走人”。

免征，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群众的农牧业税，时间至少两年。不但免农牧业税，还不准随便向群众无偿征用劳动力。实际上从此开始，西藏彻底免除了农牧业税。如今全国大多数省区都免除了农业税，这肇始于西藏。

放开，就是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人家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生产队更要有充分的自主权，群众手里的东西允许人家自由交换。生产队一般不要过大，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包产到组，到户，到人，都可以因地制宜。总之，怎样对生产发展有利就怎样发展。

走人，就是要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下少数工作上确实最必要的，并且要求他们服从组织分配，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加强同西藏人民的团结。

胡耀邦在拉萨干部大会上曾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主要强调了6件大事，1. 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2. 要大大减轻群众负担，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3. 在所有经济政策方面，都要放宽，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4. 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促进发展藏族人民迫切需要的用品上；5.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事业；6. 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两三年内，要使西藏的国家脱产干部中藏族干部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胡耀邦最后说，办好这6件事，认真实行这六条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两年到三年内，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两三年、五六年要超过30年来的最高水平，10年就要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胡耀邦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提出的6条，集中反映了一

段时期内中央对西藏工作的主要方针和政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所起的动员和鼓舞作用是非常大的，各方面人士的反映都非常强烈。

此后，西藏大刀阔斧地彻底处理一大批历史遗留案件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1000多名民族宗教界人士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全面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修并开放寺庙，恢复民族宗教节日。

在社会经济方面，会议从西藏的实际出发，采取特殊政策让农牧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其政策归纳为四个字“放、免、减、保”。放，即放宽政策，从1980年开始政府不再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和种植计划；免，从1980年开始西藏范围内免征农牧业税；减，减轻农牧民负担，连民办小学的全部经费也由国家承担；保，保证必要的供应。会议结束后，西藏人民政府以公告的形式，将这些方针政策公诸于众，颁布实行。

时隔30年，回望那段历史，其发展西藏社会经济、改善民生的做法至今还是中央西藏工作最根本的政策之一。至于汉族干部大批内调，在当地技术人员和干部还没有培养出来的情况下，一



53岁的西藏农村妇女达瓦彭多，家住距拉萨20里远的热阿村，1982年农业税的减免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图为达瓦彭多一家在吃晚餐。

度影响了西藏工作，这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但也正是由此开始，中央形成了西藏工作会议这种特殊的工作机制，着重研究西藏的大政方针问题，并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台一系列促进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活的史诗《格萨尔》

1980年，由国家文化部出面，召开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重要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后，藏族史诗《格萨尔》开始慢慢走进人们的视线。这次在成都峨嵋山召开的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有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内蒙古、新疆7省区参加，会议成立了抢救《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并制定了工作规划。

也就是从那年开始，西藏开展了大规模的保护、保存和抢救藏族传统文化遗产《格萨尔》的活动。

《格萨尔》或称《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曾经口头传唱于藏、蒙、裕固、土族等族民众之间的英雄史诗，直到今日，因为许多藏族民间说唱艺人的存在，这部史诗仍以活生生的形态，在青藏高原上传唱，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具生命力的口头传统之一。

20世纪80年代，那曲地区牧民、《格萨尔》说唱艺人阿达(1910—1990)在那曲赛马会上说唱《格萨尔》，吸引成千上万的牧民。（中国西藏杂志社资料）

《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口传史诗，经过多年的抢救整理，现在估算大约有120部、100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是一部格萨尔王的英雄征战史，讲的是格萨尔被天界派遣，降生到岭国幼系森伦家，小名觉如，经赛马登上岭国国王宝座后，被尊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简称“格萨尔”。随后，他率领将士东征西讨，降妖伏魔，扶助弱小，并从各战败国取



来各种财物，使岭国日渐富足强大。最后，格萨尔完成使命，拯救坠入地狱的母亲以及一切受苦的众生后，返回天界。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可知，《格萨尔》约产生于古代藏族的部落社会时代，距今有2000年历史。在各种藏文古籍中，在一些僧侣的经文中都可以看到其历史的影子。1716年康熙帝命人用蒙文木刻了一部《格斯尔可汗传》，7章，177页。这部“来源于藏文本《格萨尔王传》”的《格斯尔可汗传》，是《格萨尔》首次用文本形式刻印出来，表明最迟在18世纪早期，《格萨尔王传》已经从藏区广泛传播到蒙古，并在北京一定范围内流传。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们在中国藏区、拉达克地区和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等地区，即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广泛记录到《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说唱或者搜集到《格萨尔》的手抄本或木刻本。

新中国最初对《格萨尔》的关注，是在1956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老舍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蒙古族《格斯尔可汗传》和藏族《格萨尔王传》是两部重要的史诗，并仍在民间流传，从此《格萨尔》被定性为史诗，引起重视。



1981年，扎巴老人向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演唱《格萨尔》。扎巴，西藏最优秀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之一，能完整说唱34部，生前由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将其中的26部录音成998盘磁带，经记录整理后，2002年年底完成15部，并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扎巴讲述格萨尔王传”9部，总计近60万诗行，600多万字。（西藏大学供）

1958年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公函形式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所拟《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编

选计划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教部等，要求组织人力进行编选。计划第二部分第四项列有蒙古族《格斯尔》和藏族《格萨尔》，鉴于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况，将《格萨尔王传》的搜集工作委托青海负责。



西藏当代最杰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之一：桑珠（1922~），昌都丁青县人，能说唱65部，1979年被西藏社会科学院请来作为重点艺人进行说唱本录音，1990年被国家民委、文化部等联合授予“格萨尔说唱家”荣誉称号。到2002年底已录制46部，共2500小时的磁带，根据录音出版的“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已于2005年前后出齐，共45部。（周爱明摄）

1957年，青海省委发出《关于继承发扬本省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指示》，由省文联主席程秀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主持，组织200多人参加“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团”，从1958年开始，除在本省广泛调查外，还派人到甘肃夏河、四川阿坝、甘孜、德格，西藏拉萨、昌都、江达和内蒙古等省区调查，到1961年，共搜集到各种手抄本、木刻本150本（除去异文本共34部）和部分口述资料，还有一些文物如格萨尔画像、唐卡等。后将这些藏文资料计74种2000多万字译成汉文，铅印内部资料本出版，并整理、翻译出版《霍岭大战》上册。

20世纪80年代以后，《格萨尔》被列为国家社科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并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西藏在《格萨尔》的抢救和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西藏大学和西藏社科院将一些著名的说唱艺人接到拉萨，对他们的说唱进行录音和整理，如已经辞世的著名



西藏当代最杰出的女艺人玉梅(1957~)，那曲索县人，父亲也是《格萨尔》说唱艺人，她自报能说唱74部，1982年西藏文联将她请到拉萨，专门说唱《格萨尔》，现为西藏社科院专职《格萨尔》说唱家，已完成25部史诗的说唱录制，计磁带900余盒。(西藏社科院供)

艺人扎巴(1906~1986)；唐古拉的艺人才让旺堆(1933~)；索县的女艺人玉梅(1957~)；原籍丁青县后在墨竹工卡定居的著名艺人桑珠。这些说唱艺人由国家文化部、西藏自治区政府、中国文联和中国社科院联合授予他们“优秀说唱家”荣誉称号，他们还享受到国家公职人员待遇，西藏有关部门并派有专人负责录音、整理工作。如扎巴老人被接到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从1979年起，完成998小时的磁带录音，共26部，每部5000诗行，总计60万诗行，600万字。后由国家拨专款出版《扎巴讲述格萨尔王传》。

随着《格萨尔》搜集整理的深入，许多科研机构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格萨尔研究所”和专门学科，1983年，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开始招收《格萨尔》学硕士研究生；1996年后，又招收“《格萨尔》与藏族文化”博士生。目前国内已有近百位《格萨尔》专门研究人员。

在艺人中录音最多的是桑珠，由于西藏社会科学院十几年的努力，老人已将史诗中的45部录音，计1989盘磁带，共2500小时，2000年4月起，国家拨出专款，出版《桑珠说唱本》全本45部，并将其中质量好的录音磁带制成光盘，与说唱文本同时发行。

2002年，《格萨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千年纪念”计划。

如今，西藏大批年轻说唱艺人仍在为当地民众说唱《格萨尔》，如那曲镇的《格萨尔》演唱厅里，来自班戈县的阿旺巴登、比如县的仁珠、安多县的纳木色以及那曲县的玛德、扎西多吉、多吉然巴、罗桑、曲桑、普布等，仍在每天说唱，并通过说唱收入，在那曲买房置地，定居下来。

《格萨尔》这部活的史诗，仍在为青藏高原上的民众传唱和享用。



西藏著名表演艺术家根据民间传说制成的“仲厦”（《格萨尔》说唱帽），现珍藏于西藏博物馆。（周爱明摄）

43项与62项援藏工程

自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中央又于1984年2月和1994年7月两度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着重研究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主要研究了进一步放宽政策，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让西藏人民尽快富起来的问题。会议提出解放思想、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性经济，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以家庭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和“两个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方针。这次会议后，西藏长期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开始被打破。

会议就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决定，即：1、大力开发能源，发展交通运输事业；2、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牧农林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3、努力办好教育事业，发展和繁荣文



第四次对口支援西藏干部座谈会上，来自17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和部分中直机关援藏干部代表进行分组交流。

化艺术；4、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等。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广东等省市，按照西藏提出的要求，帮助西藏建设43项当时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包括电站、宾馆、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和中小型工业企业，同时决定在内地各省市开办西藏中学。

会议结束后的当年，43项工程全面启动。这43项中能源7项，交通2项，建材2项，饲料加工1项，商业4项，文体9项，教育2项，卫生4项，市政建设2项，旅游8项，其他2项。这些项目基本都是些基础性设施，但是它涉及西藏经济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其中拉萨饭店、西藏宾馆、人民医院、西藏大学、群众艺术馆、拉萨花岗岩加工厂、拉萨石膏制品厂、拉萨饲料加工、拉萨自来水工程等20项修建在拉萨，其余分布在日喀则、山南、那曲、昌都和阿里5个地区，工程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工程投入1.9万人，总耗资4.77亿元。

43项工程从设计、施工到室内的一切设备用具以及管理人员的培训等，全部由援建单位包干，竣工后由援建单位交出钥匙，即可使用，产生效益。所以，该工程被誉为“钥匙工程”。43项工程在西藏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高潮，使城市建设由平面到立体，西藏旅游迅速成长为西藏的支柱产业，对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成为新西藏的43座丰碑。

自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的10年，西藏经济社会取得了全面发展和进步。1994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到2000年，力争西藏国民生产总值比1993年接近翻一番，年均增长10%左右。实际的结果是，到2000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7.4亿元，是1993年的2.27倍，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12.4%，改变了长期低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的状态，也超过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目标。粮



43项工程之一的日喀则自来水厂，建于1983年，随后的1995年又新建一自来水厂，现在两厂实现联网供水。1997年日喀则市区自来水管道长69.34千米，日供水量9720立方米。市区排水采取雨、污合流制，排水系统全部为暗渠和明沟，排水管道长30千米。

油肉基本自给，粮食总产量由1993年的67.2万吨提高到96.22万吨，增长43%。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706元增加到1331元，增长88%，多数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第三次会议确定的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完小，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0%提前得到了实现。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93年的58.9%提高到2000年的85.8%，青壮年文盲率明显下降。广播电视覆盖率增加，通信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事业发展较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62个援藏重点项目之一的西藏博物馆，坐落于拉萨市罗布林卡东南角，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博物馆。（卢颖摄）





62项援藏工程中的满拉电站。

这次会议还决定了由国家投资，重点建设了交通、能源、通信、农牧业、社会事业等一批基础性骨干项目，被称为62项工程，分别由中央13个部委，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6个计划单列市承担，其中包括农牧水利、能源交通、工矿电信、文化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等各个领域，计划总共投入39.18亿元。

62项工程遍及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其中农业牧业林业和水利项目有8个，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左贡县玉曲河农业综合开发、藏西北牦牛绒生产基地、东久林场、满拉水电枢纽工程等；能源项目14个，如山南沃卡河水电站改造、阿里朗久地热电站、拉萨西郊输变电工程及7个县的水电站等；工业项目10个，如山南香卡山铬铁矿、阿里扎仓茶卡硼镁矿、拉萨粮油加工厂技术改造等；交通通讯项目7个，如拉贡公路改造、拉萨—格尔木输油管道、拉萨至日喀则光缆工程等。此外还有11个社会事业项目。

62项工程于1998年年底全部顺利完工，实际投资43.9亿元人民币，比计划投资增加了近5亿元，达到或者超过了实际要求，发



山东省投资7800万元援建的唐河电站。（杨亚明摄）

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许多实际的好处，为西藏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世界文化遗产
——布达拉宫古建筑群

布达拉宫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宫堡式古建筑群，位于西藏拉萨红山之巅，由白宫、红宫两大部分和与之相配合的各种建筑组成。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修建，以后两次毁于天灾或兵火。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进行扩建，先造白宫，后建红宫，1694年竣工，历时半个世纪始具规模，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布达拉宫占地总面积36万余平方米，东西长360米，南北宽270米，主楼13层，高117米，山下海拔3650米。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的宏伟建筑。整个建筑依山修建，规模宏大，巍峨壮观，被誉为世界屋脊的明珠，是藏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最著名的古代建筑之一。

白宫高7层，是达赖喇嘛的居室和政治活动中心。位于第4层中央的“措钦夏”(东大殿)面积717平方米，由38根大柱支撑，是

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一座宫堡式古建筑群，位于拉萨红山之巅，由白宫、红宫两大部分组成，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布达拉宫最大的殿堂，也是历代达赖喇嘛举行坐床、亲政大典等重大宗教和政治活动的场所。第7层“日光殿”是达赖喇嘛冬宫，殿内陈设豪华、金盆玉碗，珠光宝气，宫殿外有一个宽大的阳台，从这里可以俯视整个拉萨城，最醒目的就是大昭寺的金顶。

红宫建于1690年，是宗教活动场所和历世达赖的灵塔祀殿。宫内主要陈设各类佛堂和8座存放各世达赖喇嘛法体的灵塔，其中以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最大、最华丽，高14.85米，塔身用金皮包裹，镶珠嵌玉，据说共用黄金11余万两，珍珠、宝石、珊瑚、琥珀、玛瑙等18677颗。红宫中最大殿堂“司西平措”(西大殿)面积725平米，殿内正中上方高悬乾隆所赐“涌莲初地”匾额，内设达赖喇嘛宝座。保存着康熙大帝所赐的锦帐一对，是布达拉宫的珍宝之一。萨松朗杰（殊胜三界）殿是红宫最高的殿堂，殿内供有以藏、汉、满、蒙古四种文字书写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自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起，到清朝垮台之前，每逢藏历新年正月初三，历世达赖喇嘛都要到这里朝拜这一皇帝牌位；一旁的



法王洞，是布达拉宫现存最早的建筑。图为法王洞中供奉的松赞干布(中)和文成公主（左）的塑像。



布达拉宫的金顶。

经书架上，放置着雍正皇帝赐予七世达赖喇嘛的北京版《丹珠尔》经书。红宫的最西部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殿，高14米，传说殿内的坛城是用20余万颗珍珠串缀而成的。另外，还收藏近万幅明清以来的卷轴画和大批石雕、木雕、泥塑等艺术品、贝叶经等历史文物及藏毯、玉器、陶瓷、金银器物、幔帐、卡垫等大批藏族传统工艺品，以及大量经书和重要历史文献等。

1961年，布达拉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12月布达拉宫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布达拉宫文化遗产价值在宫殿布局、土木工程、金属冶炼、绘画、雕刻等闻名于世，体现了以藏族为主，汉、蒙各族能工巧匠高超技艺和藏族建筑艺术的伟大成就。2000年，大昭寺作为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罗布林卡也被补充加入世界文化遗产。

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是集西藏行政、宗教、政治事



布达拉宫正面。

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世界遗产评委会一致认为，布达拉宫建筑优美而又独具匠心，装饰华美绚丽，与天然美景间和谐融洽，使其在历史和宗教特色之外平添几分风采。大昭寺是一组极具特色的佛教建筑群。建造于公元18世纪的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也是西藏杰出的艺术作品。这三处风景优美创意新颖的建筑群，还有它们在历史和宗教上的重要地位，构成一幅和谐融洽的惊世胜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布达拉宫的保护和管理十分重视。1959年以后，每年都拨给专款维修。1988年国务院决定拨出巨款对布达拉宫进行大规模的维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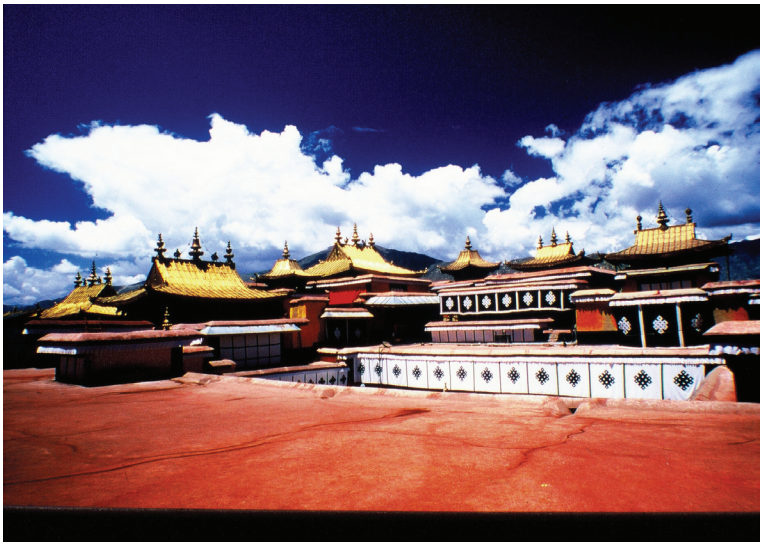


罗布林卡雪景。（张鹰摄）

1989年国家出资5000多万元进行第一期维修，这是

布达拉宫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维修。国家从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方面大力支持。全国10多个省区的150多位专家技术人员直接支援，区内外数千人义务劳动或捐款捐物。维修施工5年间，工程劳动总投入60多万个工日，完成111个维修工程项目，维修总面积3.39万余平方米，维修涉及红宫、白宫以及山下附属建筑的所有领域，1994年8月8日竣工。

2002年6月27日，国家投资1.3亿元，对布达拉宫进行第二期维修。工程技术人员发现在布达拉宫多处建筑地基中有地垄，先后发现802处，呈井状。地垄有门有窗，绝大部分是全封闭的。高的达17米，宽8米左右。有专家认为这种结构是为了利用空气作用防止建筑物下滑。二期维修对布达拉宫的大部分地垄进行了加固，对红宫、白宫等17处古建筑进行维修，还有珍宝馆和壁画修复。所有维修工程在2008年完成，由于维修项目的增加，国家把原来的投资追加到1.793亿元。



大昭寺金顶

“一江两河”综合开发


年楚河谷的大片油菜花。

“一江两河”是指藏民族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和年楚河，流域面积6.6万平方公里，占西藏自治区总面积的5.3%，其中包括拉萨、日喀则、山南三个地市的18个县（市），人口近百万，约占西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一江两河”流域东起山南桑日县，西到拉孜县，南抵藏南河谷区，北达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麓。这里水网密布，河谷平坦，农耕条件相对较好，历来被视为西藏的“粮仓”。

1990年4月，西藏自治区提出了“一江两河”中部流域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完整规划。规划涉及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希望通过10年50多个开发项目的建设，把“一江两河”流域建成西藏高原上商品粮、副食品加工、轻纺产工业、


治理后的年楚河主河道。利用年楚河水可灌溉农田27万余亩，这是“一江两河”流域开发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



谢通门县仁钦泽乡农民益西家的电灯亮了。

科技示范推广四大综合发展基地。并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拉萨农业综合开发工程、羊卓雍错抽水蓄能电站等工程相衔接，在西藏的一江两河流域建起发达的立体农业，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该规划工程计划修建40项工程，其中水利18项，农业7项，牧业10项，林业5项。工程建成后，受益耕地面积10万公顷，约占



雅鲁藏布江中游万亩人工林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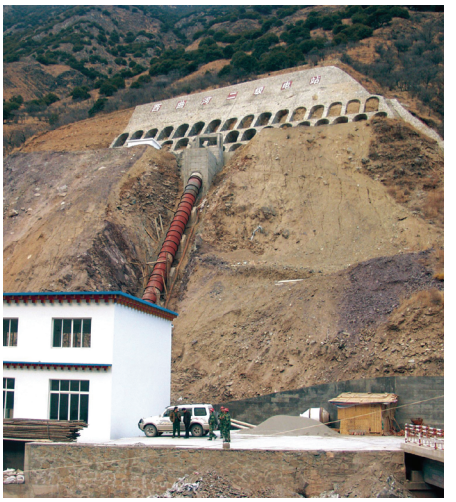
西藏自治区现有耕地的45.6%，草场450万公顷，造林2.87万公顷，发电总装机达到25万千瓦。

199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亲临“一江两河”流域视察，并指示，这是西藏发展农业，加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要加强领导，精心规划和设计，严密组织，务求见效。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直接参加了西藏“一江两河”开发中有关环境资源水利农业等的开发研究，在开发区确定了“科技为先导，水利为龙头，把开发大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相应发展畜牧业、林业”的原则，综合考虑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保持人口、资源、环境的动态平衡，建立起良性循环系统。

“一江两河”开发工程是西藏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项重要的农业综合开发工程。从1992年开始，中央将“一江两河”综合开发正式列入国家“八五”、“九五”发展计划，投资10多亿元人民币，通过兴修水利、改造中低产田、改良草场和植树造林等措施使粮食、肉类大幅增产，逐步使之成为西藏的商品粮、畜产蔬菜副食品、轻纺手工业、科技示范推广“四大基地”；同时还相继建成达

然乡、甲日普两座水库，雅砻东干渠，解放水渠，杜琼一级提灌站，艾马岗农业开发区、澎波农业综合开发一期工程，以及强久输电线路、绒河电站、雅鲁藏布江防护林等一批骨干工程和基础工程项目；建立了拉萨市拉鲁湿地和雅鲁藏布大峡谷自然保护区等生态保护项目，保持了西藏生物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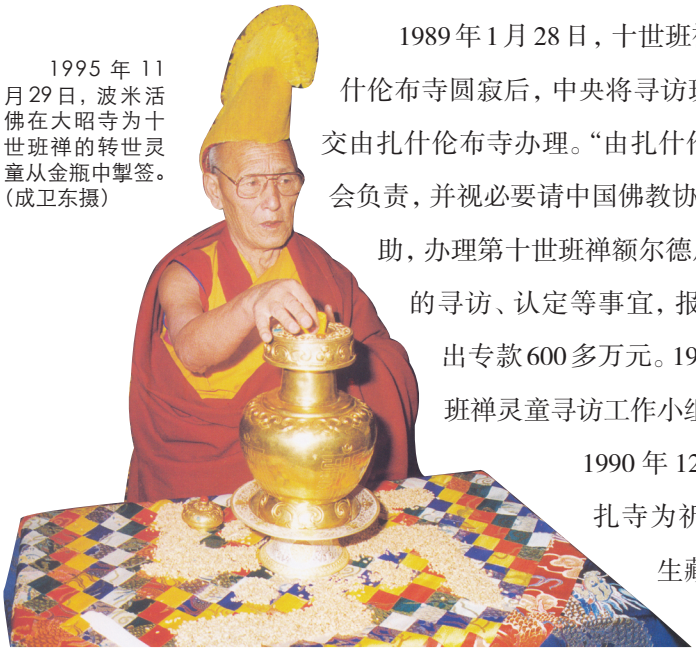


“一江两河”的水电工程：西曲河二级电站

十一世班禅的认定与坐床

1995年11月29日，古城拉萨一派祥和。坐落在市中心的大昭寺香烟缭绕，佛灯齐明，彩幡飘舞。按照传统仪轨，认定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将在寺内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前进行。凌晨两点，经过念经7天的金瓶被喇嘛仪仗队迎请到寺内释迦牟尼佛像前。

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式设立的制度。金瓶掣签制度特别设立了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另一个置放在拉萨大昭寺。珍藏于大昭寺的金瓶，在此后200多年间，西藏共有70多位活佛通过金瓶掣签认定。



1995年11月29日，波米活佛在大昭寺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从金瓶中掣签。（成卫东摄）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在其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圆寂后，中央将寻访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交由扎什伦布寺办理。“由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并视必要请中国佛教协会、佛协西藏分会协助，办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报国务院批准”，并拨出专款600多万元。1989年8月，扎寺成立班禅灵童寻访工作小组。

1990年12月 到1993年7月，扎寺为祈愿大师灵童早日降生藏土，顺利重归佛位，祈请西藏、青海、

四川、甘肃和云南藏区的各大寺院诵经祈祷，共诵念9600万字的《甘珠尔经》5遍，18000万字的《丹珠尔经》10遍，诵念《文殊菩萨经》、《缘起经》、《降生经》、《度母仪轨经》等21部显密经书，合计达8627226遍。

后藏日喀则仁布县的雍错，是扎什伦布寺护法神姜森的依止处，了解班禅大师的转世，必须到这里来观湖。1989年，扎什伦布寺先后派出两批高僧活佛，到加查县北部拉姆拉错和雍错观湖。其中，1991年6月，扎寺著名高僧俄钦·边巴在拉姆拉错圣湖中，看到清晰的藏文字“查”，一座红色的房屋，雪山和门……

依据两次观湖所见和班禅大师圆寂时面朝东的迹象，寻访小组确定了灵童转生方位应在扎寺东部或东北部，属相为蛇、马、羊。1994年2月，扎寺寻访领导小组派出三个秘访组，到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近200万公里的广大藏区秘密寻访。经过一年多的寻访，在5省区46个县共找出具有灵异特征的男童28名。

就在寻访领导小组准备选出3名灵异卓著的男童，报请中央金瓶掣签的时候，流亡国外的达赖喇嘛在印度擅自宣布批准认定出生在那曲嘉黎县境内的6岁男童根顿·曲吉尼玛为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在国内特别是藏传佛教界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达赖干扰班禅转世灵童正常寻访工作，指出其有悖历史定制和宗教教规。

1995年10月，扎寺寻访领导小组依据占卜、朝佛、观湖、实地寻访、辨认遗物和各种吉兆，并请西藏藏医学院历算学家堪钦措如次朗卜算，一致认为那曲地区嘉黎县的6岁男童坚赞诺布、安多县7岁男童贡桑旺堆、拉萨市城关区5岁男童阿旺南追，3人特征最符合班禅大师身、语、意的化身，经报请中央批准，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



1995年11月29日，受沙弥戒后，第十一世班禅着正式僧装端坐释迦牟尼佛像前。（成卫东摄）

11月29日凌晨4点多钟，中央代表、自治区领导、西藏及国内其他藏区各大寺院的高僧大德齐聚大昭寺释迦牟尼佛殿，数百名群众代表将佛殿挤得满满当当。五点整，吉时到，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罗干宣读国务院批准三名儿童为入瓶掣签候选人的批准书；主持人、国务院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宣布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金瓶掣签仪式开始。两名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人恭敬地捧出金瓶。工作人员揭开瓶盖，取出牙签，将事先准备好的以藏文、汉文书写好的3名候选灵童的名字贴在签上，请在场的国务院代表、国务院特派专员、自治区领导、高僧活佛以及3名候选灵童的父母看视完毕，国务院特派专员、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核查无误，将名签装入黄缎套内。扎寺民管会主任喇嘛次仁将名签最后装入金瓶胆内，晃动以后把放有名签的金瓶胆放入金瓶中，盖好瓶盖。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寻访领导小组成员、代理甘丹赤巴波米·强巴洛珠向释迦牟尼佛像和金瓶深深行礼，默默祈祷，然后郑重打开瓶盖，一只手有节奏地转动着放有三根名签的瓶胆，只见三根一样齐的签不断转动，其中一根慢慢高起，待转动停止时，已高出其他两根签一寸左右。该签被取出交给江村罗布，他当众取下缎套，侧身请罗干、叶小文检验，然后用藏语高声宣布："嘉黎县坚赞诺布中签！"

场上一片欢腾，人们向空中抛撒糌粑和青稞，高呼“拉加罗”（神胜利了）！中签灵童的父母向释迦牟尼佛像和金瓶顶礼磕头，同时向国务院代表和高僧大德敬献哈达。

片刻，坚赞诺布被拥到释迦牟尼像前，向佛祖敬献哈达，同时，扎寺民管会主任喇嘛次仁向波米·强巴洛珠敬献哈达，请求他为中签灵童剃度。波米活佛拿起剪子，剪去灵童头上最后一撮头发，拌入青稞扬撒四处，并为他取法名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简称确吉杰布。当天下午4点，在拉萨班禅行宫雪林多吉颇章，举行了册立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典礼，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罗干宣布了国务院于当日发出的《关于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批复》，称“国务院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1990年2月13日（藏历第十七饶迥土蛇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的西藏自治区嘉黎县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1995年12月8日，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坐床。中央特派国务委员李铁映前往主持。李铁映代表中央政府将金册金印颁赠给十一世班禅。金印高10厘米，宽12.6厘米，重10060克，印文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印”；金册共有13页，每页厚0.22厘米，长22.6厘米，重9800克。

自此，十一世班禅的认定与坐床圆满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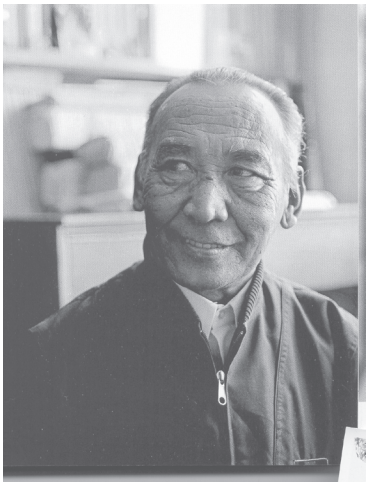
第十一世班禅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互致问候。（兴华摄）



2005年，数十万人聆听十一世班禅讲经并接受摸顶加持。（魏小龙摄）

恰白·次旦平措与《西藏通史》

1991年，藏文版《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正式出版，立刻在全国史学界、藏学界、出版界引起巨大反响。1994年1月，该书荣获中国出版界最高奖——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正如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所说，“如果说根敦群培的《白史》把藏族史的研究从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带入了人文科学的轨道，那么这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则把藏族史的研究在广阔的领域内从人文科学进一步引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藏族史研究的重大进步”。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旺久多吉摄）

恰白·次旦平措(1922~)，《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这部第一次用现代史观书写西藏历史的主要撰稿人，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藏族历史学家、文学家。

1922年，恰白·次旦平措出生在后藏日喀则地区著名贵族拉孜敏吉之家，拉敏家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时候。20世纪初，拉敏家有兄弟四人，长兄益西楚臣，担任过班禅堪布厅的三品札萨官员，老二钦饶旺久是堪布厅的四品堪穷(僧官)，老三是次旦平措，老四索朗伦珠也在班禅堪布厅任职，曾任十世班禅大师的秘书，后来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恰白主持编著的《西藏通史》的藏汉版本。(扎西摄)

次旦平措从小在家和私塾里习读藏文正字、语法、诗词、算术。当时在噶厦任四品官的舅舅恰白·晋美贡嘎因无子继承家业，就将次旦平措过继为子，改户名为恰白。恰白家族是拉萨的一个中等贵族，一直在噶厦任职。17岁那年，恰白与多索·德钦曲珍结婚，妻子是乾隆年间西藏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多噶夏仲·次仁旺杰的后人。1942年，20岁的恰白接替继父到噶厦任职，先后担任噶厦侍卫和江孜、吉隆、南木林宗宗本（县长）。

西藏和平解放后，恰白担任日喀则爱国青年联谊会主任。1953年5月23日，后藏成立第一所日喀则小学(亦称格萨尔庙小学)时，他担任过教员、教务主任以及副校长。民主改革后，1960年，恰白成为日喀则政协委员，1965年，当选为拉萨市政协委员、常委和副秘书长，其间兼任自治区文联第一、二届副主席。1978年，任第三届自治区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1983年后，历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顾问等职。期间还担任了《雪域文库丛书》主编和《西藏研究》藏文编辑部主任。1991年，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88~2001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

恰白先生著述颇丰。除《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外，还有大量文学作品，被收录在《恰白·次旦平措选集》中，学术著作还有《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敦煌文献兄弟教诲录及今释》等。但最有影响的还是《西藏通史——松石宝串》。

在谈到这部书的写作时，恰白先生说："我把这副担子接了过

来，找了诺章·乌坚当助手，他是《西藏研究》藏文编辑，早年在扎什伦布寺当过喇嘛，对藏文典籍很是熟悉。我和乌坚都认为要写出一部从古至今的西藏通史，头一件大事是准备资料。没有木材和砖石，再好的工匠也盖不起楼房。西藏古代的图书资料、文书档案非常丰富，但都存放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自治区档案馆，要借出来使用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时听说拉萨哲蚌寺一处古老的宫堡里，收藏着一大批几百年前五世达赖的藏书。我们办了相应的手续，请求寺庙同意借阅；寺庙没有拒绝我们的要求，规定进库找书的时间不能超过7天。一个老喇嘛把我们引上措钦大殿顶层，上面有一间堆满长长短短古书的屋子，到处落满灰尘，光线非常暗淡，四周还用铁网围隔。老喇嘛说，这些都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藏书，后世加盖火漆进行封存，几百年几乎无人触动。现在你们要著书立说，就进去翻看翻看吧，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书。我们钻了进去，都是手抄本和木刻本，但是‘文化大革命’时，这里还是受到过人为的损害，目录已经找不到了，有些书核桃木夹板被撤走，书页七零八落。我们借住在哲蚌寺，每天早早地上楼，晚晚地才下楼来，甚至茶和糌粑也在书库外边将就。这里的藏书确实非常丰富，有些书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甚至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孤本。7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翻看到一半。经过寺庙同



西藏大学的教师向恰白·次旦平措请教。（中国西藏杂志社供）

意，我们借出了《德乌教法史》、《德乌觉色教法史》、《汉藏史集》、《朗氏家族史——灵犀宝传》等7部史书。过去，由于教派不同、政见各异，统治者将这些书长期封存密室，秘不示人。有的书像东嘎·洛桑赤列这样的大学者，也仅仅是听过名字而已。

“当然仅仅有这7部书是不够的，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公家的、私人的，寺庙的、民间的，托朋友、找熟人，到处去借，最后点点数目竟达两百本之多。接下来是摘抄资料，制成卡片。几十万字的资料全靠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最后卡片摞起来比人还要高出许多。”

恰白先生还说：“写一本历史书，指导思想很重要，没有指导思想，等于一个人没有骨头，等于一幢房子没有支架。前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史书，大都是王朝史、教派史、家族史，还有地区、寺庙、部落的方志。这些书确实保存下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但是这些史书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有的本身就是宗教源流，人和神不分，宗教和历史往往纠缠在一起，弄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幻觉，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去伪存真。”

经过整整两年，恰白和西藏社科院的写作团队完成了长达150万字的书稿，最后由恰白先生通稿、审定、出版。这部用藏文编写的《西藏通史》，勾划出西藏2000年的历史轮廓，资料翔实，旁征博引，仅参考和摘录的藏文古籍就多达110多种，对于西藏历史上一些存疑问题，例如藏族人的起源、聂墀赞普的来历、直贡赞普的传承、吐蕃藏王的辈数等等，都引用非常翔实的材料，进行有根有据的分析，对于西藏与祖国的关系也做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

1994年，该书被译成汉文版出版发行，并于2004年、2008年两次修订再版。

雪域之音——才旦卓玛

2005年12月21日，“歌唱家才旦卓玛从艺50周年演唱会”在拉萨民族艺术宫举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欣赏。自1955年18岁的才旦卓玛第一次登台，这位歌坛常青树已经整整演唱了50年。

才旦卓玛，著名藏族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1937年6月，才旦卓玛生于西藏重镇日喀则一个农奴家里。才旦卓玛在藏语中是“长寿仙女”的意思，虽然出生在农奴家，父母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美丽、长寿。



才旦卓玛在从艺50周年晚会上演唱。

才旦卓玛的妈妈拉巴，从小在江孜一个庄园当差巴，后来被庄园主转让给定日地方的一家贵族，这个贵族在日喀则得到了官职和封地，妈妈又被带到日喀则来当仆役。她在这里和丈夫相遇，生下了三个女孩。

才旦卓玛说：“阿爸也是差巴，生生世世耕种着扎什伦布寺的一块支差地。他娶我母亲的时候，下面还有三个叔叔，一起生活，

组成一个大家庭。那时家里的生活虽然艰辛，但逢年过节会聚在一起喝酒、唱藏戏。阿爸的藏戏唱得很好，嗓音像涂了酥油一样圆润。”慢慢地，才旦卓玛也学会了唱藏戏，而且唱得比他们都好。

西藏和平解放后，日喀则成立了文工团。一有空闲，才旦卓玛就跑到文工团练功房的大门前，从门缝里偷偷观看演员练舞、说快板书和唱歌。1955年才旦卓玛作为日喀则地区的青联代表，到拉萨出席西藏全区的青联代表大会，并在大会的文艺晚会上一展歌喉，演唱了她从一位老艺人那里学会的牧歌。那悠婉而清亮的歌声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代表，才旦卓玛一鸣惊人。1957年年初，日喀则文工团正式吸收她为独唱演员。

1958年，出身农家、从来没读过书的才旦卓玛终于进入第一所西藏公学学习。半年后，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要办“民族班”，



才旦卓玛参加《东方红》演出后与国家领导人合影。

来西藏公学挑选学生。当时，才旦卓玛当着上海音乐学院主考老师的面，唱了两首歌，一首叫《牧歌》，就是《东方红》中《毛主席的光辉》前面的一段山歌，还有一首叫《献给毛主席》。“虽然老师夸我声音不错，可是我既不识字，又不懂乐理，如果按音乐学院的专业要求，我连做梦都不敢想自己会被录取。所以我说我的艺术道路全是政府给开辟的。”才旦卓玛后来回忆说。

由于从小学直接上大学，才旦卓玛的文化水平和音乐理论基础很低。因此，无论从哪方面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但是才旦卓玛在上海音乐学院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王品素教授。开始，才旦卓玛完全和学校别的学生一样练发声，因为语言不通，她甚至根本唱不出来，王教授可犯了难。后来王教授根据才旦卓玛的发音，声音很亮，但是喉骨很硬，唱歌的时候，声音也很硬，不会用气息，就让才旦卓玛在继续保持自己原来演唱风格的基础上，慢慢学习一些西洋科学发声方法。王教授对才旦卓玛说：“不管什么民族特点，唱法应该是科学的。在这个基础上，为了保持民族的个性，可以在咬字、发声、共鸣上作适当的调整。”

1963年，才旦卓玛作为新西藏的第一代歌手，被挑选参加了《东方红》的演出，一首《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一次亮出了才旦卓玛浑然天成的嗓音。此后，《翻身农奴把歌唱》、《在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和才旦卓玛的嗓音一起深入人心。

作为一名藏族歌唱演员，才旦卓玛得到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许多关心。周总理、陈毅见到才旦卓玛时经常讲：“才旦，怎么样，学习怎么样，要好好学习，学好了回西藏，好好为人民服务。”有一次到上海去，陈毅说：“才旦，你离开西藏时间长吗？”才旦说：“四五年了。”他说：“你一定不能脱离西藏，脱离西藏长了，你的酥油糌粑味道就没有了。你有时间还是要回去，不然时间长了，你唱歌就没有藏族味道了。”



才旦卓玛和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在一起。

1965年，才旦卓玛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开始用她的歌喉为西藏的老百姓服务，此后的演出生涯，条件虽然艰苦却乐此不疲。她长年骑着马到西藏的农村、牧集，在开阔的场地扯一块横幅就开始演唱。有的时候走在街上，很多人都会认出她，拉着她的手说："阿佳啦（大姐），给我们唱个歌吧。"才旦卓玛都会满足大家的愿望。

在此期间，才旦卓玛还多次作为中国歌唱艺术家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印尼、柬埔寨、尼泊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北欧五国，美国、澳大利亚、古巴、墨西哥及非洲各国和香港地区访问演出，她的歌声受到海外人士赞赏。

才旦卓玛最有影响的歌曲有《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北京的金山上》、《阿玛列洪》、《酒歌》、《我们在相聚》、《一个妈妈的女儿》等。这些歌曲与西藏的发展进步几乎同步。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推翻旧制度跨入新社会，百万"翻

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西藏自治区成立，建立人民政权，藏族人民当家做主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歌唱《在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光辉》；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在党中央发出“全国支援西藏”的号召之下，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的支援西藏建设的热潮再次掀起高潮，在全国各省市的援助下，西藏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藏族人民歌唱民族大团结，《献给毛主席》、《一个妈妈的女儿》等民族团结的颂歌，表达对祖国母亲和各民族兄弟的亲情厚谊。

今年已经74岁的才旦卓玛并没有停息她的歌喉，在国内的一些大型活动中，还时常能听到她亮丽如初的嗓音。

强巴赤列与藏医藏药

强巴赤列，1929年生于拉萨，他的祖父多吉坚参是一位著名的藏医。强巴赤列小时候在拉萨一所私塾里学认字，后来被送到哲蚌寺当僧人。

1941年的一天，母亲拉着他的手，带着哈达来到拉萨“门孜康”（藏医历算院）钦绕诺布大师前。钦绕诺布(1883~1962)，是西藏当代最著名的藏医、历算大师，也是拉萨藏医院的创始人，要拜他为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后来谈起强巴赤列的家世，钦绕诺布大师记起他年轻时曾追随强巴赤列的祖父学过医术，一日师，百日恩。于是他破例收下强巴赤列这个穿着袈裟的少年弟子。

强巴赤列在老师的指点下，每天黎明起床，祈祷、背诵、听课、答辩。经过9年的艰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语言学等全部课程，并能背诵数十万字的《四部医典》和有关天文历算方面的著作。

1951年秋天，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和平解放，开始了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21岁的强巴赤列作为一名年轻藏医，对解放军医疗队的诊治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常常在大街小巷对他们穷追不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我认识到解放军医疗队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与钦绕诺布大师的教诲是一致的，而且共产党并不像谣传的那样可怕，很像传说中药王城的‘白衣天使’。”从那时起强巴赤列就有个愿望，要向西医学习，并想将藏医、西医结合，更好地造福西藏人民。

西藏民主改革一度冲击到藏医院。有人误认为藏医是宗教产



西藏藏医学院在整理藏医古籍。（觉果摄）

物，“不科学”，曾一度把藏医院改为以西医为主的综合医院。这时强巴赤列心急如焚，四处解释藏医药学的科学性，以藏医学者的执著，为藏医学的身价和地位呼吁。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在听取了关于藏医工作的汇报后当即指出：藏医是一门科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对于这笔财富，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保护、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钦绕诺布被正式任命为拉萨藏医院院长，强巴赤列为副院长。师徒两人配合默契，扩建古老的门诊部，还成立了医学遗产整理小组，记录和整理钦绕诺布的医学著作《103种常见病的诊治》、《200种草药的性能和作用》等，藏医学从此枯木逢春，有了新的生机。

1962年，钦绕诺布逝世，强巴赤列接任院长。此后一直在这个位子上为藏医藏药的发展竭尽全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藏医、历算被当做“封建迷信”的“四旧”加以破除，大量典籍资料被毁，强巴赤列清醒地意识到，若长期这样下去，藏医、历算这两种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定会遭到灭绝。他冒着风险，毅然拿起笔，开始著书立说。在几乎没有资料可供查阅的情况下，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顽强的毅力，短短一年多里写出《藏医基础》、《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五官科学》、《妇科学》、《儿科学》、《方剂学》11种教科书，约22万字。这些教科书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藏医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在使用中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收到良好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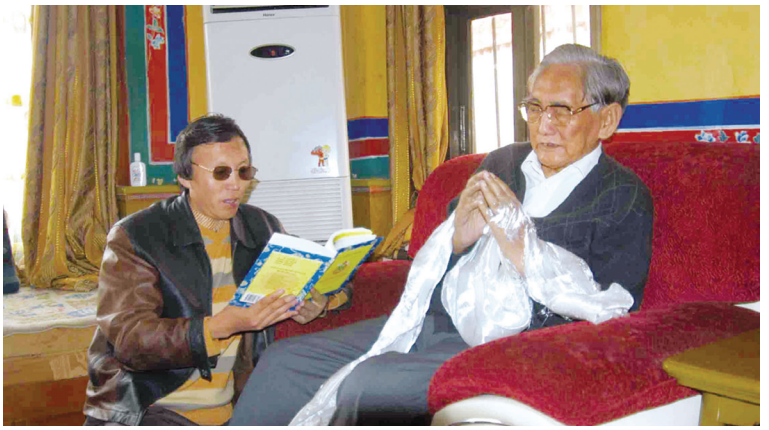
西藏首届藏医博士学位获得者。(觉果摄)

果。昌都地区卫生局很快正式出版发行了这些书。青海、云南、甘肃、四川等地的藏医教育机构也纷纷将这些书列为正式教材，内蒙古的蒙医学校也将其列为参考书。1985年成立的西藏大学藏医系，1989年成立的藏医学院，把这些教科书列为必修科目。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强巴赤列更加焕发青春。他除了做好院长的一摊行政工作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迄今，强巴赤列已发表的专著、译著、论文约30多部(篇)，近100多万字。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对藏医、历算的理论有所创新。以他为首编著的80幅藏医学彩色挂图(共有4700多张细部照片，23万余字)，被誉为“国内藏医界第一部医学教学彩色挂图”。这些挂图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译成汉文和英文。此书先后获“中国图书奖”金奖，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医史文献图书评比金奖，“中国中医药博览会”金奖，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及医学工具书金奖等。

作为藏医学的领军人物，他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西藏科协主席。《中华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卷》副主编；《西藏天文历算总汇》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编辑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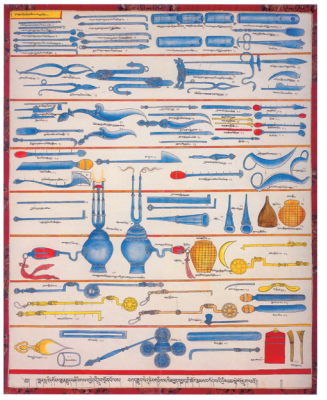
如今，强巴赤列虽已双目失明，仍在辛勤工作，近期出版的



如今强巴赤列双目失明已无法看书写作了，但他还是在助手帮助下继续工作。

《藏医藏药目录学》、《藏医四部医典八十幅曼唐释难·蓝琉璃之光》，都是在助手协助下完成的，用强巴赤列的话来说，这是“为后人留下更多更好的精神财富”。





《四部医典》中的人体脉络图和医疗器械图。

西藏的自然保护区

珠峰脚下，有一个用鹅卵石和水泥砌成的小金字塔一样的石碑，上面刻着“我的护身符”，这是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标志。每年都有科学工作者和志愿者在保护区内工作，大到观察珠峰地区的环境变化，采集冰雪、岩石、降水和土壤，甚至动物的毛发、各种物种，以得到珠峰地区环境的状况；小到收集和清理垃圾。国内一些著名登山家如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潘多、洛桑达娃等，都曾专程回到珠峰北坡大本营，清理垃圾。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主体，地势高峻，地理特殊，野生动植物资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举世闻名的世界第一大峡谷，2004年4月，中国国务院批准将墨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扩界和更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96.2万公顷。

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但这里地质年龄轻，环境很脆弱，是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和“生态源”，甚至还是中国乃至东半球气候的“启动器”和“调节区”。如今，保护西藏的环境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如今的西藏成了野生动物的王国。图为从湿地上起飞的灰鸭。（杨世君摄）

西藏的自然保护工作起步很早，1985年4月，西藏完成了第一批自然保护区的区划工作。9月2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批复》，批准建立了墨脱自然保护区、察隅自然保护区、波密岗乡自然保护区、林芝巴结自然保护区、聂拉木樟木沟自然保护区、吉隆江村自然保护区等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及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的6个自治区级保护区。1988年11月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再次批准建立西藏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这7个保护区总面积370万公顷，其中墨脱保护区荟萃着大量的珍贵稀有动植物品种，又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一套相应的管理措施也随之建立起来，除了保护人员的责任制外，还有对保护区内居住人员的教育等相应内容。

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3900多平方公里，仅次于新疆阿尔金山、藏北羌塘自然保护区。仅珠峰登山大本营、荣夏、嘎玛沟三处核心保护区，面积就达一万多平方公里。有雪豹、岩羊、长叶猴、藏野驴以及各类珍稀鸟类。其中位于珠穆朗玛峰东坡的嘎玛沟保护区，从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草甸到海拔2000米的灌丛、森林、亚热带植物，应有尽有，被外国探险家称为“十大景观之一”。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至今仍保持原始风貌。



2007年11月，来到拉萨河谷越冬的黑颈鹤在民居前的青稞地里嬉戏。2007年的一次统计显示，西藏现有黑颈鹤6940只，近几年来年均增幅约达3.9%，约占世界黑颈鹤总数的75%。

西藏的野生动物资源也极为丰富，据西藏自治区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料，有昆虫2300余种，鱼类64种，两栖类45种，爬行类55种，鸟类488种，其中受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鸟兽达115种，如世界罕见的野牦牛、黑颈鹤、藏野驴、藏羚羊、滇金丝猴等。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1991年6月成立，阿沛·阿旺晋美任名誉会长。

除已有的自然保护区外，西藏建立了6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它



们是羌塘野牦牛、野驴、藏羚羊保护区、芒康滇金丝猴保护区、申扎黑颈鹤保护区、林芝东久红斑羚保护区、类乌齐长毛岭马鹿保护区和林周黑颈鹤越冬保护区，使西藏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

此后西藏又陆续建立了藏北羌塘自然保护区、昌都芒康盐井自然保护区、申扎湿地自然保护区、林芝东久自然保护区、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等等，这些保护区的建立，为改善环境、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维持生态平衡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西藏境内的规模湿地有上千处，总面积达600多万公顷，居全国首位。仅拉鲁湿地每年通过光合作用就可吸收二氧化碳7.88万吨，产生氧气5.37万吨。近年来，西藏先后完成德庆格桑颇章湿地和拉鲁湿地一期保护工程，并在拉鲁湿地保护区内植树，实施“投



为了保护藏羚羊，20世纪90年代初，西藏自治区把藏羚羊主要栖息地藏北羌塘的大部分区域划入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陆生野生动物类型保护区；2000年，羌塘自然保护区又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图为正在奔跑的藏羚羊。（肖长伟摄）



生活在羌塘自然保护区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野驴在草原上奔跑。

食引鸟”行动，招引了久别的赤麻鸭等上千只珍稀鸟类回归。在拉萨市区的拉鲁湿地、日喀则市区的德庆格桑颇章湿地和林芝地区的巴结湿地，随处可见各种珍稀鸟类高盘低旋。高原湿地保护力度的加大和湿地保护面积的拓展，使西藏的珍稀鸟类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濒危动物黑颈鹤的数量近年来以年均4%的速度增加，2007年已增至近7000只，占世界总量的七成。

截至2009年，西藏共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保护区面积达到41.37万平方公里，占西藏面积的34.47%，建立了21个生态功能保护区、7个国家森林公园、3个地质公园、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西藏人口

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见证。

关于历史上西藏人口较准确的统计资料面世很少，至今见到的多为概略性数字。

公元6世纪，在现今西藏范围内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奴隶制小国。据《中国人口·西藏分册》记载，当时势力最强大的雅隆部落，为“悉补野”世系的后代赞普统治，占据着今天的日喀则、拉萨、山南的大部地区，人口约25万；另一个是苏毗国，在今那曲地区和拉萨部分地区，人口约15万；还有一个是羊同国，在今阿里地区和那曲部分地区，人口约25~30万；以及东女国，在今昌都地区，人口约20万，当时西藏境内人口总计约为85~90万。

西藏人口，从历史上看，曾经有过一些大的起伏。

公元7世纪，雅隆部落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兼并了邻近的部落，统一西藏，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据《中国人口·西藏分册》记载，当时西藏境内人口总数达386万左右。这是西藏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从7世纪到18世纪，由于天灾频仍，疫病不断，医疗条件差，加之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僧尼，西藏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甚至持续锐减。18~20世纪中叶的200年间，由于农奴制的残酷剥削压迫，西



75岁的米玛顿珠与曾孙在一起。



次仁白姆老人在拉萨夺底乡敬老院内浇花。

藏地区人口又骤降了约80万。大量史料证明：旧西藏广大老百姓基本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人口增长缓慢。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200多年间，人口长期徘徊在100万左右。1953年西藏地方政府统计申报的西藏人口为114万人。

《西藏自治区2007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年底西藏总人口为284.1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达56.55万人，占总人口的19.9%；乡村人口达227.6万人，占总人口的80.1%；人口出生率为16.4‰，死亡率为5.1‰，自然增长率为11.3‰。在总人口中，藏族占92%，门巴、珞巴等其他少数民族占3%，汉族占5%。人口平均寿命由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了现在的67岁。2008年3月16日，拉萨市林周县江夏乡加荣村藏族老人阿麦次仁迎来了她117岁的生日。目前，西藏是全国百岁以上老人较多的省区之一。据西藏自治区老龄工作委员会统计表明，2006年年末，西藏281万人口中，有80岁至99岁的老人19500万多人，而百岁以上的老人有79人，这是西藏历史上百岁老人最多的时期。

西藏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6人，只有全国人口密度的1/60。其中，拉萨平原、年楚河中下游平原、泽当平原等地平均每平方公里有50人左右；而拉萨市城关区的人口密度则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雅鲁藏布江中游的上段、拉萨河上游及藏东横断山区东北部，人口密度为平均每

平方公里3~10人，居民较多的地区是拉孜、萨迦平原、林芝附近的尼洋河河谷、昌都附近的澜沧江河谷等地；阿里地区东部和那曲地区西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方，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0.23人。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社会发展造成了压力，为了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普遍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在西藏，中央政府支持西藏地方按照民族区域自治原则，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特殊的人口政策。1984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在西藏地区实施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中对汉族公职人员提倡和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藏族公职人员和城镇居民中提倡计划生育，一对夫妇有间隔地生育两个孩子，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反对和禁止任何形式的强制性堕胎。



西藏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吉古村农民洛桑强白（右三）和老伴唐冲（左二）与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格桑达瓦摄）

实行上述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约占自治区总人口的8%。而对占全区总人口92%的农牧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则不限制生育的胎数，而是通过宣传科学节育，合理生育，倡导优生优育，以保障母婴健康和提高人口素质，对自愿要求实施节育措施的农牧民，政府卫生部门会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西藏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目前，西藏全面建立了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如今，除少数牧区外，西藏所有的家庭都有固定的住房；2006年起西藏开始实施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到2007年年底，已让11.4万户、57万多农牧民迁入新居。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谐社会应以和谐人口为基础，实现西藏人口和谐发展必须要认清西藏目前人口的现状，把握西藏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信息中心提供的人口预测软件CPPS对西藏2006—2050年人口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结果表明：1. 西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下乡为儿童巡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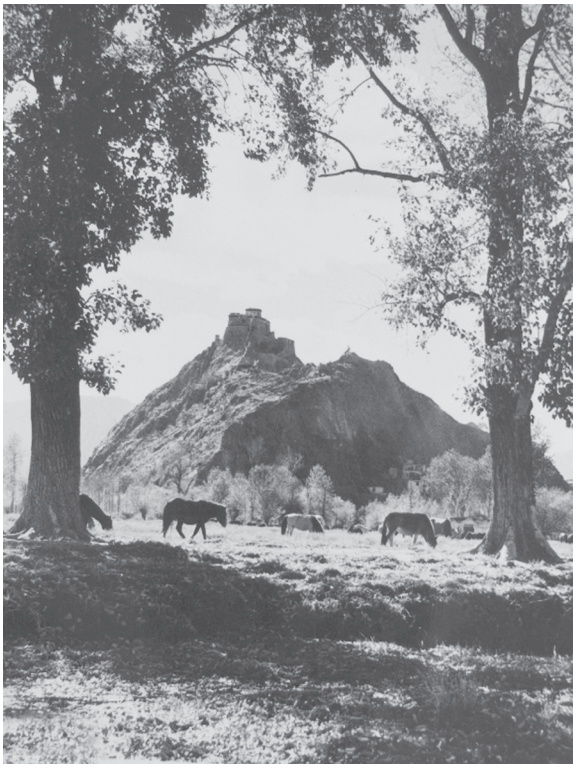
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捧着切玛，端着青稞酒出来拜年。老人说现在村里的人口多了，挨家挨户拜年，一天也转不完。

藏人口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2006~2050年将增加150万；2. 育龄妇女人数不断增长，2006~2050年将增加23万，平均每2年增加1万；3. 2006~2050年劳动适龄人口将增加65万，劳动力资源质量的高低对西藏未来经济的发展影响越来越大；4. 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人口再生产类型由增加型过渡到稳定型进而过渡到减少型；5.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西藏老年负担系数稳步上升，少儿负担系数缓慢下降，“人口红利”期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

门孜康与现代医疗事业

2002年，26岁的次仁德吉距预产期还有一段时间，就住进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她说，与在家由“接生婆”帮助分娩相比，更愿意接受正规大夫的帮助和在医院生产。

次仁德吉所在的日喀则江当乡仲巴村，距中尼公路有40多公里山路，从村子步行到国道要五六个小时，搭车去日喀则要两个多小时。次仁德吉说，由于交通不便，过去村里许多妇女都在家中生孩子，她母亲也是。母亲共生育5胎，其中一胎出生后不久死亡。如今，次仁德吉住院分娩不用花任何费用，还可获得20元的补助和一套婴儿服，她的护送者也可得到10元钱的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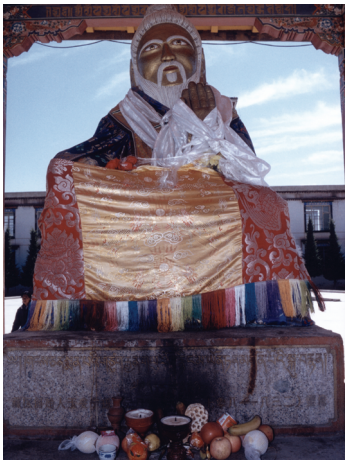
20世纪初药王山及建在药王山上的门孜康。（索穷提供）

西藏的医学起源很早，大约在吐蕃时期就出现了著名的医学著作《月王药珍》、《四部医典》(即《居希》)，也诞生了非常有名的藏医学家宇妥·云丹贡布等。作为一种实用医学，藏医学在民间有效地传承，并不断积累和完善。到五世达赖(1616~1682)时期，第悉桑结



斋康·强巴土旺的学生钦绕诺布（左二），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第一任院长。（索穷供）

嘉措在拉萨药王山建立了一所专门的藏医院，这时，藏医学开始进入一种自觉发展阶段，因为这所医院不仅仅是看病，还培养藏医人才。西藏地方政府规定，拉萨附近的大寺院、宗政府（相当于县）都要派人到藏医院学习。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1875~1933)在拉萨大昭寺西侧建立了“门孜康”，“门”指医药，“孜”表示历算，意为藏医天文历算学院，并由近代最负盛名的藏医钦绕诺布大师出任院长，主持工作。钦绕诺布（1883~1962）出生在山南地区恰萨拉康寺附近。因其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努力，终于成为当时最出类拔萃的名医，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重用，聘为私人保健医生。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中的藏医始祖宇妥·云丹贡布塑像。（索穷摄）

在钦绕诺布主持下，门孜康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的教学制度。学员由各地寺庙选送，最多时达到150名。学习内容除医学必修外，还包括佛学、语言学等，医学本科主要学习经典著作《四部医

典》。此外，还着重讲解人体的脏腑解剖、藏草药知识。门孜康培养出一大批藏医人才，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里先后培养藏医370余人，他们后来都成为藏医学的骨干。

20世纪60年代以来，藏医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先是药王山藏医院和门孜康合为一体，成为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藏医藏药中心，拥有鲁布附近的门诊部大楼、龙王潭附近的住院部大楼和北郊的制药厂，该厂制作的名贵藏药珍珠七十和仁青常觉等，曾获国家银质奖和神农奖杯。1989年成立的西藏藏医学院，由当代著名藏医措如次朗出任院长，学院设大学部、中专部和进修部，培养各个层次的藏医药人才。西藏山南、日喀则、阿里、那曲、林芝、昌都等地区都成立了藏医院，每个县都设立了藏医科，全区藏医人数达到700多人，其中高级藏医师100余人。藏医国际合作事业也初见端倪，日喀则边雄藏医学校、山南松赞藏医学校便是由国外红十字协会援建的。

尽管西藏的医学起源较早，但很不普及，全民性的卫生医疗条件一直十分落后，普通人生了病，主要还是求神拜佛。西藏的现



现代著名老藏医措·如次朗与当时的藏医学院院长加措在研究教学。（中国西藏杂志社供）



藏医阿尼措珍和她的家人。（巴桑次仁摄）

代医疗是在5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50年代初，国家先后派出三批医疗卫生队进藏，成为西藏卫生工作者的基本队伍。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完成，医疗卫生发展迅速，60年代建立了县医院，70年代建立了区乡两级卫生机构，到80年代，一个以拉萨市为中心的、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络基本形成。仅拉萨市区就先后建立了自治区人民医院、拉萨市人民医院、自治区藏医院、自治区工人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武警医院等等。2009年，西藏共有卫生机构1378个，其中医院、卫生院763个，卫生技术人员8913人。每年收治各种病人都在250万以上，农牧民基本上能做到小伤小病不出乡，一般疾病不出县，疑难病症不出本地区，得到及时医治。

由于西藏人民享有的健康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西藏人口由1959年前的100万增加到现在的290多万；人口平均寿命从35.5岁提高到了现在的67岁。针对西藏是一个农牧民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卫生部门为广大农牧民群众提供了医疗、保健、预防的



藏医唐卡。（中国西藏杂志社供）

便利，并在西藏推行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这一制度已经覆盖所有农牧民，使农牧民的卫生保健状况得到迅速改善。农牧民免费医疗费用由2004年的每人每年40元提高到2007年的100元。

西藏曾是传染病的多发地区，天花、霍乱、伤寒到处肆虐，20世纪30年代初，拉萨一次天花的流行，就有近5000人死亡。从60年代以后，西藏开始有了自己的卫生防疫机构，开始只有一个卫生防疫站，到了70年代初期，各地防疫站相继成立，先后建立了82个防疫部门，几乎所有的县设了防疫站。他们为群众接种牛痘，西藏从此再未发现天花病例。同时对伤寒、痢疾、百日咳、水痘、脑膜炎等急性传染病进行了防治，接种各种疫苗，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西藏的妇幼保健工作也有较快发展，各地区都建有妇幼保健院，对全区的妇女和儿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进行了普查普治。许多县还建立了乡村妇幼保健室，对妇女宣传卫生知识，对儿童开展计划免疫。

西藏的当代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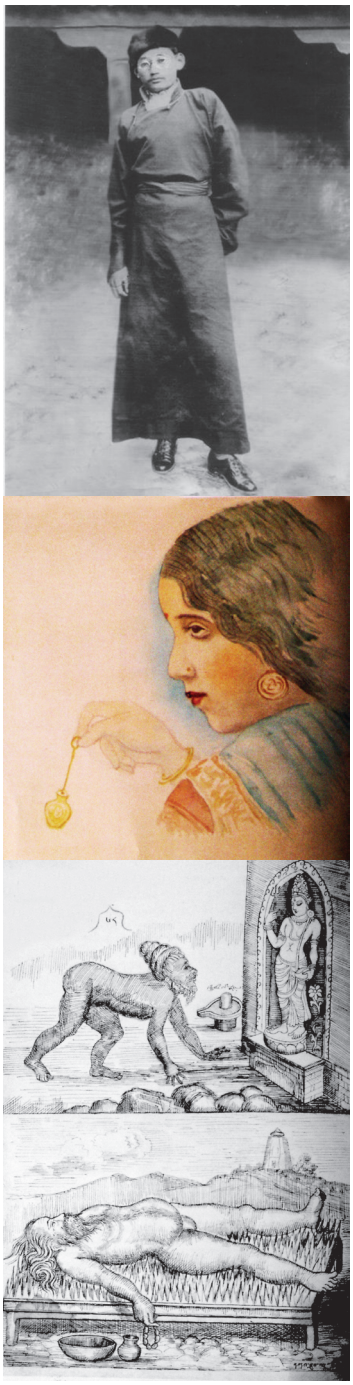
20世纪末21世纪初，让人感受到西藏最深文化冲击和印象的事物之一，无疑是西藏美术，那些吸收了丰厚传统艺术滋养的当代美术作品充满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西藏美术作品的特点，和藏人的生活和信仰密不可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古典美术形式，首先是唐卡，也被称作卷轴画。唐卡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四五千年前的卡若文化遗址中，从简单的彩绘纹饰上，就可以窥见唐卡艺术的先河。而人们现今所见到的唐卡，它滥觞于佛教传入西藏之后，伴随着佛教在西藏高原的弘传，一方面发扬更新原有艺术特色，一方面吸取汉地或印度、尼泊尔等异域艺术精华，是藏族古典美术的代表。

对于西藏当代美术来说，应从20世纪初的更敦群培和安多强



大画家安多强巴在作画。（廖东凡摄）



更敦群培像和他的美术作品。

巴算起。更敦群培是20世纪西藏首位人文主义学者和僧人，他在学术和美术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创新，将藏族传统学术引向科学实证的道路，而在美术领域他首次将美术重点从神佛转向人，开创了西藏人文主义的绘画传统。

安多强巴，也是一位来自藏族安多地区，与更敦群培同时代的僧人，他通过临摹自己看到的黑白照片，开创出一种写实画法。

1954年，安多强巴创作了一幅主题唐卡《伟大领袖毛泽东》，成功奏响了革命主旋律。由于这一因缘，他有幸随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一道进京。在北京期间，他有机会去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强化了艺术上的写实主义追求。1956年，安多强巴在罗布林卡创作了西藏壁画传世名作《释迦说法》、《权衡三界》，从而确立了他在西藏美术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198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西藏分会成立，安多强巴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受更敦群培、安多强巴影响，更因有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激发，西藏美术界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风尚，许多受过传统绘画训练的画师尝试新法，成就卓著者有益西喜绕、洛松西绕、次旺多吉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还有许多藏族青年纷纷报考内地美术院校，系统地接受现代美术训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藏美术进入全面深刻的变革时期，画家们怀着各自的艺术



安多强巴作品：壁画《释迦说法》。

理想和五花八门的艺术观念，共同痴迷于西藏的诱惑，西藏现代美术在随后的80年代初，热火朝天地步入当代，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面貌群体登场，令世人注目。

1991年出版的《西藏当代美术》（西藏美协编、余友心主笔）总结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藏美术的主要成就。这年，著名美术理论权威邵大箴先生赴西藏考察，并为《西藏当代美术》的出版撰写长篇论文，系统论述了西藏当代美术的文化渊源、美学特征和面向世界的发展前景，他着重提到的藏族画家有：丹增朗杰、强桑、扎西次仁、次仁多吉、阿曲、阿布、格桑、



藏族当代画家计美赤烈的作品：《青藏铁路》。

桑曲、阿旺晋美、计美赤烈、阿旺扎巴、巴玛扎西、嘎德等。他还提到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画家诸有韬、罗伦张、韩书力、余友心、李知宝、于晓东、叶星生、张鹰、刘万年、陈登木、翟跃飞、邓涛等。文章着重评价著名画家韩书力说:“作为画家，他熟练运用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手法，组成一幅幅充满幻想情趣和诗意的画面，韩书力是想象力、感觉力、表现力非常丰富的实践家，他近年又步入新的创作境界，作品具有特殊魅力。”1996年，韩书力、于晓东、阿旺扎巴共同完成了油画《金瓶掣签》，这是一幅具有厚重历史感与较高文化品位的作品，与安多强巴的壁画《权衡三界》相对应，代表着两个时代。



西藏当代女画家德珍的作品：《牧童》。



西藏画家拉巴次仁2008年创作的《盛世和光——中国西藏日喀则全景图》。

1979年以来，在参加全国性美术展览中，西藏美术家的布画《赛牦牛》和《进军途中》、《毛主席派人来》、《欣欣向荣》、《织毛毯图》、《织氆氇》、《奴隶的儿子》、《彩云图》、《小学生》、《等待》、《制陶艺人》、《藏医》、《边寨日月》、《汤东杰布》，彩色版画《云端》、《布谷》和连环画《邦锦梅朵》等共19幅绘画获得各种奖励。

198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西藏分会已有会员69人，其中22人为全国美协会员。1982年西藏大学成立艺术系并设美术专业。

1981—1985年，藏汉族画家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大型壁画的创作，完成了歌颂汉藏团结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八思巴觐见忽必烈》，反映西藏民情风俗的《藏历年》、《望果节》、《雪顿节》，以及表现西藏奇丽风光的《湖泊》、《草原》、《林海》、《珠峰》等壁画，显示了继承和发扬西藏壁画艺术的实绩。

2003年，西藏23位画家参加第三届中国油画展，青年画家们既对本西藏的传统艺术深深迷恋，又为当代的前卫思潮所强烈吸引，并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些共同点。

2004年西藏当代绘画展《雪域彩练》在中国美术馆隆重推出，展出作品全部为80年代以来在西藏新生的“布面重彩画”。“布面重彩”这个概念深深地扎根于以唐卡为代表的西藏传统文化，又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广泛可能性，给西藏画家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创作新天地。

雅鲁藏布大峡谷

1994年4月17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经我国科学家杨逸畴、高登义、李渤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刘东生等考察和联合论证发现：深达5382米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这条消息，立刻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极大轰动。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有两个著名的世界之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珠穆朗玛峰是最高峰被人类公认已有许多年了，但百余年来，人们提起世界第一大峡谷想到的多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1994年年初，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中国科学家杨逸畴等，通过多次实地考察，经过综合规模性的论证和对比，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全长504.9公里，长于美国370公里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平均深度为5000米，最深处达到5382米，深于深度3200米的秘鲁科尔卡峡谷，所以是世界上长度最长、深度最深的第一大峡谷应是雅鲁藏布大峡谷。1998年10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将这一世界最大峡谷科学地定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罗马字母拼为Yarlung Zangbo Daxiagu，简称大峡谷。

早在1902年，一个英国军官曾偷偷潜入中国境内，深入到白马狗熊（“白马狗熊”是大峡弯深处的一处地名，是藏族人专门深入到大峡弯中拜神祭祀的地方）前面的大峡谷里。回国后这个英国军官写了一本《无护照西藏之行》的书，谈到他在大峡谷里面看到一处异常美丽的瀑布。大约二十几年后，一个英国植物学家



雅鲁藏布江上游，江流舒缓，纵横交错。

也来到大峡谷，在著作《藏东南考察记》时，对在大峡谷里看到的两条美丽瀑布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197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开始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多学科的全面考察，杨逸畴等在派区（地名）沿雅鲁藏布江向东深入，整整走了15天，到达白马狗熊。这里两侧全是陡直的绝壁，根本无法通过。1974年9月，杨逸畴等科学家又从派区翻越多雄拉山口，从大峡谷下方的墨脱县逆江而上，从大峡谷顶端岗朗艰难地向腹地挺进，初次进入大峡谷。夏天的大峡谷，景色



雅鲁藏布大峡谷马蹄形大拐弯。（张文敬摄）

瑰丽神奇：地面上的小湖泊星罗棋布，河谷里水草丰美，谷地两边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山顶上的积雪终年不化；同一山峰的坡面上，竟然分布着9个垂直自然带。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1982~1984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支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队，杨逸畴担任现场总负责人。两年内，他4次走遍通往大峡谷的每条险路，共发现四处美丽的大型瀑布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渤生也参加了此次考察活动，3位科学家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94年3月，杨逸畴、高登义、李渤生应邀前往我国台湾进行讲学，从台湾同行那里得到一个重要信息：美国科学家在前往西藏旅游时，偷偷拍过几张大峡谷的照片。通过分析，他们认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端的南迦巴瓦峰下的大峡谷，可能不逊于科罗拉多大峡谷，但缺乏实地考察证据。

从台湾回到北京，杨逸畴调来大峡谷的航测地形图、航空相



派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入口处。

片和卫星影像图，与他在大峡谷中拍的照片对照，并根据一次次实地考察记载下的数据仔细比较和计算。一个月后，他得出结论：中国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随后，他又和高登义、李渤生及老一辈科学家刘东生一起审阅复核，确认这个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于是，他们一起公布了这个发现。

1998年10~12月，由57名科考队员组成的考察队，历尽艰辛万苦，实现了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次徒步考察中，科学家们首次利用卫星精确测量大峡谷，对大峡谷的特征、地理河段进行精密测绘，再次以权威数据证实，雅鲁藏布大峡谷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大峡谷。

雅鲁藏布大峡谷坐落于雅鲁藏布江下游，入口处在米林县的派区，出口处在墨脱县的巴昔卡村。峡谷最深处位于南迦巴瓦峰和里勒峰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宗容村，谷深6009米。大峡谷江面从入口处的宽660米，逐渐收敛至最窄处的35米，江面最大

坡降（河段高程差与距离之比）为75.35‰，从上述各项特征数据看，雅鲁藏布大峡谷无疑是世界其他大峡谷所无法比拟的。

雅鲁藏布江在墨脱县境内形成了罕见的“马蹄形”雅鲁藏布大拐弯，大峡谷两侧高耸的山峰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和加拉白垒峰（海拔7234米），巍峨挺立，直插云间，由于地势险峻、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而且许多河段根本没有人烟，加上大峡谷云遮雾罩、神秘莫测，所以环境特别幽静。而沿江谷地平缓开阔，谷底是热带雨林，茂密的森林遮天蔽日，河水波涛汹涌，构成了世间最美丽的风景。雅鲁藏布大峡谷有着独特的气候特征，它处在中纬度温带、暖温带的地理位置，印度洋的水汽和热量穿过南迦巴瓦峰的崇山峻岭形成雅鲁藏布大拐弯水汽通道，向青藏高原内部源源不断地输送印度洋暖流，使海拔7782米高度的南迦巴瓦峰到只有700米海拔的大峡谷底，具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等9个垂直自然带，从冰雪覆盖的山峰，浓密的原始森林，到绿草茵茵的平谷山地，生成了最丰富多彩的植被，有植物3600多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局部。（乔治·夏勒摄）



雄奇的南迦巴瓦峰。

种，大型真菌400多种，哺乳动物60多种，昆虫1500多种，世界上许多濒临灭绝的古老物种也能够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繁衍生息，雪山融化形成了大大小小湍急的瀑布，使世界上最丰富的水能资源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汇集。

雅鲁藏布大峡谷有着草原、森林、冰川、雪峰，它壮美、丰富、险峻，是世界上完美的生命乐园。

青藏铁路的建设

2006年7月1日，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从这天起，西藏彻底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西藏人民盼望了半个多世纪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天上午10点，首列火车从拉萨和格尔木同时开出，西藏的交通事业由此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到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814公里，格尔木至拉萨1118公里。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修建铁路的事。1956年1月，根据中央“青藏高原能修公路，就能修铁路，让铁道部派人进藏考察”的指示，慕生忠带领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工程师曹汝桢、刘德基、王立杰等，乘坐军用吉普车，沿青藏公路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得出“青藏高原可以修铁路”的结论。

1958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青藏铁路工程局，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在西宁和关角山隧道分别开工。因为种种原因，工程几上几下。一直到1984年，青藏铁路的西格段才完成交付使用。

2001年2月8日，国务院批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建设。格拉段北起格尔木市，经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拉山，再经西藏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南至拉萨，其中青海省境内564公里，西藏自治区境内554公里，国家总投资262.1亿元，工期6年。

2002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格拉段全线正式开工。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这条铁路有965公里路段铺设在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地区，最高点在唐古拉山海拔

5072米的地区。高原严寒缺氧，不仅对人体生理和机械设备的使用带来影响，而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沿线地质复杂，需要经过多年冻土地段550公里。全线桥隧总长约占线路总长的8%。

在青藏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逐步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的严峻挑战。

冻土就是土壤在低温下冻结。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土壤和岩层常年都处于冻结状态，只是随着夏季的到来，地表表层会有一定程度的融化，但一到冬季，它又会重新开始冻结。冻土的特性对铁路的修建有非常大的影响。冻土在冻结的情况下就像冰一样，随着温度的降低，体积发生膨胀，这样，建好的路基和钢轨就会被体积膨胀的冻土顶起来。到了夏天，融化了的冻土体积缩小，钢轨也就会依着它降下去。冻土的反复冻结、反复融化在铁路的路基施工中交替出现，就会造成路基的翻浆、冒泥，整个钢轨就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现象，对正常通车造成巨大影响。为了攻克冻土难题，铁路建设者采取了以桥代路、片石通风路基、通风管路基、碎石和片石护坡、热棒、保温板、综合防排水体系等措施，保证了青藏铁路的建设。

青藏铁路的施工要穿过青藏高原上的两个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300多公里。这里高寒低氧，生态环境独特原始而又敏感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恢复。因此这里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优先地区。为了保护好沿途的生态环境，青藏铁路格拉段原计划投资262.1亿元，2005年6月，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国务院批准调整为330.9亿元，其中环保投资15.4亿元，这



开通青藏铁路隧道的工人们在打风钻。



第一代藏族列车员。（新华社供）

在全世界单项工程用于环保的投资量中是相当罕见的。此外，青藏铁路建设中，为野生动物设计、建设33个桥下、隧道顶或缓坡通道，第一次为野生动物开辟迁徙通道。位于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清水河特大桥，就是青藏铁路专门为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迁徙而建设的。

修建这样一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铁路，如何战胜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恶劣的难题，是确保施工顺利进行的关键。 据铁路部门的测算，在海拔4700米至4900米的地方，氧气的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45%~47%。为了解决施工人员高原缺氧的问题，青藏铁路各参建单位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段。把氧气袋、氧气瓶配发到宿舍、车辆里；施工人员们背着氧气瓶进行施工作业；气候条件极差的隧道，则建立了制氧站，把隧道外面制出的氧气源源不断





第一次坐上火车的藏北牧民，兴奋地望着窗外的风景。（觉果摄）

地输送到工作空间；16台高压氧舱也配置到沿线各个地方。在5年建设周期中，10多万建设者实现高原病零死亡、鼠疫疫源区零死亡；每名建设者每天可吸氧两小时等制氧技术，在世界高原铁路建设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专藏铁路列车奔驰在藏北草原。



青藏铁路旁的女孩。（王守明摄）

自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以后，已经在全国各地开通了7条前往圣城拉萨的列车，目前有从广州、上海、北京、兰州、西宁、成都、重庆等地到拉萨的列车。青藏列车途经的城市有：北京、广州、长沙、武昌、郑州、石家庄、上海、无锡、南京、蚌埠、徐州、西安、成都、广元、宝鸡、重庆、广安、达州、宝鸡、兰州、西宁、德令哈、格尔木、沱沱河、安多、那曲、当雄共计27个城镇。列车车型主要以空调特快为主，直达车次有：T264(T265)、T164(T165)、T22(T23)、T222(T223)、T27、T28、N917、K917等到达拉萨终点站。

拓然巴——藏传佛教新的学衔制度

2004年8月20日，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会上通过选举成立了主要由高僧、活佛共27人组成的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任名誉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活佛任主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珠康·土登克珠活佛等7名高僧、活佛任副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同时宣布藏传佛教高级学衔评审委员会成立，由



第96任甘丹赤巴土登贡嘎在说法。（陈宗烈摄）

珠康·土登克珠活佛担任主任。这标志着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藏传佛教学衔制度的正式建立。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已有1000多年历史，学经和学位晋升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教派、各大寺院都有各自的学经和学位晋升办法。

格西学位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这一称谓是极少数僧侣经过长期的清苦修学而获得的一种宗教学衔，能够显示其在佛学知识领域具有的专业水平和身份。“格西”，意为善知识，也有译为佛学博士。格西学位传统上只授予在显宗扎仓学习、有一定成就的僧人，而不授予修习密宗的僧人。在格鲁派各寺院中对于格西的等级设置并不统一，学位名称也不尽相同。扎什伦布寺的显宗扎仓只设“噶久”和“噶钦”两个等级的学位，拉卜楞寺显宗扎仓设有“嘎然巴、然柬巴、多仁巴”三个等级的学位，塔尔寺显宗扎仓设有“仁建巴、多仁巴、夏仁巴、拉然巴”四个等级的学位，而以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为代表的拉萨三大寺显宗扎仓统一设有“拉然巴、措然巴、林赛、多然巴”四个等级的学位。对于各种格西学位的考取办法也因寺而异，学僧要学完寺院所规定的课程，经过多次考试才能被正式授予。

西藏的拉然巴格西考试一度因“文革”中断，从1986年起开始恢复了自1965年中断的给僧人授予格西学位的拉萨传昭大法会。1986年 和1987年传昭大法会中三大寺共有17名高僧考取了拉然巴格西学位。1988年，正在举行传昭大法会期间，由于少数分裂



2005年，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拓然巴格西学衔考试中的辩经。（程鹏摄）



2004年7月28日，在拉萨大昭寺进行拉然巴格西辩经，有6名僧人通过考试获得学衔。（觉果摄）

主义分子的干扰、破坏，制造了骚乱事件，破坏了法会的正常进行，扰乱了正常的宗教秩序。自此，一年一度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祈祷大法会被迫中断，每年考取格西拉然巴学位的活动也因此暂停。

2004年7月28日，中断了16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夏季预考在拉萨大昭寺正式举行。来自西藏拉萨哲蚌寺的益西塔杰、色拉寺的益西强巴等6位参加预考的高僧，平均年龄超过70岁。他们长期担任各自寺庙的经师，都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在僧侣和信教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高僧。在长达数小时的考试中，他们就藏传佛教五部大论的内容展开辩论，通过了夏季预考。

2005年2月16日是藏历木鸡新年正月初八，拉萨各大寺院举行一年一度的传昭法会，6位通过预选的高僧通过辩经，最终获取了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至此每年都有拉然巴格西的考试。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新的佛学学衔制度与拉然巴并存，这就



2005年10月18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嘉木样活佛向拓然巴学位获得者发放证书。（程鹏摄）

是拓然巴，意为佛学院的格西。

2004年9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正式招收学衔班，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藏区的11名僧人成为首届高级学衔班学员，标志着具有现代特色的藏传佛教新的学衔“拓然巴”学位制度诞生。佛教学衔“拓然巴”，是在继承藏传佛教传统寺院教育的基础上，借鉴了藏传佛教各寺院学位考试的历史经验，吸收了部分现代教育的新方法，形成的一种新的学衔制度。僧人在以往学位的基础上考试入学，经过一年的五部大论的深



2008年2月24日，获格西拉拓然巴学位的4位高僧旦增多吉、罗布贡布、江白拉桑、阿旺曲扎（从左起）。 新华社供



2005年10月，十一世班禅接见首届拓然巴格西，并与他们合影。（文群太摄）

入研修，再加上当代综合知识的学习，经考试和答辩通过后而获得学位。这个近似于现代意义上博士学位的宗教学位，是藏传佛教界当代最高的佛学学位，也是藏传佛教学僧的最高目标。

2005年9月5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首届高级学衔毕业考试在青海塔尔寺举行。根据新的学位制度所确定的办法，从藏区招收的首届高级学衔班11名学员进行了辩经和论文答辩。同年10月11名学员分别获得拓然巴格西学位。此后每年一届，到2008年，第四届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授予活动在西黄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隆重举行。11名藏传佛教界学修出众的僧人，经过严格的辩经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优异，获得了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至此共有44位僧人获得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

拉萨3·14事件

2008年3月14日上午11时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打乱了拉萨市民平静的生活。一时间，向来阳光明媚的日光城多处起火，浓烟滚滚。一些人在拉萨八廓街聚集，呼喊“西藏独立”口号，冲撞、谩骂并用棍棒、石块、长刀和匕首甚至开水攻击执勤民警；在小昭寺附近，一些僧人用石头攻击执勤民警，事态迅速蔓延。随后，不法分子开始对拉萨市区主要路段的临街铺面、中小学校、医院、银行、电力和通信设施、新闻单位实施打砸抢烧，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



2008年3月14日，拉萨市上空浓烟滚滚。

这起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

早在3月10日，就已有一些不法分子非法聚集闹事。这天下午，哲蚌寺约300余名僧人无视国家法律及寺庙有关管理制度，企图冲入拉萨市区制造事端，被执勤人员劝阻后，多次冲撞，谩骂殴打执勤人员，气焰十分嚣张；10余名色拉寺外地学经人员在大昭寺广场打出“雪山狮子旗”，呼喊“西藏独立”等口号。



这张路透社播发的照片显示，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市，一名右手持铁链的不法分子在焚烧中国国旗，另一名不法分子手持长刀。

3月11日至13日，个别寺庙部分僧人继续聚集，呼喊反动口号，把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的克制视为软弱，投掷石块，泼洒石灰、开水，致使几十名执勤警察和干部受伤，多人重伤。哲蚌寺3名僧人还用刀具自伤肢体并互相拍照，企图掩盖真相，混淆视听。

3月14日，骚乱活动蔓延到拉萨市城区。在这次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中，不法分子纵火300余处，拉萨90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5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10个，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毁。有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众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有数十名执勤公安民警受伤，其中重伤4人；有61名武警受伤，其中重伤6人。暴徒重点在拉萨八廓街、林廓北路、色拉路、纳金路、二环路、北京中路等地段多处实施打砸抢烧。遭打、砸、抢、烧的有拉萨市二中、海城小学、冲赛康商场、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北京东路支行、电信移动营业网点，以及新华社西藏分社、西藏日报社等新闻单位和一些政府机构，拉萨市直接财产损失达24468.789万元。



2008年3月14日，不法分子放火焚烧位于拉萨市北京中路的“以纯”服装店，次仁卓嘎、杨东梅、陈佳、何欣欣和刘燕5名服务员未能从火海逃生。3月21日，各族群众自动聚集到“以纯”服装店门口，祈祷被夺去生命的5位花季女子的灵魂安宁。

暴徒的野蛮行径，激起了西藏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佛协西藏分会副会长洛桑巴·赤来曲桑说，党和政府拿出大量资金维修寺庙，解决年老体弱的僧人生活上的困难，但是达赖集团却操纵暴徒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是不得人心的。自治区政协常委拉宗卓嘎说，看全国“两会”的报道，别的省区都在大谈经济建设，西藏却不得不拿出很多人力、物力来反对分裂、维护稳定，内心有一种酸楚感，那些搞闹事活动的人是民族的败类，达赖集团的行为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次破坏活动是境外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的。

事件发生以后，一些西方媒体进行了歪曲、虚假报道，一些政治人物出于遏止中国发展的目的，把暴徒的打、砸、抢、烧行为说成是“和平示威”，把中国依法处置这一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暴力行为说成是“镇压和平示威”，掀起了一股反华浊浪。这种倒行逆施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华侨的有力批驳，在国际舆论中，发出了客观公正的声音，起到了正本清源的良好效果。

事实再一次证明，达赖集团1959年叛乱失败逃往国外后，不甘心失去他们在旧西藏的封建特权，不愿意看到新西藏日益发展繁荣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破坏活动。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重组叛乱武装，对西藏边界进行袭扰；80年代、90年代在拉萨制造一系列

骚乱活动，妄图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达赖集团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放弃“西藏独立”，但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分裂中国的活动。达赖2007年窜访欧美时多次声称：“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呼吁有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2008年1月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进一步要求其支持者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举行示威游行，并借此宣扬藏人的诉求。达赖集团下属的“藏青会”在2008年“3·10”声明中明确叫嚣，“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也要恢复西藏的独立”，“永远不会放弃争取西藏彻底独立的斗争”。从3月10日开始，“藏青会”等组织开始举行从印度到西藏拉萨的所谓“挺进西藏运动”。组织者宣称，一旦活动在境外受阻，将发动各种抗议活动，并煽动境内藏区僧俗群众闹事，内外配合、统一行动。“3·14事件”前后，达赖集团通过各种渠道与境内联系，频繁向境内发布指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行动起来”，妄图在整个藏区掀起暴乱。“3·14事件”中拉萨极少数人进行的



这张路透社播发的照片显示，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市，处置打、砸、抢、烧事件的武警用盾牌抵挡不法分子投掷的石块。

打、砸、抢、烧等破坏活动，再一次证实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非暴力”，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

达赖集团制造的一系列闹剧和破坏活动很不得人心，也遭到国际正义力量的坚决反对。3月10日，几名“藏独”分子妄图闯入希腊古奥林匹克遗址，通过点燃火炬的方式“抗议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闹剧刚一开始，他们的火炬就被希腊警方扑灭，所谓“火炬手”也被赶出遗址。所谓“挺进西藏运动”没走多远，就被早已等候多时的印度警方悉数拦下，并拘捕了参加活动的“藏独”分子。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达赖集团的捣乱破坏活动永远不会得逞。

50多年来，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投身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水平。西藏人民早已当家作主，实现了真正的自治。



2008年3月28日下午，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在“以纯”服装店前了解5位女服务员被烧死的事实真相。

奥运圣火传递珠峰

2001年7月13日，中国向国际奥委会庄严承诺：永恒不息的奥运火炬将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而达到一个新高度。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与登山运动的首次结合。这一大胆新奇的创意，深深打动了国际奥委会委员。

“珠穆朗玛”藏语意为圣母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正南方，海拔8844.43米，是世界第一高峰，它的主要部分在中国与尼泊尔王国交界处，尼泊尔王国境内为南坡，北坡在中国境内。珠穆朗玛峰山体呈巨型金字塔状，地形极端险峻，环境异常复杂。在山脊和峭壁间分布着548条大陆型冰川，冰川上有千姿百态、瑰丽罕见的冰塔林，也有高达数十米的冰陡崖和明暗冰裂缝，还有众多险象环生的冰崩雪崩区。在珠峰周围20公里的范围内，有排在世界第四的洛子峰、世界第五的马卡鲁峰等高峰，仅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就有40多座。

2008年5月6日，中国登山队从西藏登山队、西藏登山学校、清华大学、南京理工学院以及中国农业大学选拔出31人作为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的队员。

登山队员们为了成功登顶，付出了艰苦努力。



2008年5月8日，北京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这是罗布占堆（左）点燃第一棒火炬手吉吉手中的“祥云”火炬。（扎西次仁摄）





夕阳下的珠穆朗玛峰峰顶。（欧阳宏生摄）



2008年5月8日，北京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

2008年5月5日，已经在高海拔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适应性训练的数十名队员，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出发，向顶峰挺进。在7000米左右，他们小心翼翼地通过了堆积万年冰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结构的“北坳”。在7400米至7500米之间，他们闯过乱石累累的岩坡和著名的“大风口”。5月6日，当登山队员们艰难行进时，变幻无常的珠峰上空猛烈的西南风冲击着主峰的岩壁，形成一股强烈的旋风，带着暴雨一样的冰碴和雪粒，拍打着队员们的身躯。随着高度上升，氧气更加稀薄，每移动一步，队员们的心脏就会剧烈地跳动，呼吸上气不接下气。5月7日，他们终于来到被称为“死亡地带”的8300米突击营地，从这里抬头仰望，不远处就是圣洁而肃穆的珠峰顶峰。

5月7日晚，登山指挥部下达8日冲击珠峰顶峰的命令，并最终确定登顶队员名单共19人，分为突击、支援两个组。突击组由

12人组成：组长尼玛次仁，副组长罗申，队员包括达琼、吉吉、次仁旺姆、李福庆、黄春贵、袁复栋、罗布占堆、阿旺扎西、小扎西次仁、普布顿珠；支援组由7人组成，组长次洛，队员王勇峰、德庆欧珠、次旦久美、边巴顿珠、严冬冬、洛则。

5月8日凌晨1时30分，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突击组出发，凌晨3时支援组分两批出发，向珠峰顶峰发起冲击。清晨5时10分，部分队员已经到达第二台阶8680米高度。早晨6时，突击组已经越过第二台阶，超过8700米的高度。 7时20分，朝阳跳出东方，珠峰上闪现出一片金色的霞光，队员们这时顺利越过天险“第二台阶”，一步步向顶峰接近。8时30分，已经有队员成功登顶，开始准备进行火炬传递和展示的工作。9时，大部分队员已经到达火炬传递指定位置，即将进行火炬的点火仪式。9时11分，在距顶峰30米处，罗布占堆用特制的火种灯点燃了第一棒火



奥运火炬珠峰传递路线图。



北京奥运会登顶珠峰的火炬手藏族姑娘次仁旺姆。

炬手、藏族女登山队员吉吉手中的“祥云”火炬，接着火炬依次经过王勇峰、尼玛次仁、黄春贵的传递，由最后一棒火炬手、藏族女队员次仁旺姆于9时17分在珠峰顶峰展示了熊熊燃烧的“祥云”火炬。

在海拔8844.43米的地球最高点，年轻的藏族女火炬手次仁旺姆将火炬高高擎起，火炬手们将五星红旗、奥运五环旗和北京奥运会会旗纷纷展开。世界的目光向这里聚焦，亿万颗心脏在激烈跳动，不朽的珠峰见证了奥运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

历史将铭记：人类首次在地球距太阳最近的地方点燃奥运圣火。无论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都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作为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象征，奥运圣火以和平、团结、友谊、进步，照亮了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请记住这些把圣火共同送上珠峰的英雄名字：尼玛次仁、王勇峰、次仁旺姆、吉吉、罗布占堆、罗申、达琼、李福庆、黄春贵、袁复栋、阿旺扎西、小扎西次仁、普布顿珠、次洛、德庆欧珠、次旦久美、边巴顿珠、严冬冬、洛则。

北京奥运圣火珠峰传递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向国际奥委会作出的火炬登顶珠峰的庄严承诺得以圆满实现。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国家共投入6亿多元积极复兴西藏传统民族文化，使西藏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继承和发展。如今，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藏现已建立省、地、县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形成了自治区、地（市）、县三级普查工作联动机制和工作网络。西藏目前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406项。西藏自治区已经完成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等“十大集成志”的编撰。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格萨尔”和“藏戏”于2009年和2010年先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

格萨尔。《格萨（斯）尔》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伏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格萨(斯)尔》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史诗中演唱篇幅最长的，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从字数来看，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共24卷，15693行；《奥德修纪》也是24卷，12110行；印度史诗《罗摩衍



格萨尔唐卡故事。格萨尔王派人召集邻国上下的军队，商讨除魔事宜。（王飞摄）



民间格萨尔藏戏表演。（扎西摄）

那》一般说有10万颂，20多万诗行。现已录制艺人说唱磁带5000小时，搜集300余部，整理出版藏文版120部，蒙古文版25部，汉译本20多部，学术专著20部，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等文种出版。

藏戏。藏戏的藏语名叫拉姆，意为“仙女”。据传藏戏最早由七姊妹演出，剧目内容又多是佛经中的神话故事，故而得名。藏戏起源于8世纪藏族的宗教艺术。藏戏的传统剧目相传有“十三大本”，经常上演的是，《文成公主》、《诺桑法王》、《朗萨雯蚌》、《卓娃桑姆》、《苏吉尼玛》、《白玛文巴》、《顿月顿珠》、《智美更登》“八大藏戏”。藏戏的服装从头到尾只有一套，演员不化装，主要是戴面具表演。藏戏有白面具戏、蓝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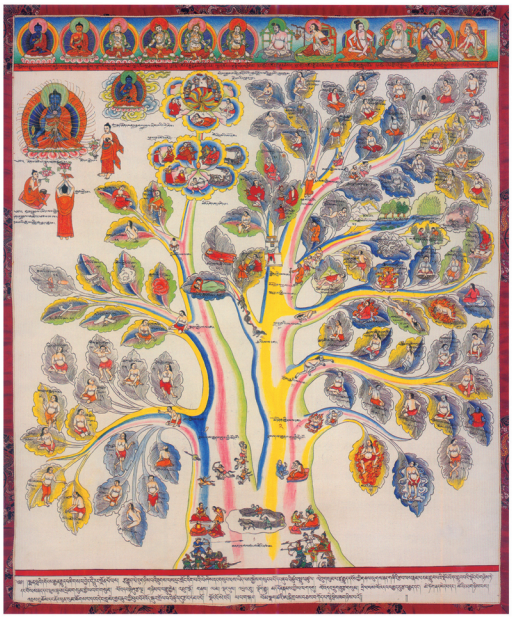
藏戏《苏吉尼玛》。

戏之分。蓝面具戏在流传过程中因地域不同而形成觉木隆藏戏、迥巴藏戏、香巴藏戏、江嘎尔藏戏四大流派。每年的“雪顿节”是藏戏班子纷纷演出的日子，故雪顿节有“藏戏节”之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荣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就有格萨尔、藏医、芒康弦子、热巴舞、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羌姆、山南门巴藏戏等61项，52位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

藏医。拉萨北派藏医药是藏医药的主要流派之一，“水银洗炼法”、“仁青常觉配伍技艺”是独具特色的药物加工技法。藏医“水银洗炼法”简称“水银加工”或“佐珠钦莫”，藏族人民把“佐珠钦莫”称为藏药的宝中宝，是藏族历代名医把含有剧毒的水银经过复杂的特殊加工炮制后，炼制成无毒而具有奇特疗效的药中之王“佐塔”。藏药仁青常觉配伍技艺本品成方于公元8世纪，始载于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是根据藏医学原理，选用生长在世界屋脊特殊生态环境下的天然、珍贵、稀有藏药材，并采用现代科学与传统技艺相结合的方法精制



Thangka Two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藏医唐卡。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演员在表演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卓舞”。

而成。

山南门巴戏。门巴戏是门巴族戏曲剧种，流行于喜马拉雅山东南坡门巴族聚居区，即现在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勒布区。因为它直接采用藏戏的藏文剧本，所以民间称之为“门巴拉姆”，即门巴藏戏。相传18世纪末，强巴克龙从拉萨带回一部《诺桑王子》的藏文本剧本，由此门巴戏开始在勒布流传。门巴戏的表演按开场戏“顿羌”、正戏“雄”和结尾戏“扎西”依次进行，只有六个演员和一个司鼓钹的伴奏员参加，参演者皆为男性。

热巴舞。热巴舞是由藏族“热巴”艺人表演的一种舞蹈形式。热巴是一种由卖艺为生的流浪艺人班子（一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成）表演的，以铃鼓为主，融说唱、谐（歌舞）、杂技、气功、热巴剧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据史料记载热巴起源于公元11世纪，由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所创



雪巴拉姆藏剧团的表演。

建。热巴舞分布于西藏昌都、工布、那曲等地及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藏族聚居区。


雪顿节展佛。(格桑吉美摄)

雪顿节。“雪顿”意为酸奶宴。在藏语中,“雪”是酸奶子的意思,“顿”是“吃”、“宴”的意思,雪顿节按藏语解释就是吃酸奶子的节日。因为雪顿节期间有隆重热烈的藏戏演出和规模盛大的晒佛仪式,所以有人也称之为“藏戏节”、“展佛节”。传统的雪顿节以展佛为序幕,以演藏戏看藏戏、群众游园为主要内容,同时还有精彩的赛牦牛和马术表演等。


格萨尔跳神表演。(金志国摄)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羌姆。羌姆是一种宗教舞蹈,也称“跳神”。“色莫钦姆羌姆”是西藏日喀则地区扎什伦布寺僧人表演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羌姆。在藏语中“色莫”是观赏的意思,“钦姆”是大型的意思,“色莫钦姆羌姆”即观赏大型宗教舞蹈之意。

藏族邦典、卡垫制造技艺。藏族人民常用的毛织围裙在藏语中称为“邦典”,具

有装饰、耐寒等功能。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杰德秀镇是藏族围裙的主要产地，因而有“邦典之乡”的美称。杰德秀镇生产毛织品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生产围裙也已有五六百年。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是西藏著名的地毯（藏族称为“卡垫”）之乡。江孜地毯和土耳其地毯、波斯地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

藏族造纸技艺。藏纸以瑞香狼毒、沉香、山茱萸科的灯台树、杜鹃科的野茶花树为主要原料，根据原料品质的差异，可以制成各种不同用途和等级的藏纸。造纸工艺一般都有去皮、划捣、蒸煮、沤制、漂洗、捣料、打浆、抄造等环节。藏族造纸业不仅在西藏地区得到全面推广，还传入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

拉萨风筝。拉萨风筝流行于西藏拉萨、日喀则、泽当等地，并传播到邻国尼泊尔、不丹，清代盛行于藏族上层。拉萨风筝的放飞有许多规定。在时间上，拉萨在雪顿节后放飞，日喀则必须由东头宗的俗官先行放飞。风筝的形制与使用有年龄的规定，如六轴、八轴、十轴风筝，必须按年龄大小分开选择。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作222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34名；自治区级民间艺术之乡19个。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2010年1月18日，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先后召开过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如果说前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减轻农牧民负担，发展西藏的社会经济为主要内容的话，那么免征农牧业税，43项工程和62项工程等，在西藏当代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01年国家又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全面确立了西藏跨越式发展的蓝图，使此后的9年，成为西藏经济发展最快、社会进步最明显的9年，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最大、城乡面貌变化最快的9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9年。

在这9年里，西藏累计完成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75亿元，其中国家投资超过1100亿元。总数超了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50年的总和。以青藏铁路为标志的重大项目，包括林芝机场、阿里昆莎机场、巴河雪卡水电站、青藏中电网、青藏铁路那曲物流中心等相继建



青藏铁路的建成为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图为上海开往拉萨的T164次列车正从念青唐古拉山山脚下经过。



辽宁省辽阳市第一中学的藏族学生打电话向雪域高原的亲人拜年。

成，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的社会发展。

在这9年里，农牧区的建设也取得新成效。西藏先后解决了23万户、120万农牧民的安居问题，使西藏尚未定居的游牧民基本实现了定居；解决了122.2万农牧民饮水安全问题；668个乡镇、4222个行政村通了公路；新增农牧民用电人口67万人；农牧区碘盐覆盖率达到80%以上。行政村通电话率达到85%、乡镇通邮率达到80%，极大改善了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西藏的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以这次会议为标志，西藏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之上。

这次会议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总量稳步提升，但起步晚、底子薄、积累少、实力弱的状况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部分城乡居民特别是一些农牧民生活还比较困难，社会事业总体水平相对落后，农牧区公共服务基础差、社会保障能



年轻牧人有了自己的新座骑。

力低等问题比较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平衡状况依然存在；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但市场经济意识和商品意识还很薄弱，封建农奴制残余思想在有的社会成员头脑中依然存在；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但生态和发展的矛盾日益显现，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反分裂斗争依然尖锐复杂。



西藏的自然环境保护工作卓有成效，拉萨河谷成为候鸟的乐园，成群斑头雁飞过。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深刻地指出，当前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西藏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决定了西藏工作的主题必须是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是西藏工作的长期主题，是西藏工作坚定不移的任务和目标。

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加快西藏发展”、“跨越式发展”到“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跨越式发展”，勾画出新西藏的未来蓝图。这就是“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要更加注重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西藏拉萨曲水县南木乡江村卓嘎给亲朋好友献“切玛”。

更加注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更加注重保护高原生态环境，更加注重扩大同内地的交流合作，更加注重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宽裕、生态良好、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统一”。

会议明确了西藏发展的战略定位，这就是西藏要成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会议提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两步走”的目标。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扎实。到202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改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些目标，经过了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的反复测算，是有实践依据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新生活从这里开始。

西藏视点丛书

牙含章　《达赖喇嘛传
牙含章　《班禅额尔德
蔡志纯　黄颢　《藏传佛家中
赵志忠　《清王朝与西

……现在国际上有一股西藏热，许多外国朋友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也非常关注。不过，我想冒昧说一句，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对西藏的真实情形并不了解，有的人甚至还受了蒙骗……回顾20世纪来的历史，我们西藏人从亲身实践中得出了比金子还宝贵的结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　拉巴平措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读历史要先由薄变厚，再由厚变薄……这本《百年西藏——20世纪的人和事》从西藏地方百年史中筛选40个话题，用明白流畅的写法，使读者对西藏百年留下总体的明晰的印象，有人有事，有图有文，读来真实可信，趣味盎然。

——藏学专家　朱晓明

ISBN 978-7-5075-3484-9
9 787507 534849 >

定价：36.00元